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BOOK TWO

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下篇

杨继绳 著

2007年8月

1

¹ 基于此书互联网素材精校。
Twitter @NoRealNamesCN
Feb-Mar, 2023

目录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9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9
1、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10
2、用 350 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12
1.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12
2. 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13
3. 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14
4. 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T）.....	14
5. 降水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n）.....	14
3、用 120 个水文站点的资料分析.....	15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18
三、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22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25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26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29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31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 50 米.....	33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36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40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46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47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51
三、“人民公社好”.....	55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61
五、城市人民公社.....	63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65
一、消灭家庭.....	66
二、大办食堂使农民家徒四壁.....	69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71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77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80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84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85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90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95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97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99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100
七、“五风”屡禁不止	107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109
一、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110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112
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115
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117
五、扩大农民自由，但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119
六、实行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120
七、下放城镇职工，减小粮食压力.....	123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125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127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134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35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139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145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150
1、刘少奇	151
2、周恩来	153
3、朱德.....	156
4、林彪.....	157
5、陶铸.....	159
6、谭震林.....	161

7、陈伯达	162
8、胡乔木	163
9、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164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167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170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175
一、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176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178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83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187
五、残酷的高征购.....	192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6
七、压农村，保城市	198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201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203
1、人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203
2、中国农民在大饥荒期间获得的能量	204
3、饥饿引起死亡的病理生理机制	206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209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210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214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222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228
1、蒋正华的研究	228
2、丁抒的研究.....	232
3、金辉的研究.....	233
4、陈一咨的数据	233
5、曹树基的研究	234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235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239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240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242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248
四、全面跃进 全面紧张	251
五、被迫调整 一步三折	254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258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259
1、骚乱和暴动	259
2、边民外逃	262
3、哄抢粮食	262
4、刑事案件增多	263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265
1、大规模的镇反肃反	265
2、利用专政工具连续严厉打击	267
3、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	268
4、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	270
5、饥民的反抗在萌芽状态即被消灭，不可能发展壮大	270
6、惩罚农村基层干部，消减农民的不满情绪	271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273
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274
二、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277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278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280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282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285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287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288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289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290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292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293
二、共产主义探源.....	297
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303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306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307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312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315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320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328
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	332
参考文献.....	346
一、来源十分可靠的原始文件.....	346
1、河南省.....	346
2、甘肃省.....	347
3、四川省.....	349
4、安徽省.....	355
5、吉林省.....	356
6、辽宁省.....	359
7、江苏省.....	359
8、广东省.....	361
9、山东省.....	361
10、浙江省.....	363
11、云南省.....	364
12、河北省.....	367
13、中央有关部委.....	368
14、公安部.....	370
二、官方文件.....	372
三、有关省的官方文件.....	376
1、河北.....	376
2、甘肃.....	376

3、吉林.....	377
4、江苏.....	378
5、云南.....	378
6、浙江.....	379
7、四川.....	379
8、上海.....	380
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及批示.....	381
五、专著.....	384
六、论文、研究报告及文章.....	388
七、回忆录.....	393
八、资料汇编.....	395
九、地方志.....	399
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它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402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还是领导集团的主观过错？若干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归罪于客观原因。

1959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还煞有介事地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防止“瘟疫”。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归罪于自然灾害。1960年9月10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但是，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里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政策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但强调“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但加上了苏联撕毁合同的因素。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天灾。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中国自然灾害是非常频繁的。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内，我国发生较大的旱灾1056次，差不多两年一次，较大的水灾1092次，平均每两年一次。从1950年到1997年的48年间，平均每年旱灾受灾面积2034万顷，水灾受灾面积988万公顷，二者合计约占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0%。

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流域因持续暴雨而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农田4755万亩，1800万人受灾，死亡1.3万人。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

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 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 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尽管年年有天灾，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多灾多难，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 1971 年到 1981 年、1986 年到 1988 年旱情最重。在大的自然灾害中总是要死一些人（特别是水灾）。要把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归罪于自然灾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据的。1959-1961 年肯定是有自然灾害的。问题在于，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是不是比历年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即使严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这就需要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历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作一个比较。

1、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据官方数据，1959-1961 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 年受灾面积达 4463 万公顷，成灾面积 1373 万公顷。继 1959 年大灾害后，1960 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 6546 万公顷，成灾面积 2498 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 50 年来首位。1961 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6175 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 2883 万公顷，为 1994 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 80%以上为绝收）。

表 15-1 1950-1983 年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单位：万公顷、万吨

年份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旱灾成灾面积	水灾成灾面积	粮食产量
1950	1001	512	41	471	13218
1951	1256	378	230	148	14369
1952	819	443	259	184	16392
1953	2342	708	68	320	16683
1954	2145	1259	26	1131	16952
1955	1999	787	414	307	18394
1956	2129	1523	206	1099	19275
1957	2951	1498	740	603	19506
1958	3096	782	503	144	20000
1959	4463	1373	1117	182	17000
1960	6546	2498	1618	498	14350
1961	6175	2883	1865	540	14750
1962	3718	1667	869	632	16000
1963	3218	2002	902	1048	17000
1964	2164	1264	142	1004	18750
1965	2080	1122	811	281	19453
1966	2421	976	811	95	21400
1977	5202	1516	701	910	28273
1978	5079	2180	1797	285	30477
1979	3937	1512	932	676	33212

1980	4453	2232	1249	915	32056
1981	3979	1874	1213	862	32502
1982	3313	1612	997	836	35450
1983	3471	1621	759	1216	38728

注：自然灾害指水、旱、霜、冻、风、雹等灾害。成灾面积指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 30% 以上的耕地。

资料来源：灾情面积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 190 页，粮食产量见《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 141 页。

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的灾情统计。而农业部的灾情统计是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国家统计局是为政权服务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供与此相反的数据。连比较讲科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也只能“上面要什么数就给什么数”。其他人就更难说了。当然，作为职业统计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数据的客观可靠，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在统计系统中还有不少不讲职业操守的人，其中层次越高的官员，职业操守越差，而数据要经过高层次官员“审核”才能发布。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们饿死人的政治责任。

然而，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

我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粮食产量也列在表 15-1 中，可以看出，粮食减产和受灾严重程度并不呈正相关关系。

从表 15-1 中可知，1956 年、1957 年、1962 年、1963 年、1977 年、1978 年、1979 年、1980 年、1981 年、1982 年、1983 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 1959 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在这 11 个年头中，有 9 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其中有 6 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就从表上列出的 1959-1961 年三年数字来看，也看不出粮食产量和天灾的正相关关系。1961 年的成灾面积比 1960 年高出 15.4%，但 1961 年的粮食产量却比 1960 年高出 2.8%。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粮食大幅度减产，只要中国门户是开放的，只要有粮食市场存在，就不会发生饥荒。当粮食稀缺的时候，粮价就会上升，外地粮食就会流入，中国没有粮食，外国粮食也会流入。中国当时是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粮食市场，更没有融入国际粮食市场之中。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各地的气象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个地区有灾，可能另一个地区丰收。虽然区域性的灾害频出，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即使没有粮食市场，政府可以从丰收地区调粮救济灾区，老百姓也可以到丰收地区投亲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区域性的饥荒，几乎没的出现像 1959-1961 年期间这样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 1928-1930 年全国 22 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 1000 万人。从 1920 年到 1936 年，17 年灾荒合计死亡 1836 万人。李文海

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

1958-1961年三年之内就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多万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灾数字，把这个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归罪于天灾，显然说不过去。

2、用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由于中国的一切数据都由国家统计局垄断，除了统计局以外，很难找到其它的数据。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和利用其它数据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国的农业气象学家们还有自己的统计和研究。为此，我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请教。我不仅在国家气象局图书馆找到了不少资料，还经专家指点，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这就是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

这本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做出的分析。这本书不仅资料来源于非官方，而且用曲线形象地描述了1958-1961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较，不懂气象学的人也能直观地了解这三年的气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别。

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几个指标曲线来看1959-1961年的灾害程度。再从其它书中引用有关知识对这些曲线做出简单的解释。

1.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划分干旱等级。他们认为，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干旱的本质特点。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不论是降水量多的地方还是少的地方，都不会发生干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D = (B - X) / X \times 100\%$

式中，D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为降水量(毫米)；X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 15-2 旱情等级的划分

资料来源：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山东 1959 年就饿死了不少人，当时说是山东大旱。把死人归罪于旱灾。当时山东的干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气象资料表明，1959 年 7-8 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 278 毫米，比常年同期（360 毫米）偏少 23%。即降水量距平为 -23%。从表 15-2 中可以得知，-23% 在一般干旱线以下。而山东省在 1967 年 12 月至 1968 年 9 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达 -44%，属一般干旱，这时还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没有饿死人。

高素华采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分析全国情况。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 (某年降水量 - 40 年平均降水量) / 40 年平均降水量 × 100%

他们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 350 个站点 1951-1990 年的降水资料。40 年平均降水量是 1951-1990 年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 40。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他们绘出了 1951-1990 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曲线图的纵坐标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横坐标是年。图 15-1 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与 40 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1960 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 -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 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 年等年份。1978 年的旱灾远比 1960 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1961 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 80%，是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 1954、1973 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月降水距平大于 200%，连续 2 个月降水距平大于 100%，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 50% 为大涝。1959、1961 年只能算一般涝年。1954 年涝灾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图 15-1 1951-1990 年中国年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50 页。

2. 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 月是农作物生长期（简称生长季），这个时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高素华等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 350 个站点 1951-1990 年的降水资料，制出了图 15-2 所反映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图 15-2 中可以看出，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与年降水量距平变化曲线大体是一致的。由于各地区在不时季节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长季降水量距有所差异。但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 年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 40 年来最小的几年，远远小于 1954、1965、1972、1973、1978、1989 等年份。从偏离幅度看，这三年是一个常态年份，不能说是大灾之年。

图 15-2 1950-1990 年农作物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53 页。

3. 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我国气象学者利用全国大体分布均匀的 350 个站点 1951-1990 年的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绘出的全国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如图 15-3。可见 1958 年-1961 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历年来最大的，即年景比较正常。

图 15-3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41 页。

从此曲线可以看出，1959-1961 年气温偏离常年不是最大的，没有出现超常低温。“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属于“气候生产力”。所谓气候生产力就是以气候条件来估算的农业生产潜力，即在当地段的光照、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设作物品种、土壤肥力、耕作技术等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时，单位面积可能达到的最高产量。这是自然条件影响粮食产量最直接的科学表述。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有科学的公式来计算。由于过于专业，本处从略。

4. 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t）

农作物的自然生长力与气候有关，主要是与气温和降水有关。从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上可以看到所选的年度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偏离幅度。偏离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图 15-4 中可以看出，从 1958-1961 年，气温生产力的偏离不是最大的。

图 15-4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56 页。

5. 降水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n）

图 15-5

资料来源：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 59 页。

写完了这一部分以后，我心里还不踏实，想找高素华当面求教。高素华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已退休。经多方周折，我于 2005 年 8 月 30 日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采访了她。一见面，就感到这是一位很有科学素质的女性。讲话很客观，不偏激。她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政治影响，是纯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高素华 1963 年

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农业气象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气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她说：“1958 年到 1961 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3、用 120 个水文站点的资料分析

金辉先生提供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 120 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记录了这 80 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但金辉先生没有提供资料来源，我无法用原始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我觉得金辉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错误。由于金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被人广为引用，影响很大，我不得不得做出评价。

表 15-3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

年份	-2 度站 (涝)	-1 度站 (偏涝)	0 度站 (正常)	1 度站 (偏旱)	2 度站 (旱)	120 个站点总指数	全国平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6	29	33	30	20	8	-55	-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2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8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31	-0.258
1963	17	28	21	33	21	+13	+0.108
1964	28	34	25	25	8	-49	+0.4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808

资料来源：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 年版。

表 15-3 将每一年的旱涝状况分为五个等级，即 1 度为涝，2 度为偏涝，3 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 度为偏旱，5 度为旱。金辉先生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进行了综合整理。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他将原表中的旱涝等级作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即涝由 1 度改为-2 度，偏涝由 2 度改为-1 度。正常或旱涝相当的由 3 度改为 0 度，偏旱由 4 度改为 1 度，旱由 5 度改为 2 度。其中 (-2) 度的涝和 (+2) 的旱为水文气象上的灾害年度。表中的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 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趋近于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表 15-3 显示，1959 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 2 度站为 13 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菏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昌都；

偏旱的 1 度站为 25 个。2 度站、1 度站合计 38 个。-2 度站 13 个。旱涝站合计 26 个，为总站 1 / 5 强。

1960 年总指数为 +11，平均指数为 +0.092，其中旱的 2 度站仅 8 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 1 度站为 44 个。2 度站、1 度站合计 52 个，说明 1960 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多。涝的-2 度站 14 个。旱涝站合计 22 个，不到总站数的 1 / 5。

1961 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为-0.008，其中旱的 2 度站 15 个即开原、朝阳、赤峰、同阳、信阳、济南、安庆、郟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贵阳；偏旱的 1 度站 29 个。2 度站和 1 度站合计稍超出总数的 1 / 3。涝的-2 度站 12 个。旱涝站合计 27 个，不到总站数的 1 / 4。

金辉认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 2 度和 1 度站、2 度站和-2 度站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 年都可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 1957 年（总指数为 +27，平均指数为 +0.208）和 1958 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超过正负 0.1，三年总平均指数为 +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 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 度站达到 41 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 1 / 3。而 1965 年和 1972 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 +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 +0.792 和 +0.808，旱的 2 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 1 / 3，分别是 41 个和 42 个。

再看与 1959-1961 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 年、1962-1964 年。这 6 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 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 1959-1961 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金辉先生的结论是，1959-1961 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惊，所以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需要指出的是，金辉先生将每个站点的指数求出算术平均值，用算术平均值偏离“0”的大小来判断灾情轻重，这种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假若某年有 60 个“-2”（即涝），又有 60 个“+2”（即旱），即这一年又有旱灾，又有涝灾，应该是重灾年，但求出指数算术平均值为“0”，即没有灾情。由此得出“风调雨面顺”的结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先旱后涝”或“旱涝相当”是不能抵消的，但这一平均，就抵消了。但是，这里提供的 2 度站占 120 个站的比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请高素华看了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高素华看后说：“我们搞农业气象的不用水文站点的数据。水文数据和农业气象数据不可比。水文数据对研究径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来对农业气象做出判断。”她还说，旱灾和涝灾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同，一度旱灾和

一度涝灾是不对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点的旱涝度数进行数据处理是不合适的。高素华说：“我们气象学者不用‘风调雨顺’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说法，我们只是用数据证明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0月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对中国增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过贷款方式为中国提供60个师的装备）。但是，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毛泽东不快，毛泽东只能忍气吞声，不便发作。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促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华项目的签字，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出让中苏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增加援建重点工业项目和军事贷款，提供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等。约18000人次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主体是提供重点工业项目的整套设备和技术，据中方资料，整个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正是这些项目和设备，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现代工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一再讨好毛泽东。1955年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这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在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

此后两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4月7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铺设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同年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3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1957年5月，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中科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尽管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为中国在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打下了重要基础。

中苏关系的破裂是逐渐演变的。

1956年2月4日至3月27日的苏共20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泽东不快。《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这两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联20大的作法。但中苏关系并未像外界估计的那样受到重要影响。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苏联进行了长达18天的访问。毛泽东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

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这个提议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在尤金面前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毛不热情接待，反而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但中苏关系还是没有破裂。

1958年8月8日，中苏两国签订协议，决定苏联在技术上帮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冶金、化学、煤炭、机械制造、木材加工、建筑材料工业和电站，具体落实为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采取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事前有意向苏联隐瞒炮击金门的决定。毛泽东此举，一方面无视中苏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苏同盟以要挟美国，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

1958年11月23日，第一枚苏制萨姆-12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6套发射器、62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1959年10月7日，一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使世界震惊。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

苏共对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因此，中国就大张旗鼓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在这期间，他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对美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争论。

大跃进、大炼钢铁、炮击金门，使赫鲁晓夫忧心忡忡。他更怕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两党决裂势不可免。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

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余，显然这次合同的撕毁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苏联援建项目——洛阳拖拉机厂，1959年11月1日建成投产，达到了每5分12秒生产一台拖拉机的设计水平。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订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1960年3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还说，苏联1959年继续给了我国巨大支援，对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1960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要求华沙条约缔约国家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唱了反调，并且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这个发言。在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酒之后就开始骂人。他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2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斯别洛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向中国代表团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的，对内政策是主观唯心论；说中国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是违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线。1960年2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于是，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毛泽东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也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据中国官方宣传，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撕毁的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把中国的大饥荒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1960年11月5日到12月8日，刘少奇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1961年6月19日，两国又签订了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没有完全中断。1961年4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率政府贸易代表团赴苏联商谈1961年中苏两国贸易问题，签订了中苏两国关于1961年货物交换议定书。这次会谈，还就处理1960年中苏贸易业务上的中国欠账问题达成了完满的协议，同时还商谈和签订了关于苏联借给中国糖的协定。叶季壮在苏联外贸部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

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三、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数量其说不一，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记载共有 11 笔贷款，总额为 56.76 亿旧卢布。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经济学家M.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一书中记载的贷款 6 笔，总额为 14.861 亿新卢布（折合 66.117 亿旧卢布——1 个新卢布折合 4.45 个旧卢布）。而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 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转引 1960 年 7 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数字：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156 项，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了 148 项，共 304 项。这些援助不是无偿的，共 152 亿卢布。到 1960 年，已经还了 72 亿卢布，还剩 79 亿卢布。北京大学沈志华教授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 1950 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1950 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 13 笔，而不是 11 笔，总金额大约是 66 亿旧卢布，而不是 56.76 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是忽略了 1951 年 4 月 10 日和 9 月 12 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可能是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苏联向中国提供 66 亿旧卢布的贷款中，军事贷款总计 62.88 亿卢布，占 50 年代全部贷款的 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大约 48%。经济贷款，如果不算 1961 年的 3.296 新卢布蔗糖贷款（合 14.6 亿旧卢布），则不到 3.3 亿旧卢布。

表 15-4 1950 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 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济
1	1950.2.14	12	12	12（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3.4）	
4	1951.9.12	6	6	6（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 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合计		68.713	66.163	62.88（约 32 亿）	3.283

资料来源：沈志华：《关于 19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沈志华教授认为，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他没有看到任何

历史文献的记载，却发现了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的援助的资料。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但中国不要小麦，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按协议，这些债务应到1965年全部还清。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中国提前还清了的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吴冷西在他的书中回忆道：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按80亿卢布计算（即前面说的79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5年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这里引用的《人民日报》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是摘要，没有发布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多少钱。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中有这个数字：“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1964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3%。”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当年中国的援外是“无私”的。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在1958年就跟中国要了50万卢布。1961年2月2日，中阿双方在北京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的规定，进一步签订了几份议定书，并且交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换文。根据上述议定书和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粮食和其他商品。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

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回忆说：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中国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钱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在大饥荒年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这也说明还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表 15-5 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的比较 人民币：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国防费用
1950-1955	6.80	12.60	332.3
1956	5.97	4.04	61.2
1957	6.08	4.67	55.1
1958	7.23	2.76	50.0
1959	7.11	3.50	58.0
1960	6.73	3.63	58.0
1961	6.58	5.19	50.0
1962	6.42	8.54	56.9
1963	2.86	9.61	66.4
1964	0.96	12.16	72.9

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所以，表中的“国防费用”低于实际国防费用。

资料来源：历年国家财政决算报告和《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表 15-5 中的外援数字低于周恩来报告中的 66.7 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从表 15-5 中可以得知，从 1960 年到 1962 年，偿还外债总额为 19.73 亿元。此数不仅是还苏联的债，还包括偿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同期外援数 17.36 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仅多出 2.37 亿元；相当于同期国防费用 164.9 亿的 11.96%。如果偿还外债真的不堪重负，影响到食品供应，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点点资金变成“黄油”就行了。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 1958 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然而，执政者多年来把这一祸根视为珍宝，从 1958 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 1978 年，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划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忠与不忠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就是高速度的体现。所以，从思想认识上，总路线和大跃进是一回事。不过，总路线偏重于指导思想，大跃进偏重于行动，大跃进是总路线指导下的行动。

在五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 1953 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写进了 1954 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表明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表述为“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时认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 10 年到 15 年。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要管 10 年到 15 年。结果，写进宪法后的 4 年就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在 1958 年 3 月 9 日到 25 日的成都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总是过早地估计革命胜利的到来。人们称为“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认为欧洲的革命危机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曾想直接从当时的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受挫以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到来也估计过早。他在1920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50岁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15岁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按列宁的估计，20世纪30-40年代，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急性病，这种急性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之所以有急性病，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能够对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不断自动地进行纠正。这正是他们认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也造就了他们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对市场的敌视和对民主的轻视。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人迫切地希望尽快地改变中国的面貌，总想事情办得快一点：快一点实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快一点实现农业集体化，快一点发展农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其它事业。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领导人往往不顾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见占绝对支配地位。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人，知道很多主观愿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不仅得不到自由表达，反而被指摘为“右倾思想”。毛泽东一批评右倾，多数人就附和，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不仅仅是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也面对众多人的批评。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认识，转而附和毛泽东，从而使毛泽东的认识更偏离实际。他更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认为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把事情办好办快。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一直批判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

认识；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 1967 年粮食总产量 1 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营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 1955 年 12 月 27 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 1967 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说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 1936 年的 3000 亿斤，增加 200%，即 9000 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 年粮食总量只有 4374 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 1993 年才达到 9000 亿斤。当时毛泽东讲 1967 年粮食产量达到 1 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了，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 1956 年算起，5 年到 7 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2000 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 8507 万人，文盲率为 6.72%。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进”了近 30 年，扫盲计划“冒进”了 100 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 1955 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 1967 年）的指标。如粮食计划由 6000 亿斤提高到 9500 亿斤（加上大豆为 1 万亿斤）；棉花由 5600 万担提高到 1 亿担；钢由 1800 万吨提高到 2400 万吨；煤由 28000 万吨提高到 33000 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间由 1967 年提早到 1962 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1956 年 1 月 14 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 1956 年 1 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 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

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开始，34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后来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1954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泽东说要超英赶美，其实，他最想超的就是苏联。对毛泽东这一动机，李锐、沈志华的著作中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冒进，是指走得太快，不顾条件、不顾后果冒然前进。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 1956 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 1957 年初。反冒进的主要人物是国务院的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为速度太高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更多地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是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这批人以后发展为中国的“务实派”的主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对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后话。

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从 1955 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势头。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规定，5 年内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 694 个，建成的 455 个，后来基本建设项目追加到 745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 477 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 800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 500 多个。1957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来是 121 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32%，后来又增加到 170 亿，180 亿。基本建设项目一多，资金，钢材，水泥，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紧张。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压力很大。从他这个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很多部门正在做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 年 2 月 6 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他们商定把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 180 亿元压缩到 147 亿元。压缩以后的这个数字还是比上一年增加了 68%。

2 月 8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 24 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的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 年 4 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 4 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 20 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 5 月起，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5 月 11 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 8 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 年 5 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 6 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决定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中央这个会议的意见，6 月 3 日，财政部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中，写进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文字。6 月 10 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初稿。并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在这期间，又把 1957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 147 亿

元进一步压缩到 140 亿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 40 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于 6 月 20 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 1956 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 10 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 1957 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反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批评反冒进的条件终于有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一五”计划完成，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就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则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毛泽东话音一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

十分兴奋，就会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 1958 年以后压制不同意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 11 月 13 日，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 月 6 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 15 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 2 千万吨，再过 15 年，可能爬到 3 千万吨。中国呢？再过 15 年，可能是 4 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毛泽东设想 1973 达到 4 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到 1983 年才达到 4000 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 10 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工会第 8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那时认为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空气活跃，想用地方促中央。他 1957 年 12 月 8 日离京，到华东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通过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世。这两位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跟得紧，跟得快。紧接着是杭州会议。1958 年 1 月 3 日和 1 月 4 日，毛泽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用安徽一个冬季就挖了 16 亿方土，超过 7 年的土方数量的事例（这是一个假数字，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绍），说明原来的计划太低了，太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 年工业增长了 31%，没有 1956 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他要求各地开展比赛。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比输了活该。他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他还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气去破坏。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 50 米

1958 年 1 月 6 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 日到 22 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 1956 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 年 6 月 20 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三角，加了很多批语：“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评。”他说的序言是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作为南宁会议批判材料的还有周恩来 1956 年 11 月 10 日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关于 1957 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1 月 11 日晚，毛泽东先从“红”与“专”讲起。他强调“又红又专”，“红”是指政治好，“专”指业务好。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要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面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他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 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十个指头中有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这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 6 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冒进。

“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说法成了各级领导人掩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借口，谁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就说谁没有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说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讲到这里，他回答“右派”对他的指摘：

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

是政治问题。

对陈铭枢和张奚若等的这种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反驳过多次。对“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

在1月1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在1955年12月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这是说周恩来的。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三批外宾。13日，周恩来一到南宁，就嗅到会议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1月13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6日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称赞。这是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党代会上作的报告，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坐卧不安。

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王任重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陶铸表示“要赶上柯老”。对反冒进的批评，使会上气氛很紧张。李先念紧张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大家心里纳闷：这到底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是批评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批评主要是指陈云的（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1月19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不知周恩来是顾全大局还是以退自保，在这次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说：

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周恩来主动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经常放弃自己的看法顺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顺从，更使毛泽东的认识沿着错误的思路继续发展。南宁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被毛泽东压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他决定辞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看到周恩来写的辞职报告，也没有看到别人记录下他的口头辞职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还讨论彭德怀的“不担任国防部长”的辞职要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主要讲要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实行“两本账”制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望完成账变成下级的必须完成账，各级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高指标”、“浮夸风”也就难免了。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请部分省委书记到会。会址是成都金牛坝宾馆。会议3月26日结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成都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一个月以后，由于南宁会议的贯彻，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订计划，再次提高原来的指标，并纷纷上书毛泽东表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说：

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的基调一样，批评反冒进，鼓劲，为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继续统一思想。看到大跃进的潮头已起，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也不是完全讲一面话，他大讲辩证法，也讲了不要指标太高，要留有余地的话。但他总的精神是鼓劲，他的另一面的话就被人们理解为策略性的。他说：

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他强调“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好？”

很明显，冒进是轰轰烈烈，反冒进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会上，毛泽东反复讲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他特别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他举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说明“自古以来，创新思想、学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他还号召人们要敢于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创新。“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东西开始都是违法的”。毛泽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这些话传达到基层以后，一大批无知的年轻人，在大跃进中为所欲为，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务而不顾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措施。否则，指标很高，实现不了。他说，有的高指标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得那样重。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说。他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毛泽东要求，要宣传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如何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要求宣传“丰收例子”，引发了各地大放“卫星”，都变成了浮夸的典型。对这些浮夸典型，人们又不敢“泼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终于成了危害极大的“浮夸风”。

在“气若长虹，势如破竹”的毛泽东面前，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来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查。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了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个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两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见也就完全可以畅通无阻了。在刘、周之下的官员们也都作了检查。3月2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泽东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陶铸在3月18日的发言中提出解决“搞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他举例说，合浦专区县以下干部大概有80%的干部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插话说，这个问题全国也没有解决。陶铸表白说“前两年反冒进，我没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会上受命与没有到会的河南、湖南两省联系，显得不同于一般省委书记。他的发言，不仅讲湖北，还讲河南。他说：“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情况下能估计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麦收要比去年增产50%-70%。”“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说：“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记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会议上，所有反冒进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全都向毛泽东臣服；没有反冒进的或被反的纷纷表功。与会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讨好毛泽东，并且把他的想法向更为极端发展。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3月25日，中

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通过的 37 个文件中，其中之一是《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会议把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3 月 10 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谁的权力最大，谁就代表真理，最高领导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泽东说要崇拜真理，实际就是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借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按照他的逻辑，独裁是合理的。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 月 18 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陈伯达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攻击还没有停止。4 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了一个汇报会，田家英后来说，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4 月 5 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反冒进是两个高潮中的低潮。

4月8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毛泽东还说：

还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在大跃进期间，“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都是从这里“批发”出去的。

毛泽东并不是偏执狂，看到大跃进潮头已起，他还是讲了一些冷静的话。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告诫报纸不要动不动就宣传什么“化”，如“绿化”，“水利化”，还讲到“做事要留有余地”。但是，由于整个制度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负反馈，毛泽东这些冷静的话，被人理解为这是方法问题、策略问题，他的思想实质还是要“化”，还是要把劲鼓“足”，“充分”调动一切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党的领袖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全党紧跟，并且通过舆论工具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在干部队伍中难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极端的人，而这种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专制制度下必然现象。领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极端。这时，领袖又出来说话，成为纠偏者，他显得比别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从本质上”理解他的这些“清醒”、“英明”的话，还是沿着原来的倾向走下去。在领导人眼中，走极端的人和不紧跟他的人相比，前者还是可爱一些。“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还说走极端的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下面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领袖这些纠偏的话通常是起不到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在一个党单独执政的情况下，这个党必须团结一致，必须统一思想。当然，思想只能统一在领袖的思想上去，团结只能团结在领袖周围。凡是与领袖不一致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看法，服从领袖。如果个别领导人和领袖公开对抗，那就是“分裂党”。“分裂党”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刘少奇、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大跃进的势头已定。毛泽东高速度发展战略已被全党所接受。在成都会议上总路线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开一次党代会，把总路线确立起来。这就是八大二次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半年前开了一个八届三中全会，现在又要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呢？八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是中央委员会，后者是全国代表大会。从法律地位上看，后者高于前者。

八大二次会议是在 1958 年 5 月 5 日到 5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的。会上听取并讨论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邓小平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增选了中央委员。

刘少奇的报告接受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正式否定了八大的决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指摘反冒进造成了生产建设上的“马鞍形”（即 1957 年低于 1956 年和 1958 年）。全面阐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阐述中，刘少奇特别强调速度，要求“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以以论战的语气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度紧张。”、“有些人怀疑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有些人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长。”等对高速度怀疑态度。刘少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说：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 6 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刘少奇在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真正地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对群众的热情“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话四次，在 5 月 8 日的第一次讲话中，他广征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讲解放思想，无所畏惧，讲年轻人胜过老年人，讲学问少的胜过学问多的，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讲这些的目的还是超英赶美。会议期间，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 7 年赶上英国，再加 8 年或者 10 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后变成了全民破除科学；他提倡的“敢

想敢干”变成了全民的蛮干，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后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想；他说的“高贵者最愚蠢”成了打击专家、学者的根据。

在 5 月 8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扬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这时站了起来，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反驳林彪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 460 个儒，我们坑了 46000 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 100 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 5 月 17 日的讲话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泽东说：

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 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堵住了干部的嘴，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 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还说农村有粮，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

讲到“准备对付灾难”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讲到：

假如党分裂，要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党代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栽跟头。凡不顾大局搞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闹分裂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里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周恩来彻底投降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又跳出个彭德怀出来“搞分裂”。这段话为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埋下了伏笔。

对于反冒进的批评，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已经很彻底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火力不减。周恩来、陈云再一次作检查。陈云在检讨中说“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了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如果不是得

到毛泽东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周恩来在5月17日的大会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接着，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作深刻的检查，还把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上：

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发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整个会上对泽东的歌颂声不绝于耳。陶铸在发言中不仅歌颂，还要求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了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教科书。……毛主席的著作不仅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

人们普遍认为，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实际上，陶铸比林彪早了好几年！读者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几年以后说的话和陶铸的话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铸的专利权？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专制制度下，争相向皇帝献媚、争相邀功取宠，本来是正常现象。这是在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王任重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从六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颇有新意的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王任重这个“发明”很快在全国推广，辩论会实际是批判斗争会。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倡的“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全国，不知多少说真话的人被摧残在“大辩论”和“拔白旗”之中！

柯庆施的发言内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绘了15年以后的美好情景：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惊人的一致。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117人，书面发言140人，都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发言不仅完全支持总路线，还把已经很高的指标，再进一步调高。

5月23日，会议做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上，大跃进已经开始。思想一旦统一，经济官员们急忙把总路线落实到具体建设指标之中。

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的发言题目是《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他把超英赶美的设想一一落实到令人振奋的指标数字上。这些指标得到了大会批准。他说：“1958年的形势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

中央各部门唯恐说自己落后，他们的跃进指标又远远高于国家计委的指标。冶金部长王鹤寿的发言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说，明年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达到7000万吨以上，1972年达到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发言中提出了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的安排。农垦部长王震发言提出10年内开荒3亿亩。没有大会发言的部长们也向大会提交了本部门大跃进的报告。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是：《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纺织部党组的报告是《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林业部的报告提出5年内把15亿亩荒山全部绿化……。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又把中央部门的指标分解到各自的省。为表示自己紧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标。省委书记们竞相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你的指标高，我比你还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还要快。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实际，除了毛泽东以外，是没有人有敢提出质疑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进一步鼓吹大跃进以外，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这恰恰是残酷的现实！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意犹未尽。他对“跃进”这个词儿不停地玩味和欣赏。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 月 26 日上午 7 时

其实，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这篇社论早 140 天。在 1957 年 6 月 26 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词。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 9 页和第 14 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 9 页和第 14 页上提到 1956 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 1956 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 1956 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 40 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 1956 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 11 月 13 日和 12 月 12 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

1958 年 5 月 26 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

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时

功过已经分明，思想已经统一，总路线已经确定。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总路线的热潮。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全国所有的报纸按同一口径发表文章。文艺界也开足了马力，全国每一个角落，颂扬总路线的歌声如潮：跃进，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195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处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上，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都从比较实际向错误的方向转变：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发展。在这个向错误的方向转变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内不仅缺乏一种对主要领导人的纠错机制，还有一种把领导人的认识推向更加错误的机制。当时毛泽东的确有点头脑发热，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偏差，并在实际中进行了纠正（反冒进）。但是一旦毛泽东坚持己见，纠偏的人放弃了纠偏，反而附和毛泽东。其他的人不仅不支持纠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泽东一边，把毛泽东的错误认识更推向极端。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就得了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官方一直称农业集体化为农业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后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合作制的事实来为中国合作化辩护，实际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集体化过程势必也是残酷的、强制的。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初的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出现了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这个制度，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 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1772-1837）发表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来社会应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法郎吉”（来自希腊语“队伍”一词 phalanx 的英文 phalange，意思为严整的步兵队伍）的设想。沙利·傅立叶认为，“法郎吉”是和谐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它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业，是工农相结合的合作组织。他还设想，每个“法郎吉”占地 1 平方英里，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组成。“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劳动、资本、知识进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劳动占 5 / 12；资本占 4 / 12；知识占 3 / 12。不同“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商业由行政垄断，不准私人经营。

继沙利·傅立叶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后，由法国人毕薛（philippe Buchez, 1796-1865）倡导，极力鼓吹劳动者应从资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并应组织劳动者自己的合作社。他还亲自指导了一个木工生产合作社。

英国医生维廉·金（Dr Willian King, 1786-1865）认为合作组织是穷人自救的好办法。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劳动是一切财富之父，劳动者必须联合，才能免受剥削。他于 1828-1830 年间，主办发行了一个名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 28 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实践者。欧文设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生产和消费组织。其成员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全民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和工业生产相结合，每个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全体成员都分配与其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工作，各尽所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公社设立公共仓库，社内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仓库里领取民需要的东西，按需分配。

1842 年，欧文倾其所有，带领他的 4 个儿子和英国的信徒们，一同到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合作公社”试验。他购买了 3 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取名为“新和谐公社”（New Harmonig）。在《新和谐公社的组织法》里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和地位，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财产公有。”“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情况。”欧文的搞了 4 年宣告失败。他为此付出了 4 万英镑，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文的试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认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欧文失败的根本原因。所谓没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没有掌握政权，不能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不能控制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毛泽东等就不同，他们掌握了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可以强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可以动员，利用手中的物质资源，可以逼农民就范。先驱者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用强权来推行一种理想，就会造成灾难。为了推行某种理想而建立的强权制度，就会把更多的人置于这个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些能力强的人买了大型农具，有的置了车马，还有的雇工。比较弱的农户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提出，要使多数农民丰衣足食，必须让农民由个体向集体发展。刘少奇认为，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机器工具，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毛泽东很赞赏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满。这是1954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现富裕和贫困现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变化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向中间集中的中农化趋势。据1954年对21省14334户农家的调查，中国农村阶级构成的变化是：土地改革结束时，贫雇农占总户数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为29%，中农由35.8%上升到62.2%，富农由3.6%下降到2.1%。

为了解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依靠大多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从中农中划出的下中农，加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农村的大多数，就当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农，就被看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曾想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并把这个意思向华北局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转给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社。

7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的观点，批评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17日，毛泽东转发了高岗10月14日的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春夏，农业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到1955年底，有7000多万农户入社，组成了18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2900多个）。

其实，防止两极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个理由，甚至只是作为动员群众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要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农村自耕农有1亿1千多户，居住分散。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掌握这个分散而庞大的群体，都无法一家一户地征购粮食。没有合作化，统购统销也无法实施。一个政府不能面对千万根头发，把它梳成辫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个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农民的生产、生活、思想全都纳入政府控制之下，集体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专长。在1953年那一段时间的初步集体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河北省大名县五区堤上村的两个合作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金南村叶洪善社共127户，最少有半数不是自愿入社的。社员张得荣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间掉泪。河北省委派三人三次到大名县，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后来毛泽东批评河北省“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由于强迫入社，农业社很不稳固，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各省压缩了一些条件很差的农业社。这就是毛泽东说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1955年夏天，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3000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问题。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说谁不入社就要像斗争富农一样斗争谁。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多派。”全省征购粮食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减少57000多头，猪减少三分之一，羊减少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卖子女，老弱饿死的情况开始出现。

为了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和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的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开会作了研究，并将研究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意见》说：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曾让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请毛主席审阅。

收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以后，浙江省委一致同意，并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布置。经过压缩，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5.3万个退到3.8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28%退到18.6%。

毛泽东心爱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万五千多个，他十分恼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颐年堂找邓子恢谈话，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浙江省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邓子恢见情况不妙，急忙作检查。9月26日，审查邓子恢准备的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的发言稿时，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合作社党组织不仅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在乡以下，合作社也是

农村的政治组织者。农业合作社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都进行着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实际是中央政权对乡村控制的基层组织。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特别到了高级农业社，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大社的优势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小社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一个社，当然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有《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集体化高潮。原来计划1960年完成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毛泽东建议提前到1959年完成，后来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报纸对农业集体化的报道很多。从已有的报道中给人一个错觉，好像集体化是农民的自愿行动。其实不然。就农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别是就那些生产和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对他们利益的侵害。相当多的人是不愿意集体化的。因此，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退社与反退社的斗争。一直伴随着对农民的强制和迫害。

先说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国闹退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当时赶往处置闹退社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仙居是闹退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坚决压缩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发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县只有4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55.86%都是初级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15%，1957年春天达到91%。同时，社的规模过大。账目混乱，生产上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将两熟水稻改为三熟，造成减产，全县全年减产22%。由于生产管理上问题很多，全县1956年每个劳动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钱，平均为3角3分钱。与此同时，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在生产和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动不动就对社员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合作化以来，在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个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的48名，占4.7%。干部不参加劳动，而且多得工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社的越来越多。此时，县委不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大批“富裕农民思想”，从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后，这个县个别地区就发生退社问题。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县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入社农户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干部107人，社员干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户。事件发生以后，县政法部门、兵役局（他们有枪）、驻当地部队、地区公安处组成联合办公室，对案件进行侦察。最后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对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对杨心培的报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为戒，要及时解决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错误言论，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反击。

无独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县发生各种闹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粮食问题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发生闹事63起，涉及4具区，25个乡镇，4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闹事的人数共达1.3万人。7月份，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发生了大旗会（求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2000多人。警察向

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2 人，伤 12 人，才驱散人群。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 14 人，拘留了 23 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 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 12 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 278 个高、初级社，700 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 66 人，拉走牲畜 4946 头，私分粮食 12.5 万斤，种子 2.4 万余斤，油料 390 多斤，农具 200 多件，柴火 5.2 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 40%，虞县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 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 1 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 天死了 11 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 1957 年 8 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 7 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 1% 左右。已垮掉的社共 102 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 12.7 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 2% 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 65 个乡，210 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 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 16 个乡，600 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鱼、摘桑叶，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

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 9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 1 万多户，已退社的有 4000 多户。退社的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 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成内成片发生，有 2000 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 60%-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 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 1%，多的达 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 10%-20% 的社员户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整（不自由）、受气受不了，”“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对社员作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

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 11 个乡镇 6 个人被打，7 人被拉，2 人游街，7 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 16000 多人，其中已捕 2000 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 1100 多人，管制 135 人。陕西咸阳县斗争了 158 人，有 79 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 643 人，其中被打 102 人，自杀 15 人，逃跑 8 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 10 多人。河北省邢台县王快村 400 多户，摸出 65 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 230 多人当中，有 18 人是贫农。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通常是教育。全国树立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 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 1930 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 70 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 4 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 1958 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 1958 年的公

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显然，这是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

三、“人民公社好”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公开反对集体化的人受到打击，农民顺从了。农村中的青年人，多数是愿意集体化的。一群年轻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劳动，比独自在父亲的严厉的指导下劳动愉快得多。他们太年轻，喜欢新鲜事，对改变现状的事情都拥护。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他们在家虽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可以在社会上造舆论。与此同时，从上到下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改变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東西，这也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多数人入社以后，不愿入社的人就显得很孤立，不得不参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机。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编者按的形式将毛泽东关于小社并成大社、小乡并成大乡、几乡并为一社的观点发表。

成都会议传出的信息启发了河南省遂平县的领导人，这个县在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在山区与平原互相协助、共同发展方面，乡与乡之间发生过一些磨擦。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遂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认为，可以根据成都会议的精神，把在实际利益上难以协调的鲍庄、扬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合在一起。他们请示了到这里检查工作的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要他在联合成大社的问题上表态，张树藩说这是大事，要经过地委讨论才能决定。

但他们等不及地委的讨论，说干就干，立即召集4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开会。会上各自表态，他们都同意合并。后经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同意，1958年4月20日，嵒嵒山大社正式成立。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钟德清任社长。大社内分为八个部：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文化卫生部、交通部。共有5566户，30113人。

县委向省委上报时，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改名为“嵒嵒山卫星集体农庄”。1958年5月5日，专门到省委汇报的娄本耀，受到了当时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接见。谭震林说：为什么要叫集体农庄呢？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还是叫公社好。娄本耀一听，很受鼓舞，连夜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经反复商量，最后名称定为：嵒嵒山卫

星人民公社。

其实，“公社”这个名字也不是谭震林的发明，而是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的集体创作。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中回忆：“公社这个名字，我记得在这里跟芝圃同志谈过。去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他们四人去广州的火车上应是1958年4月25日或26日，在谭震林见娄本耀之前。

《陆定一传》中是这样记载他们四人的火车上是怎样“吹”的。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向毛泽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海阔天空地议论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他们还吹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吹了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刘少奇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车站来看他们。刘少奇对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后来要北京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5月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召开。19日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在这个发言的最后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陆定一发言中的这段话，是在发言的头天晚上，陆定一自己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加上去的。这段话包括刘少奇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

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编书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人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得知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后，立即派《红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到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帮助工作。李友九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和河南省委的干部合作，写出了《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陈伯达将《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即对章程初稿进行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文件于1958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题为《嵯峨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成了全国各地办公社的蓝本。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4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河南省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在前面。8月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截至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个，正在建立的有300个。估计运动的结果，将并成15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户左右，平原地区1万户左右。修武县全县13万人口试办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195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11月27日农村工作部报告，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1%。由于规模过大带来很大问题，后又由26576个分解为52781个。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

“大”是指规模大。按经济学理论，“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毛泽东当时不会知道这个理论，但有直观的感觉。不过，要通过“大”来实现规模经济，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为前提。农业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数乡一社，还有一县一社。全国平均每社 5000 户，每一个公社的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十倍至几十倍。这么大的规模，又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统一指挥，生产、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公社领导机构的管理能力。且不说中国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难以胜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管理混乱和强迫命令的情况。在一些山区，规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云南省普洱县和平公社，仅其中一个大队（雅路生产大队）的 552 户人家、2696 人，就有 7 个民族，从东到西 80 里，从南到北 60 里。除了不少单家独户以外，有 3 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 39 个，从大队到最远的生产队 60 里，生产队之间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之内的村寨之间相距最远的有 35 里。这个大队原来是五个高级社，1958 年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实行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结果连年减产。这样的社队规模，在普洱县占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次，由于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彻底消除。再次，由于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全民经济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把经济条件不同的农业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统一核算，就是让穷社“共”富社的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让集体“共”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公社，就是公社“共”国家的产。总的来说，只有国家“共”农民的产，没有农民“共”国家的产；只有上级“共”下级的产，没有下级“共”上级的产。“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刮“共产风”使生产力大受破坏，以后不得不将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大饥荒以后，对社员的私有财产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这是后话。

“一大二公”，规模那么大，能够维系，公有化程度那么高，却无人反对，就得依靠权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实际是极权制度的具体模式和基层组织。极权制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关。它不但组织全社的经济活动，又对全社的工农兵学商进行统一管理。从经济组织方面来说，生产计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甚至哪块地种什么，按什么样的标准种，都由公社决定，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劳动力完成上级指令的生产单位。作为政权机关，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合一为基础的，公社党委是全公社的领导核心。每个大队有党支部，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党委任命的。大队党支部贯彻公社党委的决定，党支部书记决定大队的一切事务。由于大队党支部书记通常是连任多届，他的权力资源不断积累，有些人成了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员队伍急剧扩大。依照当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个公社有干

部 30 人以上，生产大队大约 10 人，生产队则 5 人。这样，在 52781 个人民公社，69 万个生产大队和 481 万个生产队当中，大小官员共达 6000 万以上，大体占全部农村人口的 7%。这 7% 的公社官员占有大约 10%-30% 的农村收入。农民说，“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这些官员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深入贯彻到每一人农户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着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贯彻和箝制是不择手段的，手持刀枪棍棒随意闯入民宅是家常便饭。公社干部是极权制度的末梢，是极权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广大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只有政府，没有社会。

二是企图用“供给制”代替按劳分配，把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引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供给制。七包是指包吃饭、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丧；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发、看电影。由于政府不具备“包”的供给能力，这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供给制，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人民公社的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为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在粮食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干部可以随意用不准吃饭的办法惩罚不听话的社员。

三是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中，干部像指挥军队那样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嵛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 27 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一个生产队为一个团，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营下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 28 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这些行动听军号指挥。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男人住东头的“营房”，女人住西头的“营房”，老人带着小孩住“留守营房”。个别年轻夫妇偷偷相约到野外重温旧课，被巡逻队抓住了的就开全团辩论会，被辩论的一对，男人低头认错，女人哭成泪人。

第四，对农村进行强权整合，使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的每一个边远的角落，使无产阶级专政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和肠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管生产，又管生活，还强化了对农民思想的控制。这使得中央政权的末梢，不仅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还深入了每一个家庭。

中共中央在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的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对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扫荡。在政治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这种秩序是强权整合的结果，这种收效使得掌权者更加迷信权力，也更离不开权力的强制。

权力至上和领袖崇拜，暂时减小了剥夺农民的阻力。但这种阻力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渐加大，农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于是，掌权者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意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打压。

极权制度能够深入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有赖于成千上万的乡村干部。中国乡村干部是从土地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但是，不是每一个土地改革干部都能成为农村干部。江苏一位农村干部说：在建国初期，“乡村干部就像被摊在筛子上，筛子不停地在动，平时小动，运动来时大动，不合格的干部就被筛掉了，一直到高级社时，乡村干部队伍才稳定下来。”当然，这把“筛子”的操作者是各级党的领导，筛选的标准是能不能“听党的话”。所以，能留下来的，大多是“听党的话”的。在皇权时代，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长莫及，在广大乡村，总是“天高皇帝远”。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这一批“听党的话”的干部，使得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党的声音，每一个村民都受到党的控制。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连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据说这两句话是政治阴谋家康生最先提出来的。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是与他青年时代的“新村主义”情结有关。早在 1919 年 12 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区。

青年毛泽东受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新村”。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1958 年，毛泽东认为条件具备了。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之路。”现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条路算是找到了。

这种共产主义情结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有。这些领导人到处演讲，大力鼓吹共产主义。

有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共识，就有了北戴河会议决议上“短则三五年、多则五六年”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提法。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还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到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但是，使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两三个月内，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扫荡着全国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农民开始抱怨，各种反对意见从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泽东等不得不暂时收回共产主义的幻梦，对人民公社制度也进行调整。他想尽力纠正，但他的纠正，却跳不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局限：具体的错误可以改正，但“三面红旗”不能动摇，对人民公社只是进行漏洞的修补和在现有基础上的完善。

10 月 13 日，毛泽东再度出京南巡，直到这年 12 月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这是他 1958 年的第四次离京出巡。且不说前几次，就是 9 月间他就视察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还是意气风发。10 月的出巡和他的态度和前几次有所不同，调子有所降低。

1958 年 11 月 2 日到 10 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紧接着，同月 21 日至 28 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8 日至 12 月 10 日，就地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两次通称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做出了高度评价，同时把人们从狂热的共产主义畅想中拉回，从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会澄清了几个理论问题：第一，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产还得大力发展；第四，按劳分配原则还要继续保持。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前几个月的作法，例如，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还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吃饭不要钱十分赞赏。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强调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一方面鼓吹吃饭不要钱。这说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为之。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句话，作为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肯定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就把几个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着，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作为纪要公布。其内容主要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即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旧账”的清算和处理；等。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又把上海会议确定的“基本队有制”（即大队所有制）进一步退到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制。

然而，这种倒退是形势所迫，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的庐山会议，不仅使这种倒退刹车，还使得在这次执行倒退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反右倾以后，又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60年大饥荒更加严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他3月4日对贵州公共食堂报告的批示有毛病，应当改过来。二是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实践上指向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执行庐山会议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击“五风”干部。前一种作法是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后一种作法更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强化了非法制的行为。

1962年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社员收益劳分配，以公益金照顾困难户；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组织上人民公社还是一个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是公社下级。

经过多次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级农业社的状况。所有制的退让是以三年大饥荒为代价的，是这种制度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由于政社合一的情况没有改变，农民还是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城市时，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1959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比较谨慎，主张“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做酝酿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这个指示同时下发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处参观学习。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天津会议）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上海市委的报告说：“里弄居民工作还是城市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数众多的家庭妇女，和一部分闲散社会劳动力，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属还有待于继续加强改造；一部分个体经济尚未完全走上集体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员会组织还不纯；这和当前已经到来的大跃进形势极不适应。在1958年里弄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组织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积极态度，但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家属加入公社做出了一些政策性规定：第一，除对一些小业主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公社外，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要急于让他们入社；第二，不要动员他们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来，也应加以劝阻。第三，也不要动员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饭时，应当说服他们等到食堂办好了再说。第四，不要动员他们对公社工业或其它方面投资。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一、关于整顿和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党对公社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问题；二、关于政社合一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三、关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四、关于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产协作、大搞经济综合利用问题；五、关于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既要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又要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既要抓生产建设，又要安排生活（即将有限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正如《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说的，是希望达到组织生产和生活、振奋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

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乐观地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华社连续发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华社发了综合报道《我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报道说，全国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达2000万人，办起了工业生产单位56000多个。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发展，而且能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这一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加速，到8月底，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已达到1077个，公社人口5693万人，达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县城人民公社）1032个，其中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组织的417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97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组织的484个。参加公社人口6065万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区的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几点不同：其一，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区街政权为依托办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权的牌子，相当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业、机关、学校组建的，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而不承担政权机关的职能。其二，农村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虽然一度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还是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国营工厂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国营工厂下放的部分产品。其三，从分配制度上看，农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实物供给和少量的工资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则基本是实行工资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带动下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增加城市的共产主义因素，削弱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对城市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大饥荒同时发生的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实亡，无疾而终。

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消失，它留下了三个结果，一是留下了区街工业，一些不能到大工业就业的人，在这里就业；二是“对旧城市进行了改造”，即对旧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扫荡。三是消灭了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市个体工商者，他们有的进入了街道工厂，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简中，被下放到农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于 1958 年夏秋之间，停于 1961 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么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 500 多户人家，其中 200 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 200 多人做饭，现在只要 40 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 200 人做饭变成了 40 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 10 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到 1958 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 340 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 90%。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 1958 年 11 月 20 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 9800 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 150 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 90% 左右。《宁夏日报》1958 年 12 月 6 日报道，全自治区 152 个人民公社建立了 9748 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 23.4852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 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 5000 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 年 10 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 年 7 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 10 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

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做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五六月份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

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 1960 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本书作者在 12 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 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 396 个食堂当中，有 176 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 年 5 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 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 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 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 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 1958 年秋后有 30 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 3500 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 99% 以上。1959 年 6 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 49004 个，比原来减少了 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 164 万户，占总农户数的 19.65%，较原来减省了 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 年 6 月 22 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1959 年 6 月 29 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 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

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 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 7 月 23 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凯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 年 9 月 20 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 年 9 月 22 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凯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 年 5 月 22 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 7 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垮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

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 1960 年 1 月份统计，截至 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 3919000 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 4 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 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 年 2 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 99%，河北为 86.1%，山西为 81%，甘肃为 63.3%，山东为 55.4%，黑龙江为 40%，辽宁为 33%，吉林为 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 1960 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 年 2 月 24 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 月 4 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 1960 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 1961 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做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

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 2800 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 1960 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 1960 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 2 万 8 千多人。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 1960 年 4 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 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 88.6%，其中河南省达到 99%。6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 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 14 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 18 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至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灾难。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 1958 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 1958 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 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 1959 年春节前，才发现 5 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 20 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 1958 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 年就占 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 1958 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 6 生产队全队 70 户人家，就有 64 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 1960 年 1 月到 12 月，就有 241 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

“洗毛芋子”，265 人被扣饭，230 户被搜查，99 人被罚苦工，68 人被罚款，27 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 17 人，致残者 3 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信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 70 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 16 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 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 19 个省市的统计，1959 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 785 起，中毒的有 8042 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 3843 人，已死亡 200 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 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 7 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 12.5% 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

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 13.16%。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 1957 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 0.94 元，1961 年，农业用工 1466 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 0.69 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 1812 个，工值就降到 0.32 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 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 54 头猪，100 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 年全队只有 4 头猪，11 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 年 4 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 月 9 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 13 人之多。1960 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 39 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 1961 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

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图 17-1 毛泽东派调查组手迹。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 3 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 3 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克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 4 月 12 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 月 14 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 月 15 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 1961 年 5 月 9 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 1961 年 5 月 9 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 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 年 5 月 11 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 25% 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 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办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 多年以后的 90 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 1958 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是随着“三面红旗”而起的，它的产生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风”同时肆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五风”以“共产风”为主，相互伴随、交织作恶，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的一个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8月30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介绍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

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 5000 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 3000 多个。

1958 年 10 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 月 9 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刮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1958 年 10 月，山东寿张县做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 200 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 年 11 月 4 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 2 万斤；建成 4 至 6 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 993 个自然村改造成 25 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 月 6 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 年 1 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 1958 年 9 月底。共有农户 5875 家、23025 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 月 7 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10 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

的各项福利事业。11月17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头猪、36251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头，鸡死了3691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个。三天内将27所学校合并为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子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间，损坏农具360件，平调木料5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劳动日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铁岭县汛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

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 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 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 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 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切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 年 8 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11 月 6 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11 月 21 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 24 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 50% 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 60%、工资部分占 40% 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 65-70%、工资部分占 30-35% 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 23 个省、区的 21176 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 16610 个，占 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 2872 个，占 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 989 个，占 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 261 个，占 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 123 个，占 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 322 个，占 1.51%。在分配给社

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 20 个省区反映，一般是 3-5 元。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 8 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 8431 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 6393 个，占总数的 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 2039 个公社，占 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的情绪。此时又返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 1.05 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 2 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1958 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 15 天内建了 1 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 25.7 万人。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 年全县建了 494 座工厂和 1205 座高炉，当时全县仅 30 万人，平均每 250 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 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 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刮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 年第 4 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

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遂平县 10 个公社 8 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 570 多所，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 44 所红专大学。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 7 月底，全国已有 639 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 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 年 8 月和 10 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 5000 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 22000 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 60 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

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有关。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4月

召开的国家统计局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胀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年3月5日，在广东省委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拔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話。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

人、妇女搞秋收，有 10% 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 1958 年一直搞到 1960 年。1960 年社员说：“58 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 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4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共计960人。仅奉贤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个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364人。经初步调查，公社党委副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农民的就有55人，占上述干部总数的50%，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农民有329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农民有29人。

10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1800多人（占干部总数近20%），其中725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罚站、罚跪，用针刺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段进行折磨。

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78891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9000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

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

埋下了伏笔。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摩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年7月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并加以鼓励。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

口号。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月27日，他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进的话。20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云涌。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营的；四是盲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感。但是，这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

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 1000 斤，他就来一个亩产 2000 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1952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 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

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日夜批斗，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34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积极办！”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思想的指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

如果没有舆论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刻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分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七、“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 1958 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 年 11 月 3 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 1958 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9 月 18 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 50 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决心。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

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

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年“五风”比1958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非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危害。

“五风”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依存在。到20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新的“浮夸风”机制。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任何一个政府，面对危机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面对全国性的大饥荒，也曾调整政策，纠正错误。这主要在 1958 年 11 月到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之间的八个月。

毛泽东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泽东把执行“三面红旗”的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对错误的纠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许动摇三面红旗为前提的。”在庐山会议以后，连这个限度以内的纠正措施也废除了。1960 年又一次大跃进，又一次共产风，1961 年又一次纠偏，但为时已晚，大饥荒持续了三四年。纠正错误的迟缓、波折、低效，不仅反映这个制度信息闭塞、机制僵化、领导专制等种种弊端，还反映这个制度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

一、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自1958年夏秋以来，由于大跃进搞乱了全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毛泽东的认识有了转变，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有所冷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这八个月间，采取了一些纠正偏差、克服困难的措施。毛泽东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见本书“人民公社”一章），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除了上述会议，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会议和信件中，毛泽东除了讲一些纠正偏差的话以外，也讲了另一面的话。例如，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他还是想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过反对“一平二调”的话，但他也说过“公粮、积累、劳动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他认为“现在只能部分地调，全省全国调不行。”他主张在公社内部可以无偿调拨，搞公社范围内的“小全民所有制”。他说过不能一下子否定价值法则，但

也说过“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他讲过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认为“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在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宣传部门继续歌颂“三面红旗”。对于1958年秋季以来出现的大量问题，毛泽东肯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20日报批的《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的意见：对报刊工作的态度是，继续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进行充分地宣传，只宣传成就和积极方面，一般不报道消极方面。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却有些人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是一种左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

在转变指导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也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社员饲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养猪，有所放松。

指导思想的这些转变和上述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在庐山会议及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都“一风吹”。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五、六、七三个月内农村出现了一股右倾歪风：改变了“基本队有制”，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吹掉了部分供给制；吹掉公共食堂。其实，农业部党组指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在执行中共中央向农民让步的政策的结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发出的三个文件的结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转了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说农业部党组揭露的这些问题“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其实，毛泽东对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几个让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爱将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书记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说：“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有的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当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应该积极办好，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反右倾以后的1960年又是坚持大跃进方针的一年，这一年饿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大跃进中退回来。但是，在中国当时那种政治制度下，身处中央的决策者们很难得到下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发现问题总是要晚几个月，而且他们知道的危机状况比实际情况要轻得多。纠错过程又和反右倾交叉，反右倾不仅阻碍纠错，还助长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虽然努力纠正错误，但大饥荒还是持续了三四年。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毛泽东不是一个迟钝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3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书记的汇报时，就开始对这些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说是“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4日，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议论十年规划时，毛泽东说：“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反映，群众中有人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泽东还说，钢铁不去赶美，只赶英国。他还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讲快了。”9日，针对一些人回避商品经济的倾向，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他说：“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但是，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能说，别人说了就有右倾之嫌。所以，这些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话都是毛泽东先说出来。毛泽东说出了这些话，又被他的下级奉为“先知”、英明。由于批评反冒进、反右派等残酷斗争，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毛泽东说了这些话，也没人敢付之实践，还得继续唱高调。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太快、要有条件的时候，刘少奇说，达到150元-200元的消费水平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消费水平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转了。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高层有人如此继续唱高调，到下面继续唱高调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情有独钟，对“群众运动”倍加爱护，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基调。现在毛泽东低调讲话，大家看作暂时的，不是根本的。何况毛泽东在讲这些低调的话时，还讲了另一面的话。报纸上还成天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对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低调讲话没有认真传达落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还认为反“三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山西省委

第一书记陶鲁笏说：“有纠正高指标错误的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见难以落实，就把纠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诉到生产小队一级干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几个问题”。这封信一共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为了反对高指标，他对生产队的干部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由于相信1958年粮食高产，认为粮食吃不完，几位中央领导人提倡“少种、高产、多收”，主张减少种植面积。毛泽东告诉六级干部，这种说法三年不可行，还是要多种。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要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句话表明，毛泽东还是希望达到较高的目标。唱低调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聪明的下级早就看透了了他的真实想法，按照他的真实意图行事。如吴芝圃、李井泉等。

毛泽东深知，底层干部和农民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过中上层干部，直接向底层发布他的意见，有时直接发动底层。这封信如此，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这样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级干部搞坏的。

问题发展到大批饿死人的程度，毛泽东深感到受了下面干部的欺骗。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组织和指导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率队分别赴浙江、湖南、四川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这些调查，了解了不少农村真实情况。但为时已晚，大错早已铸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整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即十二条）向全国下达。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下达后 20 多天, 即 1960 年 11 月 28 日, 毛泽东表示: “自己也曾经犯了错误, 一定要改正。”他的这个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对一个报告的批示的形式说出来的, 这个报告是中共甘肃省委 1960 年 11 月 25 日报告, 批示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从中可以看作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 他说还想看一遍, 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 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 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 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 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 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 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 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 是马列主义的。但是, 在那一段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 “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是一个过程, 有的地方可能较快, 三四年就可以完成; 有些地方可能较慢, 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改正了, 改为从现在起, 至少 (同志们注意, 说的是至少) 7 年时间公社现行的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 也是队共社的产, 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 至少 20 年内社会主义制度 (各尽所能, 按劳付酬) 坚决不变, 20 年后, 是否能变, 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总之, 无论何时, 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 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 而是依据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这个自我批评的意思还是制止“共产风”。但是, 有些地方“共产风”一直刮到 1961 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理想, 在各级干部中印象太深了。这是中国舆论工具的功劳; 也是因为, 实现共产主义, 已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面, 考核干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是看他共产主义信仰是不是坚定。

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瞒产私分的问题使毛泽东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转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为了抑制所谓瞒产私分，毛泽东等人纠正不顾条件过急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偏向，从所有制上退回来。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六次讲话，重点讲调整所有制。他说：

要基本消灭三级所有制（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把三级所有制变成一级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这个过程。

就在郑州会议期间，1959年2月28日，毛泽东对《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中说：

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

为了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毛泽东建议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1959年3月9日，他在写给各省委书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立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解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

在毛泽东建议下，各省都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各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按毛泽东的意见，也请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人，即所谓“观潮派”参加会议。安徽的六级干部会从3月9日开始，18日结束，参加人数达1万人，内有“观潮派”1000多人。广东的会议参加者有16000人。这些会议都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算1958年一平二调的帐，清退物资财产。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召开万人大会，搞“三级检讨，三个兑现”：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让基层干部把话说出来，做到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三个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的三个报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级检讨，三个兑现”的作法。但是，这只是口头文章，实际上没有兑现，如果真的兑现了“缺口粮的，立即供应”，那就不会饿死人。

不过，从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绩，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泽东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中有言在先：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定 1958 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会议和六中全会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由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在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中，干部们头上一直有一把悬剑，罪名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观潮派、算账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一把把悬剑使人们宁左勿右，阻碍着有限的纠错政策的落实。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人们对错误的估计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错误只是“一个指头”，即只占十分之一。超过了这个范围，悬剑就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

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为了纠正“共产风”，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还要求各地清退“共产风”中刮走农民的和生产小队的财物。有些地方也赔了一些。如江苏省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归还社员小农具 180 件，苗猪、小猪、肉猪 27 头，羊 33 只，其它没有偿还的也计价，答应偿还。农民的房子已经拆了，重建是很困难的，拿走的东西大部分都挥霍了，退赔很不容易。由于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报上来不少公社退还给生产队、生产队退还给农民的数字。这些数字大部分是虚夸的。清退工作 1959 年春天开始，但进展十分艰难，在以后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退赔问题：

1959 年 2 月郑州会议以后的各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清退是一个重点内容。1960 年 11 月 3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中的第二条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种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1961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说，中央 1960 年 11 月 3 日的紧急指示信和 1961 年 1 月 20 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后，各地都进行了退赔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总的来说退赔工作做得不彻底，再次强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

中共中央这些指示在基层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请看江苏省的两个资料。

1960 年 11 月，江苏省常熟县莫城公社已经进行了“三反”，10 日工作组进村与公社干部开了会，11 日、12 日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两个会上都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十二条”，并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在食堂设立登记处，登记社员被“平调”的物资和去路，制定兑现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兑现阶段。传达后群众普遍欢迎，认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众怕十二条不能兑现。干部中有人有情绪。他们说：“搞一平二调时是上面刮起来的风，通不通，三分钟，不通也得通。现在群众批评，退物赔款难上加难，越想越冤。”“我们这些小兵小卒总是先挨当头炮，刮共产风带头上阵，批共产风带头检查。”

共产风共刮了五次的江苏省曲唐公社胡庄大队。十二条下达后，强调退赔兑现。当然，要完全兑现是很难的。只要兑现一点农民就感激不尽。七队社员刘文彬退赔得到了 13 元钱，高兴得不得了，说：“再不好好生产，就对不起毛主席。”七队社员马金荣退回了两件农具，高兴地说：“做梦也想不到拿去的東西还能拿回来。”兑现的第二天早上，队长的喇叭还没有喊，社员已经到齐，个个争做重活，一会儿功夫就把公路两边全都种上了蚕豆。

1961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洛阳地委关于退赔的报告。这个文件介绍了灵宝县大王公社“政策兑现”的情况。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纪登奎亲自到这个公社抓中共中央“十二条”的落实。层层召开“兑现会”。但是，“各大队兑现退赔的财物合计，只占平调总数的 23%”，退赔中最困难的是，大办钢铁的亏损，兴修水利的亏损，公社无法向大队退赔。于是，“地县社工作组决定，在元月 1 日，又召开第二次兑现会，除了大办钢铁和修水利平调的财产以外，其它基本上退赔彻底了。”中共中央将大王公社的退赔经验向全国介绍。要求各地“充分

发动群众，真正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经过几次严肃的斗争”来搞退赔工作。实际上，斗争再严肃，公社也无法退赔已经消耗了的财物。例如，直到 1961 年 6 月，四川省眉县大办钢铁中平调走的财物，基本没有退赔；大办水利、大办交通的调走的财物，只退赔了一小部分。中共四川省委退赔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退赔中，县、公社一级没有钱退赔，要求财政拿钱出来；而财政又拿不出钱。各地工商部门组织生产出一部分退赔物资，但由于平调单位没有现金支付，以致这批物资积存起来，退不到社、队和社员手中。

有些地方在退赔时定了很多限制。江苏省东台县卢南大队规定：“在退赔时，苗猪和小肉猪退还给社员，母猪还是全部归集体饲养，以免发展资本主义。”“纠正共产风是人民内部的事，地主富农没有参加运动的权利，对地主富农被刮走的物资，暂不清算”。据 1961 年 8 月统计，全国平调总数为 250 亿元（较原来估算的 111 亿元增加了 1.4 倍），已退赔了的占平调总数的 20%-30%。经过退赔，大部分人相信今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但是，退赔普遍不彻底，据各地统计，实际退赔到社员手中的，只占平调数字的 20%-30%，其中实物退赔很少。有的地方又发生了新的平调现象。在 1961 年夏收中，有的地方还没收群众自留地产的小麦，顶上交任务；有的把自留地产的粮食顶分配口粮食。

五、扩大农民自由，但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集体组织不能保证农民的生活，只好给社员一点自由，让他们自找生路。从 1959 年春夏之交开始，对农民的某些政策开始松绑。

1959 年 5 月 7 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为改变牲猪头数大量减少的问题，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也是如此，为此，必须分配社员一定的自留地，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 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二分自留地。

1959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四点指示：一，社员私养的猪羊鸡鸭兔卖得价款归社员个人所有，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养猪羊鸡鸭兔，每月给社员放假几天；二，恢复自留地，不管喂不喂猪，都给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自留地不准社员出卖、出租和私自转让；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土地利用起来。这些土地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四、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归社员私有。

恢复自留地和家庭饲养以后，又放开了农村集市贸易（有的地方称为“自由市场”），以调节农民家庭种养产品的余缺。以江苏省为例，集市贸易是 1960 年底和 1961 年初允许恢复的。到 1962 年有了一定的发展，几年不见的生薑、百合、荷藕、荸荠、茨菇都有卖了。农村集市贸易的商品流通量，大致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15% 左右。集市贸易刚开放时，食品的价格比国家牌价高出两倍以上，高价格刺激生产，使东西逐渐多了起来，价格也下降了，到 1962 年 6 月，食品只比国家牌价只高出百分之几十。虽然开放了自由市场，但还是把自由市场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党内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到自由市场上买东西。

这些政策是受农民欢迎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偏向农民利益的情况（即偏右），各级党委立即制止。中共广东省委很快发现并纠正了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宣教动态》1959 年第 60 期发表了广东省委的作法，8 月 1 日，毛泽东就作了批示，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中共中央于 8 月 19 日转发了这个材料和毛泽东的批示，要求“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这实际是压农民的肚皮，让农民不吃，保城市、保出口。

实际上，有些地区并没有按中央 5% 的要求给足自留地。江苏省全省平均只占 4.7%，有的地方不足 4%。一部分干部认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怕影响集体生产，怕社员搞“自发”，对于恢复自留地的规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四川省根本没有执行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

六、实行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在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原则。怎么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挣得越多，分得的劳动报酬就越多。开始是“死分死记”，壮劳动力劳动一天记 12 分，普通劳动力劳动一天记 10 分，妇女和儿童劳动按劳动能力不同，一天记 5 分或 6 分不等。但“死分死记”的办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后来又发展为“死分活评”。每天劳动以后，晚上开会评工分。但评工分时拉不开面子，很难评出真正的劳动成果。后来又发展为“定额包工”的办法。这一亩地交给你锄，锄完了，再检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给你 30 分。从包工发展到包产到组，最后发展到包产到户。所谓包产到户，就是这块地包给一个家庭，上交集体 1000 斤，多余的归自己。责任越明确，劳动和分配挂钩越紧密，劳动积极性就越高。包产到户也叫“责任田”。但是，包产到户主要生产过程是家庭经营，打破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原则，因而被认为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些地方实行种种变相的包产到户。这实际是生产队自发搞起来的，1959 年 5-7 月就出现了。1961 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广，安徽 10 户农民中有 8 户参加包产到户。当时把分到农户的田称为“救命田”。各地也先后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如甘肃的临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参加包产到户的农户十中有七。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也有大体同样的比重。到了 1962 年 5 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定，全国包产到户者至少已占总数的 20%。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例如，广西出现了 7 种形式：1，分田到户；2，包产到户；3，“公私合营”，即早造私人种，晚造集体种；4，“井田制”，即征购田集体种，口粮田个人种。有的实行三三制：即口粮田，上交田，照顾田；5，“抓大头”，即畜地分到户，水田集体种；6，山田，远田，坏田分到户，谁种谁收；7，化整为零，即过小地划分生产队，有的成了兄弟队、父子队。江苏省有些地方在全部农活包到户的同时，还以“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的办法，实行了全部或部分农作物（如山芋等）包产到户。

然而，包产到户是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的，也是与集体化的方针相悖的。在三年饥荒以前的 1956 年，浙江省永嘉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和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戴洁天，就在这个县的燎原合作社搞过包产到户的试验。从生产看效果非常好。当时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1958 年初，李云河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劳动改造。戴洁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返农村。

在三年大饥荒中，挽救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如果没有这项措施，可能还要饿死更多的人。但是，对这是群众的自发的救命措施，省、县级领导人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有安徽的曾希圣 1961 年才明确支持并推广，不过，曾希圣也是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对外称“包工包产责任制”，实际搞的是“包产到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微妙而多变。在 1959 年，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饥荒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刚露头的包产到户极力打压。1959 年 11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指出，“包产到户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一丁点也不许留！”同年 12 月 4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的文章，把反包产到户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

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的《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语中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作法，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关于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29日写的，并作如下批语：

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同志和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王慧智同志，借着整社和包工包产的机会，推行所谓“地段责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张把土地、牲畜、农具、劳力等，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们赞扬所谓“满地人，不成群”的单干景象。他们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单干户。这里明显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不彻底地加以肃清，党的总路线是不可能顺利贯彻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对于这种思想，各地党委应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险恶面目彻底揭露，把他们的市场缩小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彻底搞臭，以保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批评“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也是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在十个公社中选择十个大队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中共中央的按语说：“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

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条件下，在政权机构内部反对“救命田”的力量相当强大。有些领导人，批判右倾比毛泽东还要坚决。据对有关文献的分析，中共中央上述四个报告的按语，除湖南这个报告经过毛泽东的修改以外，其它都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到了1960年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真正知道饥荒的严重程度，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以生产责任制的名义默许包产到户，但不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对曾希圣说的三句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微妙态度：1961年3月15日说：“你试验嘛！搞坏了检查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1961年7月说：“你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1961年12月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

1960年以后，由于大量饿死人，中共中央再没有打压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各地发展很快。到1962年秋后，饥荒稍有缓解，中共中央就明确表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下令各地“改正”。

原来搞包产到户比较多的地方，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就千方百计地淡化包产到户的情况。广西桂林地区龙胜县是搞包产到户比较有名的地方。1962年6月6日到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和王任重，到龙胜县听汇报，召开座谈会。他们写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座谈纪要》中写道：“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目前形势的主流。同时确有一部分贫下中农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暂时的动摇；也确实还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积极进行单干。但这不是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事实上单干并没有那么多。那是因为界限不清，把那些正确地采取田间管理责任制和其它基本上仍是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这个报告表明，在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农民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很需要这样的报告，7月22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

为了推动改正“责任田”，196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安徽改正“责任田”情况》为题，向全国转发了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的总结。这个文件介绍，据最近统计，安徽省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0100多个，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3%。这个文件说，从改正责任田过程中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实行责任田虽然不到两年，但是已经暴露出来许多严重恶果：生产资料支配权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很大变化；生产上不能统一计划，不能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分配受到破坏，集体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

改正责任田的过程是一次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当初实行责任田的积极分子，从死亡线上救助农民的基层干部，却遭受到打击。这种打击不仅在改正的过程中，在以后的“四清”和“文革”中，还加倍清算这笔政治账。

七、下放城镇职工，减小粮食压力

粮食征购是为了满足城镇的需要。工业上得太快，城镇人口增长太快，使农业不堪重负。陈云说，三年来招收职工 2500 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 1 亿 3 千万，现在看来，并不恰当。大跃进中，各地上的工业项目太多，造成物资、财政十分紧张。因此，“下马”一些工业建设项目，精简城镇人口，是解决粮食不足和缓解紧张气氛的一个必要措施。陈云对此作过精确的计算，他说，下乡 1000 万人可以少供应粮食 45 亿斤，下乡 2000 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 90 亿斤。

在大跃进中，由于要尽快地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大批农民进城当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粮的人。他们由农民身份变成了工人身份，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长，粮食一紧张，他们就成了精简下放的对象，又由工人变成了农民，社会地位下降。千万个家庭由此经历了一次悲欢离合。陈云建议，“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那里来的，就回到那里去”。

精简职工从 1959 年在一些地方就开始了。但精简人数不算很多，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三面红旗”重新高高举起，各地又进一步招工。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资金和原料不足，一些工厂无法开工，大批工厂被迫关、停、并、转，一些基建项目被迫停止，成千上万的工人无事可做。大规模精简职工是从 1961 年伴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的。196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5 月 31 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发言。他说，要解决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第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如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等；第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第三，进口粮食，但没有外汇，没有运输力量；第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以上四条，第一条是基本的，第二、第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非采取不可。中央接受了陈云的建议，1961 年 6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 1960 年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 2000 万以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加紧执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携幼回到了农村。1962 年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又加强了城镇人口下放的工作。

当年到底有多少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1963 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报告》中说，从 1961 年到 1963 年，全国减少职工 1833 万人，城镇人口减少 2600 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 2800 万人。

在中国当时那种制度下，不管做什么事，中央一声令下，各地总是要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下放城镇人口任务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标是 81.2 万人，实际下放 98.0 万。河南省任务是 109.9 万人，实际下放 120.6 万人。福建省的任务是 87.3 万人，实际下放 94.5 万人。除了近三年进城农民以外，城市中其它弱势群体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 1961 年到 1963 年间，将社会闲散户和无固定工作户计 6000 户、2.6 万人迁往安徽农村。在齐齐哈尔市，1960 年下发了 11.4 万人，其中在城里的盲流 3.5 万人，无固定职业的 5.6 万人。在有些地方，劳改、劳教人家属，如果在农村有家的，也要下放，这种家庭里超过 16 岁的学生，也是下放对象。

在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过程中，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一些阻力。被精简的职工，有的是城市户口，在农村无依无靠；有的早就脱离农村，在城里已经成家立业；如果下乡务农，不仅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等方面实际困难很多，而且农村并不欢迎他们。因此，精简职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1961年计划压缩城市人口35600人，到10月底，只完成任务28390人，很难完成当年计划。11月份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把剩下的指标进一步下达到各个部门，要求所有的企事业单位，摸底排队，落实计划，该停的停，该并的并，该减的减，把一切可以精简的人员，迅速压回农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1961年的计划，1962又下达了25000人的计划。有些地方在精简过程中还出了些小乱子，如江苏省常州市大明纺织厂1962年5月20日到23日，70名安排下放回农村的老工人，集体闹事，经过几天的说服工作，事态没有扩大，这70名工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农村去了。也有的城市，一些确定去农村的城市人口并没有去农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过种种不合法的手段谋生。但总的说来，两千多万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是很不容易的，这只有在中国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几千万人回到农村，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告状，70年代，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时，就接待过不少这样的来访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决，但很少有如愿者。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上述纠错措施，都是针对“三面红旗”中过激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三面红旗”造成了大饥荒。所以，一纠错，就会伤及“三面红旗”，一伤及“三面红旗”，就触动了毛泽东等人最敏感的神经，认为有一股“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认为大量饿死农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红旗”，而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来自何方？毛泽东认为，在上层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在基层则来自地、富、反、坏、右。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是他们造成了农村的严重问题。自从1960年底信阳事件在党的高层揭露以后，毛泽东就把过去九分之一（“一个指头”）的问题改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问题。而这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基层干部中坏人掌权造成的。这就把农民受摧残的原因归罪于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10日，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11月1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个月内把三分之一地区的形势扭转过来，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的占三分之一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扭转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在同一报告上，毛泽东批给周恩来一句话：“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革命补课问题。其中写道：

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你们已有所知。现将中央监委工作情况反映215号转发给你们。这个反映中描述的贵州省的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令人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要知道，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总共占全国人口10%左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种种企业、事业、学校、机关、部队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组织中。因此，我们有绝对必要改造他们。但是，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天天在影响和腐蚀我们。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报复和疯狂挣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关系的改变，经过一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只要我们领导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钻进来的机会，把我们中间的革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拖过去，使部分地区、单位、至少个别地区、单位党的

领导变质，随着也就极大地破坏现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材料揭发的事实中，已有不少明证。由此可见，整个社会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任务。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绝望的破坏和挣扎，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麻痹不得。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可以拿来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河南信阳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就很彻底。但也被毛泽东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饿死人较多的地方，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像土地改革时期那样，像斗争地主恶霸一样斗争基层干部，让农下中农申冤诉苦，然后全面夺权。（见本书“祸起中原”一章中“信阳事件”）本书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了解当年情况时得知，在民主革命补课中，也像信阳一样，有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摧残。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组对据四川省合川县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由于反瞒产私分、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农村干部受打击的面很广：全县共有干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处理了5184人，占干部总数的20.5%。其中，公社党委书记被处理的占60%，大队正副书记被处理的占57.2%，生产队正副队长被处理的占24.8%。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才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但其责任应在中央，而不能让一些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一波三折地调整极左政策，也曾下令纠正农村干部作风，改变 1958 年大跃进中一些过激的作法，但是，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切实措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见死不救，继续高征购，继续出口，从而加剧了饥荒；二是在建设速度和经济指标上，继续坚持大跃进，迟迟得不到调整。

1958 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 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 1959 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 1959 年 4 月 6 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 15 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 2517 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只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将这两个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内送到 15 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是给 15 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两个月）紧急危机”。对这么大面积的危机，毛泽东没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还是当作局部问题交给地方自己处理。特别是没有在粮食上松口。

1960 年 1 月 7 日到 17 日，正是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遍地的饿殍，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他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 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 1959 年形势更好；确定 1960 年钢产量为 1840 万吨，粮食产量 6000 亿斤。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共产风等“五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1959 年 4 月 23 日）。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山东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其实，当时饥荒正在迅速发展。26 日，毛泽东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

1960 年 10 月 26 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他还是把信阳事件当个别问题处理，当一般工作中的问题来处理。也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松口。

在粮食征购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方面，1958-1959 粮食年度征购数达 1125.44 亿斤，

比上一年度高出 22.32%，大饥荒全面出现的 1959 年，不但没有减少粮食征购，征购数反而比上一粮食年度高出 88.85 亿斤，高出比例为 7.89%。（从生产年度看，1959 年的征购数比 1958 年高出 103.18 亿斤，高出比例为 9.45%）。而返销给农村的粮食，1959-1960 粮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 21.29 亿斤。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 1959-1960 年，国家不仅没有救济，反而从农村多拿走粮食 67.56 亿斤。（见表 20-1，表 20-2）在饥民口中夺粮，是一件十分残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现了本书前面所介绍的鲜血淋淋的反瞒产私分的大规模惨剧。直到大饥荒发生了一年半以后的 1960 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粮食征购数。1960-1961 年度，粮食征购数从上一年的 1214.29 亿斤，降低到 780.84 亿斤，降低了 433.6 亿斤（从生产年度看，1960 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 342.53 亿斤），但向农民返销的粮食也减少了 164.4 亿斤，实际农民负担只减轻了 269.2 亿斤。

表 20-1 大饥荒时期国家对农村粮食的征购和销售 单位：贸易粮，亿斤

征购与销售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从农村征购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销售给农村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资料来源：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表 20-2 生产年度的粮食征购数 单位：贸易粮，亿斤

年度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数量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资料来源：同表 20-1。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不仅在粮食征购上不让步，1960 年 1 月，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中共中央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 1959 年夏粮登场时计算起，到 1959 年 12 月，已经收到 1142 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计划 1075.8 亿斤超过了 6%，按粮食季度计算，到 1959 年 12 月 25 日止，已收到 1016 亿斤，完成计划的 94%，再加上 1960 年五六月的新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 1959-1960 粮食年度，收到 1200 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央在批转这个文件中写道：“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饿死人最多的 1960 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 20-3 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 年 4 月到 1960 年 4 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 887.03 亿斤（1959 年 11 月初），最少也有 319.亿斤（1960 年 5 月）。1960 年 4 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 403.51 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 482 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 1.4 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由此可见这个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 20-3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57-58 年	58-59 年	59-60 年	60-61 年	61-62 年
七月	354.85	388.94	338.79	265.88	157.46
八月	401.90	398.71	395.84	289.11	191.30
九月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十月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十一月	690.66	658.02	887.03	540.08	460.57
十二月	756.91	748.43	848.98	572.11	490.02
一月	725.08	714.42	764.15	510.35	438.79
二月	676.75	654.56	673.19	444.50	394.88
三月	601.66	556.01	544.54	359.83	328.86
四月	507.62	433.50	403.51	267.89	257.98
五月	404.53	319.00	286.22	190.86	200.92
六月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资料来源：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 1960 年 6 月 30 日，全国粮食库存为 301.48 亿斤，和表 20-3 中的 297.71 亿斤差不多。这 301.48 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 2.30 亿斤；天津 1.15 亿斤；上海 2.53 亿斤；河北 18.26 亿斤；山西 8.16 亿斤；内蒙 5.49 亿斤；辽宁 7.89 亿斤；吉林 5.08 亿斤；黑龙江 20.41 亿斤；陕西 15.96 亿斤；甘肃 4.81 亿斤；宁夏 0.72 亿斤；青海 1.25 亿斤；新疆 4.45 亿斤；山东 22.44 亿斤；安徽 7.05 亿斤；浙江 12.37 亿斤；福建 2.72 亿斤；河南 25.07 亿斤；湖北 13.22 亿斤；江西 7.14 亿斤；广东 7.40 亿斤；广西 2.84 亿斤；四川 41.61 亿斤；贵州 11.49 亿斤；云南 17.43 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 100 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 25.07 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 13.22 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 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 50 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 1957 年相比，1959 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 2500 万吨，而 1959 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 415.75 万吨，比 1957 年的 209.26 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 20-4）。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 415.75 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 1.2 吨原粮。415.75 万吨贸易粮相当于 500 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由于本书引用各地档案资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称不一）。1959-1961 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 164 公斤，1957 年为 204.5 公斤。按 1957 年的标准算，500 万吨原粮足够 2450 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 1960 年，还继续出口粮食 272.04 万吨。1959 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1960 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 20-5）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 年 4 月 19 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

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 2.6 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 1960 年 4 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 7 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 6 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

表 20-4 1956-1965 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

单位:

活畜: 万头, 活禽: 万只, 红枣、香菇: 吨, 其他农产品: 万吨, 啤酒: 万箱

种类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	265.12	209.26	288.34	415.75	272.04	135.50	103.09	149.01	182.08	241.65
花生油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鲜蛋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猪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	130.19	164.67	171.86
冻猪肉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冻家禽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冻兔肉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产品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4	9.25	12.00
苹果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桔柑	7.00	7.11	8.82	7.69	6.32	3.41	2.97	3.36	3.75	3.72
猪肉罐头	0.96	1.01	3.20	2.88	1.41	0.89	0.57	1.38	3.26	3.51
水果罐头	1.46	1.88	3.81	3.40	1.96	1.92	1.83	2.62	2.75	2.52
蔬菜罐头	0.32	0.69	1.28	1.30	0.62	0.63	0.81	1.06	1.15	1.08
啤酒	3.47	8.27	4.22	10.25	7.38	7.91	7.99	15.03	29.46	41.82
核桃	0.35	0.46	0.39	0.45	0.39	0.39	0.24	0.26	0.31	0.41
核桃仁	0.55	0.54	0.26	0.55	0.45	0.20	0.17	0.28	0.43	0.51
黑木耳	502	491	475	414	331	128	184	269	396	469
红枣	1266	1158	1186	1318	1147	875	994	806	1057	1393
香菇	526	224	371	224	179	27	34	58	128	204
栗子	0.23	0.46	0.32	0.46	0.34	0.27	0.67	0.63	0.88	1.29
蜂蜜	0.39	0.17	0.41	0.44	0.45	0.22	0.26	0.40	0.75	1.29

资料来源: 1981 年《中国经济年鉴》VIII-47 到 VIII-50 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 年海外版) VIII-47 到 48 页, 花生仁出口数比内地版多一些。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 1959 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 303000 万元, 占出口计划的 110.8%。比 1958 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 28.9%, 其中, 猪肉供应出口 23.3 万吨, 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 冻牛羊肉 2 万吨, 为出口计划的 125%; 鲜蛋出口 5200 多万斤, 冰蛋出口 6208 吨; 活家禽出口 954 万只, 冻家禽出口 7022 吨。此外, 还出口苹果 10.2 万吨, 桔柑 9.1 万吨。

表 20-5 1956-1965 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数 (万吨, 原粮)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合计	14.92	16.68	22.35	0.2	6.63	580.97	492.3	595.2	657.01	640.52
其中小麦	2.62	4.99	14.83	3.87	338.17	353.56	558.77	536.87	607.27	
砂糖	17.61	11.93	20.91	2.6	23.38	118.66	99.56	49.69	59.88	70.79

资料来源: 同表 20-4。

从表 20-4 中可看到, 1959 年到 1960 年, 在全国饿殍遍地的时候, 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 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饥民! 但是, 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想到饥民, 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为什么抛饥民于不顾而急于进口机器, 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 所以在经济建设中, “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 1960 年, 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 年大炼钢铁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 10 月, 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 1959 年“为生产 300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 2000 万吨, 对外公布 1800 万吨。以后看到不行, 1959 年三四月, 在上海会议上降到 1650 万吨。年末实际完成 1387 万吨。1960 年又提出了钢产量 1800 万吨的指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 1960 年, 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撤走专家, 为了反击“苏修”, 咬着牙要“争气钢”, 钢产量不是搞 1800 万吨, 而是要搞 2000 万吨。除钢以外, 1960 年, 由于反右倾的影响, 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资产投资最能表现国民经济的冷热程度。1960 年, 固定资产投资达 416.58 亿, 不仅高于 1959 年, 还比大跃进的 1958 年高出 49%。在固定资产投资中, 93%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 1961 年被迫下马, 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表 20-6 大饥荒年代前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单位: 亿元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计	160.84	151.23	279.06	368.02	416.58	156.06	87.26	116.66	165.89
基建投资	155.28	143.32	269.00	343.72	388.69	127.42	71.26	98.16	144.12

资料来源: 1988 年《中国经济年鉴》XI-73。

现在回过头来看, 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但这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 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 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从 1958 年过激政策退回去 (所有制, 高指标) 是形势所迫, 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在这期间, 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 加剧了灾难。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 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 “他们知道出了毛病, 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 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 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 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 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 实际上最唯心, 说的是客观规律, 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 1848 年的资本论, 解决 1958 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 平心而论, 我要对人类负责, 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 “物资供应如此紧张, 不是一时的, 而是永

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从 7 月 2 日到 8 月 16 日，一共开了 46 天。8 月 2 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 月 2 日至 16 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 1959 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 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 1958 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 1959 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 30%，即可以减少 70% 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 665 万人，可以少饿死 1467 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 1959 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 1958 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鞫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

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

无心工作了……假如办 10 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 1958 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 1956 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 1959 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侯”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 7 月 10 日和 16 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 AB 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那时两人关系很密切，彭要找毛泽东谈事推门就进，直呼“老毛”，如果毛泽东在睡觉，就揭开被子和他说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已位处九鼎之尊，彭德怀还没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习惯称“主席”，还是称“老毛”。这在中国皇权制度中已经犯下大忌。

在“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在讨论公布1958年粮棉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彭说粮没有那么多。谭震林对他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同意了，但心中还有怀疑。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他觉得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那么多。在平江县他还发现了数字造假的情况。他认为按公布的粮食产量确定的1200亿斤的征购任务太重。在株洲，他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不能征购1200亿斤粮食，只能征购900亿斤。在湖南考察时发现农民挨饿的情况，连“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两米。有一位红军时期的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农民悲惨的生活，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是他在湖南老家亲眼目睹的。上庐山以后，他怎能昧着良心不“鼓咙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后来这成了周小舟的一条罪状：为彭德怀提供“炮弹”。

1959年5月，彭德怀到东欧国家访问，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访问时，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肃反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接见他时，彭德怀感慨地说：“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在罗马尼亚时，他给总参谋长黄克诚打电话，专门询问了国内的经济情况。

6月13日，彭德怀出国回京，他对国内问题十分关注，认真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很多。6月底彭德怀收到了到庐山开会的通知，他不想去，让黄克诚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开会去了。

北京到庐山开会的高级干部们先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到九江上庐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汉的火车上，彭德怀、张闻天、贺龙、康生等同乘一节车箱，车上交谈很随便。彭德怀都谈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的。后来，他的这些话都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错误，而严加批判。

在“神仙会”期间，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关系到毛泽东的内容。如：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7月3日上午）

“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高。……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7月4日上午）

“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7月6日上午）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7月7日上午）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7月8日上午）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扩大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

“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7月8日上午）等等。

柯庆施把彭的这些尖锐发言，送给了毛泽东。这些话，在原来的西北组《简报》中删去了，后来批判彭德怀时，又整理出来，当作批判的材料。

据彭德怀说，在“神仙会”阶段，周小舟到彭的住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话是周向彭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还谈了水利建设的成就。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说去年粮食数字造了假。还谈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彭对周说，这些问题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李锐在日记中记载这两次谈话的时间和内容，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绍了湖南的一些情况。彭德怀除了向周小舟重复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组，没有听到他的发言），还谈到，今年1月毛泽东找几个人讨论钢铁指标，陈云认为2000万吨指标不可能完成。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还说他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谈到铁托左右几十个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这时毛泽东脸色顿然发红。还对周说在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开展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

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彭对周说，有些意见想找毛主席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之后。他们三人都感到毛是能听不同意见的。周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谈一谈。彭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组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小舟赞成写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又觉得写信不易，还不如当面谈一次。他下午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又想到会议几天内要结束，于是下决心写信。

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以后，他亲自修改两遍，参谋誊了两次，于14日下午送给毛泽东。也许彭德怀自己不会想到，这封信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接着谈到“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彭德怀还肯定：“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解决。”

彭德怀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大跃进：“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谈到“全民炼钢铁”，彭德怀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这里，彭德怀说“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接着，彭德怀谈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

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接着，彭德怀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认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可以说，彭德怀这封信既没有锋芒毕露，也没有直抒胸臆，在讲缺点以前先讲成绩，讲缺点留有余地，并且一再肯定“三面红旗”。像德怀这样敢说话的人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之压抑，“神仙会”大概也“神”不起来。没想到这样平和的信，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后，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彭德怀没有想到这封本来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信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

7月18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覆水难收。善于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字条：“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信发下去以后，与会者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胡乔木、周小舟、李锐很支持彭德怀的信。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21日在第四组发言时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陶鲁笏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种精神，信中某些内容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贾拓夫在第三组发言中也表示，彭总的意见书总是好的，总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军队干部万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后来，有这类发言的人都受到批评和追究。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召于7月17日上山（毛泽东7月16日让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信让调来的，同时调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陈毅、宋任穷、安子文等）。把黄克诚召上山来，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起攻击的一步棋。如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在北京掌握军队，毛泽东感到不安全。把黄召上山来，不仅解了北京之忧，还可以一网打尽。黄克诚上山的当晚，彭告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给黄看。黄克诚看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得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提得引起重视。”18日，周小舟、周惠、李锐去看望黄克诚，他们三人都谈到在会上有一种压力，不能多说缺点。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上我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在这期间，黄克诚和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反兵”的本意是和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受批判时说成是“蓄意谋反”。

在毛泽东发起反击以前，与会者的发言中批评彭德怀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等人。陈正人有这样的态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庆施的影响，在会议期间，他与柯庆施住一栋房子。在毛发起反击以前，柯庆施和李井泉却没有在会上对彭的信发表意见。7月21日贺龙在小组全会上发言说：“目前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头脑发热和虚报。”他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

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

贺龙把火车上的私下闲谈拿到政治斗争的桌面上了，这个揭发非常要害。23日毛泽东讲话中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句很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揭发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这里说的“红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邓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谈话中，谈到庐山会议时，却在红军前面加上了“苏联”二字，硬说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问题。看来，邓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后，还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贺龙给彭德怀这么重重的一击，大概是出于俩人的关系原因。8月16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哪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也整过刘伯承、肖克等高级将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陈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7月17日，彭德怀的信交上去两天以后，下午5时到10时，毛泽东还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人去谈了5个小时。他们在一起吃饭，喝茅台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给李锐的感觉是“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从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泽东没有流露出反击彭德怀的意思。但当时会议的形势，犹如庐山气象：密云不雨，气压很低，云雾缭绕，山上的人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泽东心中。

事有凑巧，彭德怀回国不久的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兰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发表讲话中谈到，苏联在内战刚结束时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所以这些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我们就不搞了，就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认为，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让毛泽东占了理，这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原因。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是不对的。苏联《真理报》7月21日才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全文，只有这个全文中才有批评人民公社的话。新华社7月27日在《内部参考》2831期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刊出，胡乔木7月28日才将这期《内部参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就批给与会人员参阅。也就是说，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是在7月23日讲话以后。毛泽东7月16日就把彭德怀的信当作“意见书”批给大会，而且对会议作了两个新的部

署：一是重新编组；二是调援兵上山，这些显示毛此时已露杀机，这时赫鲁晓夫还没有发表讲话。中国作家权延赤也写过与麦克法夸尔类似的文字，他说，在苏联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后，在毛看来，“意见书”本身的内容已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事业而言，他的威信，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这些是远比彭德怀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言外之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是出于大局。40 年以后的 1998 年，邓力群也持这一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的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大同小异。因此，引起怀疑：里外互相呼应。”根据我上面列出的时间顺序，权延赤和邓力群的说法也是与事实相悖的。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李锐的书中只讲了他们这些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的一些活动，没有讲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李锐是不知道的。7月21日，这时距毛泽东的反击只有两天，由于左派的活动，对彭德怀信的指责的声音已经逐步升高，左派说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动和言论对毛泽东有多大影响，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已经闻到了某种气味。张闻天准备这天在第二组（通称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发言，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早晨打电话给张闻天，提醒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问题。张闻天不顾这些，却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其他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一直把话讲完。

张闻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长征到达遵义时，他支持毛泽东，参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随后，他代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担任到1943年，不过，后几年由于毛泽东专权，他的总书记只是名义而已。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麦克法夸尔认为，张闻天是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三面红旗”的主要策划者，而彭是配角。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李锐（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姚力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他们都认为麦克法夸尔这个说法只是他个人猜想，与事实不符。

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论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3个小时的发言中，张闻天讲了13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作了系统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锐，针对性强，几乎毫无顾忌。他强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领导经济“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1958年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说：“主席常说，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便于下面敢于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局面。”发言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他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评最多之处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是支持彭这封信的人，也认为这句话不妥当。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发言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说，我今天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德怀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 9000 多字，讲成绩的只 270 多个字。用了 39 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 6 月 30 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 177 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 176 号是近邻。7 月 2 日到 16 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7 月 12 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7 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7 月 14 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

7 月 17-8 月 1 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7 月 18 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 月 19 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

7 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 40 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 40 亿，而在于 9000 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 月 20 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 23 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

1959 年 3 月 30 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 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 1959 年，不是 1957 年了。”

在上海会议上，4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样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事前没有跟常委讨论，常委们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讲话什么。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会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这大概是指紧跟他的京官和省委书记。“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他讲的另一种倾向是：“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集中表现在江西省委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他说：“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江西党校、广东军区等材料，以及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上，本来没有加按语，有人还以为是批“左”的材料，毛泽东现在明确列为反面教材。接着，他针对彭德怀的信中说干部脱离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说：“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讲到共产风、讲到一平调，他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

他为刮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刮共产风的干部-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

少次检查了，从去年 11 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 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 30 公里，接近 30 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 30 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接着，他为食堂和大办钢铁辩护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在办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他正话反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 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 9000 万人上阵，补贴 40 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楂呀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篇讲话态度鲜明，对左派只是安抚，让他们“硬着头皮听”；说批评“三面红旗”的人“离右派只有 30 公里”；把中间派说成“动摇分子”。他在讲话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的说法。讲话中也讲了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责任，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但这些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情绪，不是诚心自我批评，不是“罪己诏”。毛泽东曾说过，他是不下“罪

己诏”的。

散会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7月23日听毛泽东讲话回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饭，沉默不语，他们虽然同住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在这以后彭德怀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7月24日（或25日）张闻天遇到彭德怀，交谈时张说：不能讲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听了讲话犹如晴天霹雳，闷头一棍。他们四人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田家英拾起一根烧焦的松枝，在石头上写了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7月23日晚，彭德怀怎么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呢？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当时的中国是“会议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后者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专制制度了。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连说情的可能也没有了。

毛泽东 7 月 23 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说好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后受到报刊舆论备加称赞的高官中，在庐山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于庐山会议档案还没有公开，我无法引证更多的资料研究 7 月 23 日前后高官们态度的变化。目前唯一公开的信史就是李锐根据他参加庐山会议的记录整理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庐山会议实录》中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高官们的态度变化淹没在复杂的事件和冗长的过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资料，按人头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个人在 7 月 23 日前后态度的变化。请读者原谅，在这一节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锐这本书的资料。我尽可能再引用其它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地避免李锐一个人的孤证。

1、刘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国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说是当选，实际是毛泽东指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当时毛泽东不愿意当国家主席，这把交椅就让给了刘少奇。但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最有实权的职务。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和邓小平因生病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如果刘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名义上刘是二把手，实际上刘是毛的臣下。刘的命运还是由毛主席。所以，刘还得看毛的脸色行事。

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时发了言。他说，1958年的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他谈到教训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义为失误辩护。

7月16日刘少奇讲话，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作为会议的开法。对于认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来说，这12个字中，“缺点讲透”4个字是核心内容。

李锐认为，刘少奇是主张反左的，在会议发言中没有明讲，但从许多言外之意看得出来。他曾找胡乔木长谈过反左问题，胡乔木没有敢向毛反映。刘少奇是毛泽东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泽东谈，还得通过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乔木向毛反映，这正如皇权时代丞相的意见还得通过皇帝的近臣转达一样。胡乔木虽然地位远低于刘、周、朱、陈、林、邓，但他是毛泽东的近臣。在武昌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陈云也向胡乔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亿斤粮食产量，胡乔木也没敢及时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刘源也说“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头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性还没有过去，警卫员扶着他晃悠悠走进会场。刘听了毛批彭讲话以后，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胡乔木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让彭真找刘少奇谈，才决定不写。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集体围攻中，看法本来与彭德怀接近的刘少奇，不仅没说一句公道话，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当别人追逼彭德怀交待什么问题时，刘少奇也积极参与追问。8月1日，刘少奇发言说彭德怀“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刘少奇还揭发了一件事：“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从那以

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少奇的这个揭发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尖锐的插话。刘少奇还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彭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七大有了，八大没有了。刘少奇的发言中把八大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的责任推给了彭德怀。刘少奇这个揭发不仅打击了彭德怀，还讨好了毛泽东。

黄克诚回忆说，有人说我是彭德怀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作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 253 页可知，这位两次找黄克诚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8 月 17 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开了一个中央工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他一开始就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接着又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辩护说：“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个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接着，刘少奇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先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接着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8 月 1 日，在常委会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8 月 17 日，刘少奇又超过了林彪。

其实，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三面红旗”的危害。庐山会议后不到一个月，195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时，他和邓子恢一同上厕所。在厕所里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当时邓子恢的秘书在场。事后，邓的秘书将此事告诉了刘的秘书姚力文。40 年后，姚力文将此事告诉本书的作者。可见，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但他还是参与围攻了彭德怀。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如果能够快，当然好，谁愿意慢呢？’不久，发现了严重问题。庐山会议前后，他坚决要反‘左’，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力去纠正‘五风’，反对高指标。”

“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刘少奇曾对

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

刘源说乃父没有制止大饥荒的灾难，这是苛求。他没有想到，乃父名义上是党的第二号领袖，但在当时的制度下，实际是毛泽东的臣下。不过，刘源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祇砸死”。

2、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1935年3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挟，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6月24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那样耐人寻味的話。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19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想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

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1958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7月12日到22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12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7月16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勾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有一段对话颇有趣味,不妨抄录如下: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钢,是一个革命。2700万-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和泄气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冷得比较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要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

月底的存粮只有 310 亿斤。去年增加了 2010 万人。按“一五”经验，1 元货币比 9.6 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 年 1 比 8.8 就紧张了。

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 1956 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7 月 26 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两点：一点是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强调：“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他不仅认为彭德怀的信属于政治方向的问题，还说国家计委李云仲的信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他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

8 月 1 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人也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也有不少插话和追问。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时，周恩来问，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这是在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周还插话说，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当林彪说彭德怀“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看风使舵”、“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的时候，周恩来插话：“相反，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说彭批评毛泽东是“犯上”，这显然是皇权时代的思维。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8 月 1 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 月 4 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国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7 月 7 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

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强加给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8月24日，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关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不仅传达了庐山会议上加给彭德怀的种种罪名，还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清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

在彭德怀受到围攻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定案材料，经周恩来签字，传达到全国每一个党支部。

3、朱德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面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给朱德一个委员长的职务，名义上很好听，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委员长嘛！实际没有实权。朱德也落得个清闲，不争权，学明朝初年的徐达对朱元璋，和毛泽东保持君臣之礼。朱德有较深的国学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必然“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知道此时再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讲“名份”。在这一点上彭德怀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题词支持甘肃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如果这是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很客观、很明白。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说是自负盈亏，实际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他为1958年过热辩护，说：“大跃进是靠热出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的调子开始向支持大跃进变化。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一些真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断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

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重。李锐就这段话评论说：“朱德同彭德怀是 30 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非说这番话不可”说明，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连朱德这样高地位的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26 日，彭德怀违心地作了检查以后，朱宽慰地说：“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我想他是畅快的。彭总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了。”朱德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

8 月 1 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他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

8 月 4 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晚来庐山的人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在林彪作了长篇发言之后，朱德讲了约 10 分钟。他说，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他最后说：“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

朱德和彭德怀是老战友，对待“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朱德虽然批判的调子比别人低，也没有为彭德怀说一句公道话。朱德也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书林克私下说过：“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

在“会议政治”制度下，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人人表态。通过表态来“划线”、“站队”。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着站到反对派一边了。但是，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4、林彪

新中国的建立，论战功，没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败名裂之后，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1954 年的高岗事件，林彪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丢了不少分。从此林彪以养病为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1956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分析这中间有毛泽东的授意。1957 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看望了在上海养病的林彪。1958 年 5 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相信，有了这样的政治投资，在关键时刻，林彪还是

一员用得着的猛将。也许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不满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怀之上，就有让林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来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就调林彪作为“援军”上山。在军事建设上本来林彪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批评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洞若观火，他知道毛泽东此时处境相当困难。他盘算，此时支持毛泽东，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资。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经过了“神仙会”阶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坚决的态度反右。他对彭德怀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为猛烈。

7月3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说话，他批彭的过程中别人插话帮腔。当毛泽东说到1958年的问题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怀说，我对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话说，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他的态度和彭德怀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话也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期间，平型关大捷广为中国人称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资本。彭德怀搞百团大战使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振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对抗战有好处，但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因此，毛泽东不仅不肯定百团大战，反而当作彭德怀的一个历史错误。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把自己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也否定了。他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林彪的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我，日，三国志”。在毛泽东的心中，共产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爱党胜于爱国。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中国人的唾骂。所以，百团大战结束时毛泽东公开向彭发了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这个贺电并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来是彭德怀给毛个人的，毛不经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与会者。彭对此有意见，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却违背事实地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立即帮腔：“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8月1日常委会上，紧接着朱德“隔靴搔痒”的发言之后，林彪的发言直击要害，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定了调子。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冯玉祥。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在刘少奇的发言后，林彪又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否定：“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字，就是野心，派头、气势。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插话：不好敞开心谈）……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表面上好意，实际要抓辫子……表面似好意，实际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的单独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

野心出发，捞一笔。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天常委会开会的情况，第一个是林彪讲话，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用“彭德怀同志”。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彭德怀的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虽然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于1964年，而是始于毛泽东最困难的1959年。这对毛泽东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会上，彭德怀曾提出换一个人管军队，毛泽东很明确地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被罢了官。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帮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亲自主持，对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万毅（国防科委副主任）、钟伟（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5、陶铸

陶铸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毛泽东派他到广东大反地方主义，打击和压制了一批广东籍干部。1959年反瞒产私分是广东最先搞起来的。

7月2日，从武汉到九江的江新轮上，陶铸遇到从北京来开会的人。他请大家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是乐观的。

7月3日，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谈广东的情况。说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子搅成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农民不养猪了，副食伤得太厉害。不过，他虽然讲广东形势严峻，但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7月3日，刚上山的晚饭后，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

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 1958 年的高指标，没有遵守客观规律，计划工作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谈到高指标计委顶不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

7 月 22 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怀疑。去年粮食和工业增长幅度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谈到彭德怀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取得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并未纠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就会把事情搞坏。”请注意，在毛 7 月 23 日讲话以前，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铸。

陶铸三次找黄克诚劝降。第一次没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黄谈话，说：“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克诚反驳：“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认？”第二次失败，陶铸第三次批黄克诚谈话，让黄“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尽早承认错误。8 月 5 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处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陶铸用专制社会妇女的“贞节”解释“对党的忠诚”（实际是对领袖的忠诚），把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当作一个人立身的“操守”。不顾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谁手里，只对最高掌权者个人忠诚，正是专制制度中官员的行事原则。

8 月 6 日，陶铸在第三组发言。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30 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完全不是那回事。”

8 月 8 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 21 日发言的

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6、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 1 万亿斤，有的说可以 9000 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7 月 20 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

26 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 1958 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将来再做出的贡献。”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7、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1958年的失误。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

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23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个。

23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月9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8、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月3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月18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月11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

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 7 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9、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 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 7 月 18 日到 21 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 7.23 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 月 24 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毛在 7 月 17 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 7 月 23 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 月 3 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月8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月3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8月10日，罗瑞卿强行带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怀说是7月24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30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的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

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8月24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帅。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许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1957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54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145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这两天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不可能公布于世，幸亏李锐在场，而且做了笔记。所以，这一段，我还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庐山会议实录》中的内容。

7月31日，由毛泽东一人主讲，由他定调，其他人插话帮腔。8月1日，也是毛泽东讲话最多，其他人逼问和围攻。其中林彪上纲最高，发言最尖锐。会上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全都是一边倒。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既定的前提，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凡是和毛泽东有过不同意见，都是历史问题，都是政治上的污点。以后再和毛泽东不一致时候，都要清算过去这些问题。

在两天的常委会上，毛泽东亲自清算彭德怀，说过去31年年的共事过程中，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把两人过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纲上线，重新清查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彭德怀的站队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也是彭德怀的重要罪过。

毛泽东在清算历史旧帐以后，又说“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说彭德怀和他疏远，请示汇报太少。对7月14日的信，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是准备发表了，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没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

参加常委会的其它人除了追问彭德怀的政治问题以外，还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并乘机吹捧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对搞“个人崇拜”的言论，肯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常委会本来应当是一个领导集体，毛泽东应当仅是这个集体的召集人。实际上，毛泽东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体领导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为毛泽东“抬轿子”、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难道就没有责任？

这两天常委会为彭德怀等定了调子，冤案已经构成，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铁帽子已经戴在他们的头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为这个冤案盖上合法的图章，并动员全党开展批右倾运动。

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不长，但十分鲜明而坚决地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说：“我们的路线到底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后有些同

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不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也是在全会开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全会。这封信虽然只有500多字，却大量引经据典，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信中为他们五人罗织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还说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大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大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大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批评质问的方法，十分尖锐。在这些批判会上，进一步围剿“军事俱乐部”和追查周小舟说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围剿之烈，追逼之严，气氛之紧张，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说：“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态度不好，彭德怀说：“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像法庭审判。”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作批示，也同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为了给批判彭德怀等提供理论武器，并不是理论家、也不从事理论工作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动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恩、列、斯、毛语录，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8月15日和8月16日，接连写了两个长篇批示。15日的批示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经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断横行’，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不仅使得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所谓“右倾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一步步升级，还为会后的全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

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向全党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做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毛泽东决策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除了“彭黄张周”以外，还有李锐。因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级别不够，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对他的处分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

庐山会议加剧了 1958 年以来的错误政策，把已经深陷困难的中国推向更深的灾难。同时，还更加强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化了他个人独裁。为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就下达文件，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已经狂热到变态的程度。这种变态在他给《诗刊》主编、副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充分反映出来。1959年9月1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向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上述6条，只要有其中一条，又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军队系统，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条标准：一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四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

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

凡是犯有上列情况之一的，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的反右倾标准定在地方干部之前。地方标准是在军队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为全国做出榜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从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有1900人，占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3%（其中司局级以上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有2714人，占这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4.4%。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共占党员总数的7.5%。经过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党委给224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61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它坏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倾的战况汇报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以推动运动时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况如下。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主要问题是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说省委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后两人的罪名是在反对“三面红旗”方面的看法与霍维德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的“露骨的反党言论”还受到霍维德的赞扬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陈光远。说张国声攻击省委第一书记，否定1958年的伟大成就。张毅忱的罪状是“攻击”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认为去年省委订的粮食产量过高”“夸大了农村缺粮问题”。陈光远的罪行是写了一篇题为《要注意加强州、县、公社党委的集体领导》（内参），批评了党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风，还写了《革命胆略与实事求是》（发表于7月10日的《青海日报》）的文章，“夸大了1958年的阴暗面”。

新疆。揭发批判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辛兰亭。“对大办钢铁泼冷水”、“对去年大跃进成绩有怀疑”、“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不尊重”。

贵州。1958年8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到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德义。

湖南。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一样的，并和周小舟一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凯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张凯帆“下令强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发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农到处叫喊等严重问题。”陆学斌“认为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大跃进是一笔糊涂账，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诬蔑毛主席给公社小队长写信是不相信中间这一层干部。”

黑龙江。揭发批判了省委委员、黑龙江大学校长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哈尔滨市委

委员、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邢子陶，鸡西市委委员、鸡西矿务局长李奎生。刘成栋说大跃进的“缺点是一个大拇指”。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反对大跃进、公社化、大办钢铁的一系列反动论点。

吉林。全省党员干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书记李晨反对农业八字宪法，反对供给制等右倾言行。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一书记王荫轩等 24 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

江西。揭发了省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承恩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今年再跃进“绝不可能”等右倾言论。同时还揭露了 1956 年省党代表大会期间，原赣南区党委工业部长等人，对省委领导和三反、五反、镇反、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毒攻击。

中共中央在这个材料的按语中写道：

现将一些省市自治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简报发给你们。右倾分子的人数虽然不多，在高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在适合他们的气候下，却可以兴风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时加以揭发和批判，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给工作以很大危害。请你们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定为“反党集团”。如青海省定为“以张国声国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撤销张国声省委书记、常委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聂景德的宣传部长等一切职务；撤销程光远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的职务。

在工矿企业，按照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对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对问题严重的进行重点批判。为了推动各地的反右倾运动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批转各地反右倾的经验：

1959 年 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 11 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上的批示中强调：“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把他们的思想影响扫除。”批示全文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

1959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是：

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

等等。这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批判。

这个文件不仅把 1959 年春夏的一些纠偏措施全部否定，还说成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倾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中央还多次批示、转发各地的斗争经验，说“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线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 1958 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都说成是“右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绵阳地委的一篇报告中说：“绵竹县兴隆公社是全县土地最肥沃、水利条件最好的米麦之乡，但是在以党委书记丁仁发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害下，粮食竟减产 30.8%，生猪减少 51%，耕牛死亡 12%，社员出勤率只有 50%。又如青川县苏河公社，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田地荒芜，连年减产，疾病流行……”报告说，反右倾运动就是要“给铁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层钢，给大跃进的车子再加足油！”这样以左反左，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据 1962 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显然，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

1962 年 5 月 11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 40 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57 年反右派斗争，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 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对他说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发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因 1959 年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这更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因此，1959 年继续饿死人，1960 年出现了饿死人的高峰，1961 年饥饿死亡的情况还在继续。这时毛泽东才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

“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有一点悔过之意，但他对错误的认识多么肤浅！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 1959 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斗，是工业和农业的战斗，是城市和农村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8 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一、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 1949 年的 5765 万增加到 1954 年的 8249 万，5 年增长了 43%。而粮食部统计的 1953 年城镇人口为 9182 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 1950 年的 355 亿斤增加到 1953 年的 721 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 14 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 1950 年为 100，1951 年为 147，1952 年为 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 1952 年 7 月 1 日到 1953 年 6 月 30 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 40 亿斤的赤字。6 月 30 日，国库存粮由 145 亿斤减少到 105 亿斤，特别是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 年 6 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 1949 年为 100，则 1950 年为 117，1951 年为 128，1952 年为 145，1953 年稍高于 1952 年，1953 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 10%。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 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 24788 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 659 亿斤。详见表 22-1，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 721 亿斤，和 1952 年相比，产量只增加 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 20.1%。

表 22-1 1953 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

城乡分类	人口（万人）	每人需要量（市斤）	总需要量（亿斤）
城镇人口	9182	480	441
经济作物区	5300	454.7	88
分散缺粮户	6600	121	80
灾区	2196	124	86
缺粮区	990	253	20
共计	24788	659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表 22-2 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农业税-即征收加上收购），1950 年占产量的 13.45%，1953 年增加到 21.77%。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将会大度提高。

表 22-2 1950-1953 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 (单位: 亿斤)

年份	产量	征收和收购		征收		收购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1950	2646	355	13.45	266	10.05	90	3.40
1951	2876	479	16.66	299	10.40	180	6.25
1952	3271	596	18.22	282	8.62	314	9.60
1953	3318	721	21.74	316	9.53	405	12.21

资料来源: 同表 22-1。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 1922 年到 1930 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 2516956 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 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 1931 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 1933 年,每年 12 个月中有 10 个月用洋麦作原料。

1949 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 1954 年 9 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 50 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1952 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与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 年度为 61:39,1952-1953 年度为 56:44。当时估算,1953-1954 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 700 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 275 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 431 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 243 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 8 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 1981 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 5000 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1953 年 10 月 10 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从陈云肩担两个“炸药包”的体验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想为其被统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政权不是万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难的。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轻视了这种困难。

1953 年 10 月 2 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 1 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表 22-3 1956 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市斤）

居民类型	十五个城市的标准	国务院规定标准
平均数	26.07	27.70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51.72	55.00
重体力劳动者	41.49	44.00
轻体力劳动者	32.57	35.00
大中學生	32.75	35.00
一般居民及 10 周岁以下儿童	26.15	27.50
6-10 岁儿童	20.56	22.00
3-6 岁儿童	8.85	9.00
3 周岁以下儿童	7.89	8.00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 1953 年 12 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1954 年 9 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 年 7 月-1954 年 6 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77.78%，1954 年 6 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 1954 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据：

4 月 6 日库存为 477.93 亿斤；
 4 月 9 日库存为 469.61 亿斤；
 4 月 12 日库存为 465.79 亿斤；
 4 月 15 日库存为 456.52 亿斤；
 4 月 19 日库存为 446.42 亿斤；
 4 月 23 日库存为 434.50 亿斤；
 4 月 28 日库存为 422.81 亿斤；
 4 月 30 日库存为 416.56 亿斤；
 5 月 6 日库存为 400.54 亿斤；
 5 月 10 日库存为 389.43 亿斤；
 5 月 13 日库存为 378.96 亿斤；
 5 月 17 日库存为 370.20 亿斤；
 5 月 20 日库存为 360.77 亿斤；

5 月 24 日库存为 352.84 亿斤；
5 月 27 日库存为 346.02 亿斤；
6 月 10 日库存为 317.38 亿斤；
6 月 22 日库存为 301.98 亿斤；
6 月 30 日库存为 298.92 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 477.93 亿斤逐日降到 298.92 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 年 6 月 15 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 309.8 亿斤，收购 569.73 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 879.53 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21.98%，而 1954 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學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 53 人搜屋 36 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 111 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 年统购中死亡 710 人，其中自杀 566 人，自杀未遂 35 人，送粮而死的 74 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 150 人，河北 130 人，河南 108 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1955 年 2 月 2 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 年 12 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 年 4 月 22 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 2022 万斤，上级下达了 3300 万斤任务，实际完成 2900 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

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 3 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 8 人，扒衣服挨冻 16 人，吓跑 3 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郟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 9 个县统计，共有 570 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 257 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 178 人，罚款 24 户。

浙江省 1954 年粮食产量 141 亿斤，征购共 51 亿斤，占总产量的 36%。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 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 7% 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 112%。统购中顶牛，死了 134 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 4 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 72 户，只有 3 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 126 个村，这样的村有 39 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 20 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相。”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四川省德昌县在 1954 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 25 次，判决 29 人，其中死刑 1 人，有期徒刑 23 人。1953 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 9 次，判处死刑 2 人，有期徒刑 5 人，管制 2 人。1954 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 114 人，16 人被处决，56 人判有期徒刑，9 人管制。

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 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 年出口粮食 32 亿斤，1954 年出口 39 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 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 3 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 年 6 月国务院 52 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 1956 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做出《关于广西省 1956 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

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 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1956-1957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801亿斤，实际征购了833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860亿斤减少了27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743亿斤，实际销售833亿斤。比计划多销了90亿斤。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132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48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43.76亿斤，军粮计划是23亿斤，实际是17.2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894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61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6月底库存为427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减少到366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6%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

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 852 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 847 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 767 亿斤，减为 748 亿斤。军粮 18 亿斤和出口 36 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 31 亿斤增加到 45 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 45 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1956-1957 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 19.2 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 77 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 1958 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 年 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 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 920.11 亿斤，销售 842.09 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弈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 22-4 “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

产量与征购	1953-1954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产量	3337	3390	3678	3855	3898.2
征购数（折贸易粮）	1003 (828)	1078 (903)	1041 (860)	994 (838.48)	1038.3 (854.74)
占产量比重（%）	30.1	31.8	28.3	25.8	26.6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 1957 年 7 月表格和粮食部 1958 年 2 月 6 日表格，1957-1958 年度不是最后数。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左右。从表 22-4 中可以看出，1954-1955 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 70 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 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 22-5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1954-1955	1955-1956	1956-1957	1957-1958
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折贸易粮）	494 (401)	405 (334)	490 (402)	429 (351)
占征购粮食的比重（%）	45.8	38.9	49.3	41.3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 1957 年 7 月表格和粮食部 1958 年 2 月 6 日表格，1957-1958 年度不是最后数。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 40 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

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 22-6 “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

年份	出口贸易粮	折原粮	其中大豆
1953-1954	32	36	18
1954-1955	41	46	23
1955-1956	44	51	23
1956-1957	44	51	24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 1957 年 7 月表格和粮食部 1958 年 2 月 6 日表格，1957-1958 年度不是最后数。由于粮食部的数字是按粮食年度计，《中国经济年鉴》的数字是按生产年度计，所以这个表中的粮食出口数和第 20 章“1956-1965 年间中国食品出口”一表中的数字有所差别。

1957 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做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 年 5 月 17 日粮食部发文，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 180 斤，驴供应饲料 90 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 年 10 月 11 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 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 年 9 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 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1958 年 2 月 21 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 年 3 月 7 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

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 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 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 月 17 日到 19 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 16 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 130 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 67 万多人断粮。广东仅 15 个县断粮的就有 69 万多人。甘肃 21 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 735 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 1958 年 5 月 8 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 1956 年就达到 3855 亿斤，1958 年估计为 4000 亿斤，1959-1963 年，一直在 3400 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 1960 年只有 2870 亿斤，低于 1951 年。到 1965 年才恢复到 1956 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 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 8500 亿斤。

表 22-7 大饥荒年代及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亿斤）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产量	3855	3901	4000	3400	2870	2950	3200	3400	3750	38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 141 页，统计年鉴的粮食数为生产年度（1 月 1 日到 12 月 30 日前）。粮食部的粮食数为粮食年度（上年 7 月 1 日到下年 6 月 30 日）。

人们通常认为，1958 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 1 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 10 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浮夸风是从 1958 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 2015 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 1958 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6 月 8 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 5 亩小麦平均亩产 2015 斤；

6 月 9 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 2357 斤；湖北襄阳，700 万亩小麦亩产 1500——2000 斤；

6 月 11 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 2394 斤；

6 月 12 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 3530 斤；

6 月 15 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账派”应及时猛省了；

6 月 16 日，湖北谷城，4353 斤；

6 月 18 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 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进入7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2002年6月16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20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

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2004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月26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现在增长50%。”粮食部党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亿斤，比去年的3899亿斤增加2384亿斤，增长61.44%。”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 12000 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 1958 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 年 9 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行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 年 11 月 16 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 年粮食总产量为 8500 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 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 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 7500 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 1957 年的产量 3700 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 8500 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 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 300-500 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 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 4 亿亩左右，比 1958 年减少了 20%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 10500 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 2000 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 年 9 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

1958 年 12 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 1958 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

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田化。”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多亩。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196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年少17700万亩，即减少10%。这大概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 1958 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 1959 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途中，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 1958 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 8500 亿斤，公布数为 7500 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 3980 亿斤，1980 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 4000 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 粮食年度（1958 年 7 月 1 日到 1959 年 6 月 30 日），实际征购粮食 1113.35 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 195.14 亿斤，增长幅度为 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 4000 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 0.26%。1113.35 亿斤比正常年景的 850 亿斤高出 263.35 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 1959 年全省粮食总产比 1957 年下降 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 40.9%，1960 年比 1957 年粮食总产量减少 11.45 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 1957 年增加 1.4 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 年为 16.8%，1959 年、1960 年分别上升到 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 1957 年的 294 公斤，下降到 1959 年的 240 公斤，1960 年只 215 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1959 年到 1961 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 87 万人。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 400 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 1.016 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 1959 年下半年到 1960 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垵的 400 多人口就饿死了 70 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么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 年 10 月 4 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

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年1月27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年2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毛泽东不知底细，2月28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

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表 22-8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 单位：贸易粮，亿斤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收入合计	920.11	1125.44	1214.29	823.74	794.67
征购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粮食年度生产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年度进口	--	--	--	42.90	115.53
支出合计	899.65	1166.57	1260.51	949.09	777.10
销售	842.09	1052.01	1119.13	886.97	736.32
城镇销售	422.43	546.32	592.65	524.89	467.87
乡村销售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财政供给	12.43	12.32	13.12	12.18	12.45
出口	41.68	72.56	86.51	23.92	17.55
损耗	3.45 29.	68	41.75	26.02	10.78
期末库存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其中陈粮	291.68	217.14	151.83	109.39	130.30

资料来源：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说明：57-58 年，58-59 年，59-60 年三个年度购销数字中包括周转粮和品种兑换，60-61 年度和 61-62 年度不包括。财政供给是指军粮。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折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1959 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 月 2 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 30 多名社队干部，10 多人致残，捕了 3 个公社干部。10 月 25 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

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 4000 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 30 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 14 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 4 人，撤职 8 人，受其它处分 2 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 142 人，当场打死 1 人，打残病死 1 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 7 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 3 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 年 12 月 9 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 7 人，其中 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 173 人，1179 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 70 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 15 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 30 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 1959 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 67 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 88 人，被“辩论”的 112 人。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 1959 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 1958 年的大增产。4 月 19 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 1958-1959 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 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 3898 亿斤，增长 35%即 5262 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55 亿斤，今年 6 月底，库存连 360 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 年 9 月 25 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 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 7.8 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 3.9 万斤。

1959-1960 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5500亿斤。1959年11月2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征购指标定为1150亿斤，销售指标定为855亿斤。7月5日上午6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招。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800亿斤，或810亿-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粮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年度，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由于估产5000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1100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购粮食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购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同期多275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79亿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计划；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

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一年。

表 22-9 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19.66	505.19	526.48	362.09	268.45
下半年	134.03	201.01	166.93	132.67	57.16
三季度	84.06	102.20	101.14	84.47	53.24
七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十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1.86
十一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上半年	285.63	304.18	359.49	229.41	171.29
一季度	94.46	110.26	142.71	89.46	171.29
一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二季度	191.17	193.82	216.78	139.95	107.71
四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月	72.71	72.87	77.92	49.43	37.46
六月	59.37	51.38	60.84	41.03	32.07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国家销售给农村的粮食除了供给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以外，基本是征购的“过头粮”的返销。从返销的数字可以看出，每年7-12月销售少，1-6月销售多。7-12月离秋收时间近，农民自己可以维持一部分，1月以后，就得完全吃返销粮了。1958年和1959年过头粮征得多，返销粮也就多；1960年和1961年过头粮征得少一些，返销粮就少一些。

七、压农村，保城市

如果说，1959年末粮食部门因收得多、销得少、库存增加而喜悦，到了1960年夏天，粮食部门开始尝到上一年对农民压榨过度的苦果了。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负责人的一个报告称，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辽宁的10个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区情况紧急，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6天。

由于1959年冬到1960年春饿死人太多，到1960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报粮食产量了。10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各省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汇总起来只有3535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3900亿斤还少。征购进展十分缓慢，而销售却增加很快，粮食库存不断减少。那时，全国82个大中城市6100万人口，9月底库存只有26亿斤，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沪、辽等地库存很少，随调进，随销售。10月16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说，今后9个月（今年10月到明年6月）剩下的销售指标只有648亿斤，每月平均72亿斤。上年度同期实际销售886亿斤，月均98亿斤。农民的口粮指标剩下更少。李先念说，如果每月平均销售量不比上年度减少26亿斤，今年增加33亿斤的粮食库存计划就不能实现。李先念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粮食库存，把国家粮库看得比农民肚子还重要，这是统购包销制度的必然。没有宽裕的库存，他就无法保证粮食供应，而粮食供应首先保城市。

城市粮食定量虽然一压再压，但还有保证。可怜的是农民。据谭震林1960年11月2日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每人每月的口粮为：山东11.13斤；河南17斤；河北17斤；山西20斤；辽宁20斤。这些口粮中以地瓜为主，如河南的17斤中只有5斤纯粮，山东没有纯粮。这还是国家供应指标，各级克扣口粮的情况分严重，农民能吃到口里的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实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底，贵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

如果说过去几年压农村、保城市只是实际操作不见诸文字的话，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却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8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去年6月底库存300亿斤，今年只有147亿斤，其中新粮55亿斤，库存再也不能挖了。准备进口粮食500万吨，但外汇紧张。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好转先于城市。问题在城市。要紧缩农村，保大中城市。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

1961-1962年度是粮食部最难的一年。粮食部反复算账，算来算出，中央粮库要亏空

120 亿斤（贸易粮）。国家打算进口 100 亿斤来补这个亏空。但外贸部估计，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有旱灾，我们的外汇又不够，进口 100 亿斤有困难。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还是挤农民的口粮。1961 年粮食产量只有 2850 亿斤，即使全部留给农民，农民的口粮还不如 1957 年（1957 年农民占有粮食 3130 亿斤）。实际上，这一年从农村净调出粮食 383 亿斤，折原粮 460 亿斤。这样，农村人均占有粮食比 1957 年少 123 斤。幸亏很多地方已放宽政策，农民自留地、三边地生产了一些粮食，有些地方还搞了包产到户，形势实际开始好转。否则 1961 年饿死人会更多。

1961-1962 年，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有 1.2 亿人，仅供应的口粮食就有 400 亿斤，还有食品业、副食酿造业及工业用粮，总共需要 500 多亿斤。尽管从农村挤出 383 亿斤粮食，但不能满足城镇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1961-1962 年度，城镇粮食销售量比 1959-1960 年度减少了 122 亿斤，但比 1957-1958 年度还是多 48 亿斤。为了补上亏空，只好进口粮食。1961-1962 年度，进口粮食 115.5 亿斤（从 1961 年上半年就开始进口粮食，1960-1961 年度进口粮食 42.9 亿斤）。从 1961 年开始，津、京、沪主要是靠进口粮食维持。1961 年 8 月 26 日，李先念在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1961 年购买力为 675 亿元，而商品可供量为 655 亿元。尽管商品供不应求，还是要优先保证出口。为了进口粮食，一定要挤出一切可以出口的东西出口。出口的商品是猪、蛋、油之类的食品，还是从农民的嘴边上夺过来的。进口的粮食只供应给城市。这也是压农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亏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应急措施，农村的粮食比前两年度多了（全国总产量统计数为 2950 亿斤，实际上农民自己在“三边”地上种的粮食很难进入统计），征购粮却比前两年大大减少，只有 679 亿斤。这是几千万农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让步。但这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也减少了 150 亿斤。农民还在饥饿中挣扎，据粮食部统计，1960 年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比 1955-1957 年三年平均数减少了 190 多斤。1961-1962 年度，全国农村大约有 1 亿人口每天吃粮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压农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应方面。1959 年春季，食油供应紧张，城市紧，乡村也紧，出口任务完不成，工业用油不能满足。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决定把农村的食油供应坚决压下来。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以外，其它农村 6、7、8、9 四个月不供应食油。中共中央为此下了紧指示。1959 年 9 月 10 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采取这个措施引起了不少议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也有这一条，他们说农村不供应食油农民会造反。现在证明，农民没有造反。”李先念用农民没有造反的事实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说：“农村 9 月份恢复供应，但是供应量不能超过停止供应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应标准已经减少到 2 两，新油上来以后是不是增加上去？我们的意见不再增加。”

众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热量是碳水化合物（即淀粉类）的好几倍。本来热量不够的农民，却剥夺了他们吸收脂肪的权利，这是农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干什么？出口是一个方面。1958-1959 年度，收购食油 25.7 亿斤，出口 4.38 亿斤，国内销售不到 19 亿斤。农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连鸡蛋也吃不上。肉和鸡蛋到哪里去了？国家强行收购走了。国家用强制手段要农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按人头下达指标。国家收购的生猪和鸡蛋一是满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1960 年 4 月 19 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要求各省加强收购副食品，他说，收购上来的蛋，80%出口，20%内销。内销中第一是满

足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带有调侃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他说的“满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就是城市的特需供应。特需供应的对象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高级干部。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粮食短缺，全国上下都大搞代食品运动，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10日，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说：“为了广泛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省、地、县各级党委和较大的企业、机关、团体党委，都要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代食品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已经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由总理亲自挂帅，还设立了专门办公室。”谭震林说：“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叶蛋白这几种东西，比大米、小麦、高粱、玉米的营养价值还高。”

中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利用他们“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寻找粮食以外的食物。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这个建议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用粮，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他们提出了一批“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的推广”的代食品。

这些代食品主要是：一，橡子面粉。先将橡子去壳破碎，然后用千分之一浓度的碳酸钠溶液浸泡一、二天，就可以去掉不适合食用的单宁，得到可食用的淀粉。全国年产橡子粗估约80亿斤以上，如果将其中20%提取淀粉，可得六七亿斤。二，玉米根粉、小麦根粉。将其磨碎，碾成粉，色香味有点像炒面。用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成根粉，全国可得几十亿斤代食品。三，叶蛋白。经过选择后可食用的新鲜草叶、作物叶子和树叶，每百斤一般可提取叶蛋白干粉2-10斤。从叶中取叶蛋白跟做豆腐相似，即先把采集的鲜叶（采集后不能过夜）切碎，掺水磨成浆，榨出叶汁，加热至摄氏70-80度，使叶汁中的蛋白凝固沉淀，然后过滤、弄干即成。四，人造肉精。这是一种用酵母菌做成的食品，所含营养极似肉类。我们从400多种菌种中选出一一种叫做“白地霉”的酵母菌。把白地霉放在培养液（淘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无毒的树叶、野草、农作物的根茎叶煮后都可制成营养液）里，保持摄氏20-30度，两三天内就繁殖出一层白膜。白膜在摄氏50-60度温度下，即溶解成糊状，便是人造肉精。五，小球藻、栅藻、扁藻。小球藻和栅藻的干粉中含蛋白质20%-40%，脂肪4%-6%。小球藻、栅藻是淡水中繁殖的，扁藻是在海水中养殖的。此外，我们还在研究红虫（即水蚤）、玉米秆麩等代食品，看起来也是很有前途的。

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14日向全国转发了中国科学院党组这个建议。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采食昆虫。他们的报告说：“两个星期来，采集了可和食用的昆虫1200多斤，虫体蛋白质既多，油又很大。昆虫所已用来作成了酱油、乳酱、肉松和食用油，并加工成各种糕点和饼干。”昆虫所还介绍了烤食、油炸、制干粉、榨油、作酱油、作糕点等几种简便的加工方法。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发通知东北三省，要求各地推广。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推荐了十三种昆虫，并作了营养分析。

表 22-10 十三种虫体营养成分分析（以虫体重量的百分比表示）

昆虫名称	粗蛋白	粗脂肪
豆天蛾越冬幼虫（干虫）	50.8	23.3
金龟子幼虫（即屎克螂，干虫）	48.1	21.0
蝇嘴（干虫）	63.1	25.9
蝇蛹（干虫）	41.7	25.1
玉米螟越冬虫（干虫）	41.2	44.8
刺蛾越冬虫（干虫）	50.6	37.7
菜粉蝶老熟幼虫（干虫）	60.6	21.4
菜粉蝶蛹（干虫）	53.9	24.4
粘虫蛹（鲜虫）	13.8	6.2
棉蝗虫成虫（鲜虫）	21.3	2.8
蝗虫（鲜虫）	18.7	4.1
白蚁（鲜虫）	23.2	28.3
蚕蛹（鲜虫）	23.1	14.2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960 年 11 月。

只要中共中央一号召，下面就会搞起群众运动。中央号召搞代食品，各地就大搞代食品运动。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此外，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代食品运动破坏了生态环境。本书有关各省情况的章节里，介绍了很多地方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情况。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因得不到粮食而活活饿死。李锐多次对我说：挨饿的滋味最难受。他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在劳动改造中有挨饿的亲身体会。我所查阅的十多个省的档案中，零星记载了一些饥饿死亡者濒死时的悲惨状况，因此，我想研究一下饥饿死亡的生理机制。我的一位同乡王梅松，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后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所多年从事特殊条件下的生理变化的研究，转业后在天津医科大学任教，著述颇丰。1960-1961年，他曾带领一个医疗队到湖南几个县救治饥饿病人，积累了很多资料。他父亲和伯父都是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他听说我正在写这本书，热情地给我提供了帮助。这一部分内容是根据他写的文字材料和他提供的书籍写成的。

1、人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生命的活动就是能量的循环，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维持，据《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一书介绍，人体在不同的状态下能量的需求不同：

基础代谢所需要的能量：即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体温的维持、心脏的跳动、肺的呼吸和肌肉紧张度的维持，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即基础代谢能量。机体静卧在摄氏 18-25 度的环境中，完全处于休息状态，既无体力劳动，也无脑力劳动，而在 12 小时前就已停止进食，消化系统也处于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耗的能量就是基础代谢能量。基础代谢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最低的能量。基础代谢能量受身体的大小、性别、年龄和气候的影响。男性比女性高，儿童和青少年比成年人高，寒冷气候比温带气候高。一般说来，在普通情况下，成年男子每公斤体重每小时平均消耗能量 1 千卡（即 4.18 千焦耳）。以 65 公斤体重的男子计算，则 24 小时的基础代谢需要 1560 千卡。

除了维持基础代谢以外，从事各种劳动也需要能量。如走路（4.9 公里 / 小时）每一分钟消耗能量 3.7 千卡。一般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将人体的能量消耗分为五级：

极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坐位为主的工作，如办公室工作、修理钟表和收音机等。每日需供应热量 2400 千卡；

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站立为主要的的工作，例如商店售货员和讲课教师等。每日所需热量 2600 千卡；

中等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重型机械操作、拖拉机与汽车驾驶等。每日所需热量约为 3000 千卡；

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农业劳动、半机械化搬运工作等。每日所需要热量约为 3400 千卡；

极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装卸工作、采矿、伐木和开垦土地等，每日所需热量为 4000 千卡。

劳动者所需要的热量除劳动强度以外，还与工作环境有关。如冬天是露天作业还是室内作业，显然露天作业所需要的能量要多一些。

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都是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大约在 3400-4000 大卡之间。

2、中国农民在大饥荒期间获得的能量

中国农民每天需要的 3400-4000 千卡的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那么，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每天能得到多少能量？

综合各省情况，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的口粮平均每天原粮不超过半斤。半斤原粮相脱壳后只有 0.35 斤。这还不是纯粮，多是以红薯、瓜菜替代。那时农民没有油，没有肉，这点口粮，是农民的全部热量的来源。

首先看各种食物能够产生多少热量。这一点，医学界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

表 22-11 不同地区每一市斤农产品所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热量

食物项目	别名	地区	蛋白质 (克)	脂肪 (克)	碳水化合物 (克)	热量 (千卡)
稻米 (粳) (糙)	大米	北京	41.5	12.5	371.0	1765
小麦粉 (标准粉)		北京	49.5	9.0	373.0	1770
小米	伏地小米	北京	48.5	17.5	364.0	1810
玉米碴 (黄)	包米碴	北京	46.0	3.5	380.0	1740
玉米面 (黄)		北京	42.0	21.5	351.0	1765
高粮米 (红) (三级)	红高粮米	东北	42.0	13.5	378.0	1800
黄豆大豆		北京	181.5	92.0	126.5	2060
黄豆粉	豆粉	北京	200.0	96.0	141.5	2230
甘薯	红薯、白薯	北京	7.8	0.9	128.3	552
甘薯片	白薯干	北京	19.5	4.0	401.5	1720
甘薯粉	白薯面	北京	19.0	4.0	395.0	1690
马铃薯	土豆	北京	10.1	0.4	73.0	339
马铃薯	洋芋	陕西	7.1	0.9	71.0	320
大白菜		四川	5.8	0.9	15.3	94
大白菜 (竹筒白)	天津白	四川	3.2	0.4	13.5	72
小白菜	油菜	湖北	5.6	0.9	16.9	99
南瓜 (八方瓜)		湖北	1.8	1.4	29.2	135
番瓜 (花皮)	饭瓜, 南瓜	甘肃	2.3	0.5	14.0	68
冬瓜		北京	1.5	0	9.1	42
西葫芦		北京	2.5	0	8.7	44
猪肉		湖北	87.0	104.0	1285

资料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年12月。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广大农村平均口量定量为每天 0.35 斤大米，折合热量 618 千卡。在大饥荒期间，农民是见不到大米的。有甘薯吃还算是不错的。5 斤甘薯折一斤粮食（有的地方 4 斤折一斤），半斤口粮定量只有 2.5 斤甘薯，按每斤甘薯产生热量 552 千卡计算，折合热量只有 1313 千卡，比基础代谢 1650 千卡还少 337 千卡。有些地方以菜代粮，每斤大白菜只产生热量 80 千卡左右，一天能吃 5 斤大白菜，也只能吸收热量 400 千卡。一些饥荒严重的地方，既得不到 2.5 斤甘薯，也得不到 5 斤白菜。有的地方食堂停火，不给农民供应食品，而树皮剥尽，野草挖尽，农民从食堂以外也找不到食品。农民得到的热量更是微乎其微。

人体每日从食物中摄取五大类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由于食物过少，除了热量严重不足以外，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引起多种疾病。但在当时的统计中，对因此类病而死亡的人，列入正常死亡之列，不算饥饿死亡。

在大饥荒年代，政府推行了很多违反科学的渡荒办法，从而加剧了农民的灾难。王梅松教授向本书作者指出了当时推广的几种反科学的办法：

“双蒸饭”：把米放在瓦盆里加上水蒸成饭，再加一次水，再蒸一次。蒸了两次以后，饭的体积扩大一倍，吃到肚子里当时感觉饱。实际上它和稀饭没有区别，过后饿得更快。当时还宣传这样做饭可以增加营养，实际上，有许多不耐高温的维生素在反复加热后遭到破坏，营养比一次蒸的要差。

“瓜菜代”：这是当时政府提出的口号，而且普遍实行。没有粮食时只能用瓜菜代替，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报纸还宣传如何有利于人的健康。实际上瓜菜是代替不了粮食的。从食物成份表中可以看出，一斤白菜含蛋白质 5.8 克，脂肪 0.9 克，碳水化合物 15.3 克，产生热量 94 千卡。一斤南瓜含蛋白质 5.8 克，脂肪 1.4 克，碳水化合物 29.2 克，产生热量为 135 千卡。一斤冬瓜蛋白质 1.5 克，脂肪 0 克，碳水化合物 9.1 克，产生热量 42 千卡。而一斤大米含蛋白质 41.5 克，脂肪 12.5 克，碳水化合物 371 克，产生热量 1765 千卡。由上述数据可以计算出，18 斤大白菜、13 斤南瓜或 27 斤冬瓜才相当于 1 斤大米的热量，这些东西怎么能代替主食呢？蔬菜中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人体吸收亚硝酸盐以后，它将人体内的血红蛋白氧化为高铁血红蛋白，从而使得血红蛋白失去了运输氧的功能。因此，就出现口唇、指甲及全身皮肤青紫，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这就是大饥荒年代大量出现因“青紫病”而死亡的原因。

桔杆做馒头：如将稻草用石灰水浸泡以后，再切碎加入到面粉里做馒头。稻草的主要成份是纤维素、木质素，它们是用一种很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结构（即复杂的多糖）。草食动物吃它能长肉，这是亿万年来生物适应环境进化的结果，它们的消化道中能分泌一种纤维素酶，这种酶能消化纤维素，使之成为单糖。而人的消化道是没有这种功能的。石灰水是碱性，它也不可能消化纤维素，用石灰水处理后的稻草，人吃了以后不会得到任何营养。

吃陈骨头：有些地方将死后放在户外多年的牛骨头收集起打碎后煮汤喝。牛骨头通过在户外多年风化及细菌分解后，除了剩下钙和磷以外，不会有任何能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

3、饥饿引起死亡的病理生理机制

医学界将饥饿分为“完全饥饿”（机体完全得不到食物）、“不全饥饿”（总热量不足，食物成份不足）和“部分（质）的饥饿”（总热量充足，但缺乏某一种或几种机体必须的物质）三种。大饥荒年代，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民处于间断性的“完全饥饿”状态，全国城乡都处于“不全饥饿”状态。也可以说，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除了短暂的收获季节以外，基本上处于“不全饥饿”状态。

当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来供应能量。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的重量为 370 克，全部氧化代谢产生的热量为 1480 千卡，还不够一天基础代谢的能量需要。

体内储存的“糖原”消耗完了以后，下一步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所持续的时间取决于人的胖瘦。肥胖者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但是，完全依靠脂肪产生热量，有一定的副作用，

那就是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

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内的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

心肌萎缩，就出现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王梅松教授在大饥荒期间参加的医疗队，在一所公社学校里收治水肿病人，常住水肿病人 200 多人，所观察到的水肿病人，最后大多是死于心力衰竭。

肾脏萎缩、肾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尿量减少，出现肾功能不全。

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出现萎缩和功能低下。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

生殖器萎缩，由于缺乏蛋白质，年轻女性子宫发育不良，出现幼稚子宫。更多的人是月经量减少，乃至停经。由于子宫悬吊组织萎缩，子宫脱垂出体外。全国妇联党组在 1961 年 2 月 16 日《关于农村治疗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病初步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去冬以来，各地党委在大抓群众生活的同时，将普查普治妇女病列为除害灭病的重要内容之一”。报告中明确指出妇女病就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可见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 1961 年 5 月 9 日在临夏调研时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25 人，闭经的 12 人，占 48%。一直没的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 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子。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26 人，闭经的 21 人，占 81.2%，全队自 1959 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19 人，闭经的 13 人，占 68.4%，在通经的 6 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 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 24 人，闭经的 16 人，占 66.6%，一直没闭经的四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的爱人。1959 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 1960 年-1961 年在湖南参加医疗队时，在涟源、邵东、祁东等县调查发现，一整个县的育龄妇女中，数十万人中只有极少数妇女来月经，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经。这些极少数来月经的妇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家属。青壮年男性出现睾丸、附睾萎缩，精液不能生成。青壮年未婚男子，在正常营养的情况下，每月遗精 1-3 次是正常现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调查发现，在 1960-1961 年间，许多青壮年未婚男子，一年到头都未发生过遗精现象。所以，在大饥荒年代，除了因饥饿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极低的水平。

在食物缺乏时，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但首先最突出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也就是摄入热能量和蛋白质量不足的症状最先发生。热能不足，人的各项体力活动都不能进行，全身无力，各项机能下降。蛋白质摄入不足，血液中的血浆蛋白含量下降，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血管内的水份大量渗透到血管外的皮下组织中，引起全身水肿。

人体内的各种酶和激素其本质都是蛋白质，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如胰岛素、垂体前页激素，在蛋白质摄入量不足时，这些酶和激素就不能合成，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缺乏，摄入的蛋白质、脂肪就不能消化吸收，这就更

增加了体内蛋白质的缺乏，从而出现恶性循环。

当蛋白质摄入不足时，体内抗体不能生成，如免疫球蛋白不能生成，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血球减少，抵抗力极度下降，很容易患细菌性感染疾病而死亡。

长时间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足，体内脂肪消耗尽，内脏、肌肉的蛋白质亦消耗穷尽，病人出现干瘦，骨瘦如柴，这就是干瘦型的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

至于饥饿时生命的持续时间长短，则看热量不足和蛋白质缺乏的程度，看机体原有的营养水平等因素。长的可达几年，短则数月，当体重下降到正常值的70%以下，这个病人就无可救药了。但是，很多饥饿者在机体消耗尽以前就因并发症而死亡。但是，当年各地的死亡统计中，将并发症死亡都列入正常死亡之列，排出饥饿死亡数字之外。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3到4天；2，抑制期，约35-40天；3，麻痹期，约2-3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全饥饿100天时，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肾消耗了25.9%，皮肤消耗了20.6%，肠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经系统消耗了3.9%，心脏消耗了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40%-50%或50%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很多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好手拿计算器，一边看，一边算，否则一头雾水。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 1958 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58 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 1962 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计算中，从 1958 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 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 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 1982 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 1953 年和 1964 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 年人口总数比 1959 年减少 1000 万（1959 年 67207 万人，1960 年为 66207 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 年人口比 1959 年整整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 1955 年到 1986 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1986 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1984 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1960 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 1000 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1983 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 23-1。

表 23-1 国家正式公布的历年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年份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7.97	13.18	24.79
1955	6164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08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68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

$$\text{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 (\text{当年死亡率} - \text{正常死亡率}) \times \text{当年平均人口}$$

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率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1957年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年和1964年间的人口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3、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

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 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 820 多万人口，使得 1964 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 1963 年，1965 年和 1966 年。

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text{正常死亡率} = \{ (12.28+11.40+10.80) / 3 + (10.04+9.50+8.83) / 3 \} / 2 \text{‰} = 10.47 \text{‰}$$

$$\text{正常出生率} = \{ (32.60+31.90+34.03) / 3 + (39.14+37.88+35.05) / 3 \} / 2 \text{‰} = 35.10 \text{‰}$$

表 23-1 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324X (11.98-10.47) ‰ = 98.64 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274.4 万人，1960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997.94 万人，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48.94 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 1619.92 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 1960 年的死亡率为 6.8‰比 1957 年的 6.0‰上升不多。但 1960 年的出生率为 27.6‰，1961 年的出生率只有 22.4‰，比 1957 年的 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 14 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1958 年少出生人口为：65324X (35.10-29.22) ‰ = 385.4 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 1959 年少出生人口为 687.3 万人，1960 年少出生人口为 949.9 万人，1961 年少出生人口为 1127.8 万人。大饥荒期间共少出生人口 3150 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 (1619.9 + 3150) 万人，即 4770 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 23-1 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有了 1957 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 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饥荒，使得 1961 年底只有 65859 万人。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 1955 年、1956 年、1957 年和 1964 年、1965 年、1966 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 24.38‰。以 1957 年底人口 64653 万人为基数，按这个自然增长率，1961 年底应有人口为 71192 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 (71192-65859) 万人，即 5333 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 563 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1959 年、1960 年、1961 年总人口比正

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图 23-1 中国人口金字塔图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从图 23-1 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以 1957 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数据）为例，广东 8.43‰，云南却高达 16.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 10.8‰。不考虑地区差别，用统一的标准估计中国全国的情况，必然存在较大误差。前面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计算，现在，我们用各省数据进行计算。

各省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这一套书。《中国人口》每省一分册，包括香港和澳门，共 32 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1986 年以后陆续出版。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我从除了西藏、台湾的 28 本书中，将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抄录如表 23-2。

表 23-2 《中国人口》各省分册记载的人口状况（人口：万人，率：‰）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四川												
总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6	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长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河南												
总人口	4652	4733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4940	5080	5099	5240	
出生率	30.82	35.85	33.71	33.16	28.07	14.01	15.31	37.5	45.08	36.1	35.61	
死亡率	11.77	14	11.81	12.7	14.12	39.6	10.18	8.03	9.43	10.6	8.5	8.5
自然增长率	19.05	21.85	21.9	20.46	13.95	-25.59	5.13	29.47	35.65	25.4	27.6	27.11
安徽												
总人口	3221.4	3261.6	3356	3426.7	3445.5	3085.6	2987.7	3133.2	3232.3	3181.2	3285.6	3407
出生率	27.67	33.17	29.75	23.83	19.85	11.35	12.34	53.26	50.69	39.85	41.79	41.05
死亡率	11.8	14.25	9.1	12.36	16.59	68.58	8.11	8.51	7.92	8.59	7.24	7.12
自然增长率	-57.23											
山东												
总人口	5174	5256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5246	5585	5607	5711	5851
出生率	37.3	32.7	35.79	25	20.9	19.5	24.41	38.14	44.18	36.88	35.46	34.56
死亡率	13.73	12.1	12.05	12.77	18.19	23.6	18.49	12.35	11.78	12.04	10.2	9.9
自然增长率	23.6	20.6	23.7	12.3	2.07	-4.1	3	25.79	32.04	24.82	25.3	24.6
甘肃												

总人口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江苏

总人口 3984 4089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43344441 4516 4624 4748
 出生率 32.21 37.6 34.38 24.83 20.92 18.56 18.84 33.27 37.6834.7 36.91 34.89
 死亡率 11.76 13.02 10.26 9.4 14.55 18.41 13.35 10.36 9.0410.13 9.48 8.05
 自然增长率 20.45 24.58 24.12 15.43 6.37 0.15 5.49 22.91 28.6424.57 27.43 26.84

浙江

总人口 2385.5 2442.9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2707.22800.5 2874.6 2957.3 3033.4
 出生率 38.09 33.4 34.91 34.1 26.28 23.52 17.58 36.07 40.7137.18 36.48 32.48
 死亡率 12.58 9.46 9.32 9.15 10.31 11.88 9.84 8.61 7.9 9.21 8.09 7.12
 自然增长率 25.51 23.94 25.62 24.95 15.47 11.64 7.71 27.4132.81 27.97 28.39 25.36

广东

总人口 3429.7 3494.2 3592.6 3671.8 3739.2 3785.7 3817.3 3909.84013.7 4108 4231.3 4346.9
 出生率 31.09 34.93 34.99 30.1 24.67 18.96 21.27 43.31 39.1736.74 36.28 32.18
 死亡率 10.7 11.19 8.43 9.13 11.74 15.12 10.67 9.32 7.62 8.33 6.82 6.37
 自然增长率 20.49 23.74 26.56 20.97 13.04 3.84 10.06 33.9931.55 28.42 29.46 25.81

贵州

总人口 1586.8 1628.1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1664.31703.6 1752 1820.7 1885
 出生率 37.92 32.26 34.43 33.69 27.57 19.97 16.58 43.7248.7 52.62 49.96 44.04
 死亡率 16.24 13.02 12.35 15.26 20.28 52.33 23.37 11.6417.14 20.66 15.16 13.49
 自然增长率 21.7 19.3 22.1 18.4 7.3 -32.4 -6.7 32.1 31.6 32 34.8 30.6

广西

总人口 2052.6 2091.8 2146.63 2186.16 2205.22 2172.06 2159.16 2217.822299.7 2261.66 2444.68 2528.2
 出生率 30.26 29.37 34.52 32.87 24.52 19.4 17.73 39.08 46.724.95 42.4 39.23
 死亡率 14.58 12.46 12.35 11.74 17.49 29.46 19.5 10.25 10.1310.55 9.03 7.5
 自然增长率 15.68 16.91 22.17 21.13 7.03 -10.06 -1.17 28.8336.59 30.4 33.37 31.73

陕西

总人口 1716 1756 1803 1832 1881 1944 1969 20082018 2100 2144 2194
 出生率 30 28 32.2 26.7 26.6 27.7 21.1 34.6 38.7 40 34.7 34.4
 死亡率 10.6 9.9 10.3 11 12.7 12.3 8.7 9.4 10.5 16 13 12.9
 自然增长率 19.4 18.1 21.9 15.7 13.9 15.4 12.4 25.2 28.2 24 21.7 21.5

青海

总人口 179.2 199.92 204.64 225 260.01 248.65 211.42 205.01 209.33219.47 230.45 240.61
 出生率 35.93 24.68 32.18 27.94 23.02 13.07 11.43 35.7245.56 52.08 48.72 41.39

死亡率 14.06 9.34 10.4 12.99 16.59 40.73 11.68 5.35 8.37 15.539.06 9.75
自然增长率 21.87 15.25 21.78 14.98 6.44 -27.66 -0.25 30.3737.19 36.55 39.66 31.64

山西

总人口 1508.7 1553.58 1586.74 1621.7 1666.57 1703.2 1710.04 1745.331790.11 1824.37 1871.56 1911.05
出生率 34.2 29.9 33.3 28.7 27.5 27.3 19.1 37.7 38.1 36.2 33.9 30.3
死亡率 12.9 11.6 12.7 11.7 12.8 14.2 12.2 11.3 11.4 14 10.4 10.3
自然增长率 21.3 18.3 20.6 17 14.7 13.1 6.9 26.4 26.7 22.2 23.5 19.7

河北

总人口 3529 3588.7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 3883.63956.2 3996.7 4087 4183
出生率 32.29 29.24 29.62 24.45 23.09 20.5 15.13 28.63 38.6133.63 32.92 29.32
死亡率 11.64 11.34 11.3 10.92 12.29 15.84 13.63 9.06 11.2 10.918.74 8.69
自然增长率 20.65 17.95 18.32 13.53 10.8 4.67 1.5 19.62 27.4122.72 24.18 20.53

湖南

总人口 3472.83 3507.47 3602.2 3672.72 3691.95 3586.37 3507.98 3600.263715.2 3785.13 3901.47 4009.65
出生率 31.1 29.59 33.47 29.96 24 19.49 12.52 41.4 47.29 42.242.25 37.23
死亡率 16.36 11.51 10.41 11.65 12.99 29.42 17.49 10.2310.26 12.88 11.19 10.16
自然增长率 14.74 18.08 23.06 18.32 11 -9.93 -4.97 31.1637.03 29.31 31.06 27.08

福建

总人口 1366.6 1400.4 1452.5 1493.4 1543 1572.6 1597.8 1639.71678.4 1703.5 1759.8 1813.7
出生率 27.28 28.67 38.24 29.12 27.56 25.11 17.42 40.1644.96 38.33 41.18 37.04
死亡率 8.26 8.43 9 7.46 7.78 15.34 11.87 8.28 7.36 8.62 7.34 7.11
自然增长率 19.02 20.24 29.24 21.66 19.79 9.77 5.55 31.88 37.629.71 33.84 29.93

云南

总人口 1805.85 1841.83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2021.08 2088.44 2160.36 2231.86
出生率 32.48 34.75 36.27 23.61 20.94 24.19 19.4 39.71 43.1545.66 44.01 38.97
死亡率 13.6 15.22 16.29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15.23 12.99 10.08
自然增长率 18.88 19.53 19.98 1.99 2.98 -2.07 7.58 28.86 29.0130.43 31.02 28.17

吉林

总人口 1202.1 1224.5 1248.1 1280.9 1313 1397.1 1414.3 1476.41537.1 1595.1 1639.1 1679.3
出生率 41.57 32.64 35.46 33.31 28.04 32.51 26.45 40.7 47.0344.19 40.46 34.58
死亡率 9.9 7.5 9.1 9.1 13.4 10.1 12 10 9.4 12.6 9.7 8.6
自然增长率 27.7 25.1 26.4 24.2 14.6 22.4 14.5 30.7 37.6 31.6 30.8 26

辽宁

总人口 2261.5 2306.5 2395.5 2445 2501.8 2559.5 2519.3 25492653.1 2734.2 2808.3 2869.7
出生率 39.1 33.7 41.9 38.7 28 31.8 17.2 34.1 49.1 40.2 36.2 29.4
死亡率 9.4 6.6 9.4 8.8 11.8 11.5 17.5 8.5 7.9 9.5 7.1 6.2
自然增长率 29.7 27.1 32.5 29.9 16.2 20.3 -0.3 25.6 41.2 30.1 29.1 6.2

黑龙江

总人口 1321 1418 1479 1564 1682 1807 1809 18931972 2053 2134 2198
出生率 40.4 33.1 36.6 33 30.4 32.5 27.3 35.5 45.1 42.6 40.4 34.3
死亡率 11.4 10.1 10.4 9.1 12.8 10.5 11.1 8.7 8.5 11.5 8 7.3
自然增长率 29 23 26.2 23.9 17.6 22 16.2 26.3 36.6 31.1 32.4 27

湖北

总人口 2896.7 2963.2 3064.8 3146.7 3173.2 3152.2 3182.96 3273.933350.09 3418.01 3504.54 3601.01
出生率 26.06 27.07 34.36 30.49 26.42 16.41 27.34 42.5141.05 37.73 35.1 34.8
死亡率 11.55 10.85 9.64 9.64 14.5 21.19 9.19 8.76 9.83 10.39 10.049.63
自然增长率 14.51 16.22 24.72 21.01 11.92 -4.78 18.14 33.7531.32 26.8 25.06 25.16

宁夏

总人口 165.11 172.02 179.38 193.51 208.85 213.03 203.05 198.81206.7 214.89 226.78 235.38
出生率 34.09 34.2 43.24 39.32 23.8 16.58 13.04 44.6 50.52 49.37 48.02 42.2
死亡率 10.24 10.58 11.06 14.98 15.82 13.9 10.71 8.49 10.2213.44 9.27 9.35
自然增长率 24.66 23.62 32.18 24.34 7.98 2.68 2.32 36.11 40.3 35.9338.79 32.85

江西

总人口 1763.38 1799.97 1851.45 1912.89 1975.97 2009.85 2002.67 2039.912101.03 2143.63 2209.54 2283.65
出生率 32.33 29.01 38.34 30.28 28.64 26.78 21 37.19 39.5638.05 38.85 38.13
死亡率 16.23 12.49 11.48 11.34 13.01 16.06 11.54 11 9.7610.87 9.39 8.54
自然增长率 16.1 16.52 26.86 18.94 15.63 10.72 9.46 26.19 29.827.18 29.46 29.9

新疆

总人口 511.78 533.17 558.01 582.35 648.98 686.33 710.06 698.97713.12 744.18 789.1 837.99
出生率 30.67 31.1 31.48 31.03 29.87 28.13 25.16 32.02 35.1442.21 41.7 38.08
死亡率 14.4 14.2 14 13 18.84 15.67 11.71 9.71 9.43 16.35 11.1 9.39
自然增长率 16.27 16.9 17.48 18.03 11.03 12.48 13.45 22.3125.71 25.91 30.6 28.69

内蒙古

总人口 843 896.6 936 986.1 1062.5 1191.1 1163.1 1171.8 1215.41253.7 1296.4 1329.6
出生率 37.5 29.5 37.2 28.4 30.8 29.4 22.1 38.2 45.1 41.9 40 36.1
死亡率 11.4 7.9 10.5 7.9 11 9.4 8.8 9 9.4 11.8 9.3 8.07
自然增长率 26.1 21.6 28.7 20.5 19.8 20 13.3 29.2 35.7 30.1 30.7 28

北京

总人口 555.92 598.23 619.08 631.85 684.1 732.13 721.02 723.64747.38 765.01 773.93 770.06
出生率 40.07 40.02 42.1 37.02 30.7 33.03 25.7 35.92 43.41 30.422.95 19.41
死亡率 9.6 7.57 8.19 8.08 9.58 9.22 10.08 8.71 8.11 8.27 6.75 7.24
自然增长率

天津

总人口 487.3 506.9 529.5 548.2 567.5 583.5 584.2 595.6615.3 629.5 637.7 640.8
 出生率 37.12 34.39 37.28 34.56 28.49 27.38 20.42 33.6840.61 28.72 24.33 21.02
 死亡率 9.85 8.79 9.35 8.66 9.88 10.34 9.89 7.36 7.3 7.79 6.17 6.91
 自然增长率 27.27 25.6 27.93 25.9 18.6 17.04 10.53 26.3 33.31 20.9318.16 14.11

上海

总人口 925.6 942.07 1009.58 998.82 1028.39 1054.08 1053.17 1057.861073.64 1086.72 1093.79 1095.83
 出生率 41.7 40.5 45.6 36 27.8 27.6 22.4 26.3 30.3 20.6 17 14.6
 死亡率 8.1 6.8 6 5.9 6.9 6.8 7.7 7.3 7 6.1 5.7 5.3
 自然增长率 33.6 33.7 39.6 30.1 20.9 20.8 14.7 19 23.3 14.5 11.3 9.3

注：《中国人口·湖北》缺 1955 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本表用公安部的数据补上。《中国人口·北京》中缺 1955、1956、1959、1960、1962、1963、1966 的死亡率，表中数据系用公安部数据补上。另外，安徽数据中也缺大部分年份的死亡率，也是用公安部的数据补上的。公安部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中国人口·江苏》中数据有错，本书用《江苏统计年鉴》数据作了修正。

根据表 23-2 中的数据，采用本章前面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后三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计算结果如表 23-3。

表 23-3 大饥荒对各省人口的影响（单位：万人）

地区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总计
四川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数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安徽						
非正常死亡人数	9.46	24.12	192.7			226.28
少出生人数	39.74	53.81	79.03	70.48		243.06
河南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9	17.18	139.38			166.45
少出生人数	7.44	32.79	101.25	93.52		235.00
山东						
非正常死亡人数	14.30	43.50	71.18	43.75	11.71	184.43
少出生人数	5.35	78.49	84.17	57.65		225.66
湖南						
非正常死亡人数	4.93	64.67	20.72			90.32
少出生人数	21.86	44.04	59.97	83.18		209.05
贵州						
非正常死亡人数	1.19	10.05	63.96	14.34		89.59
少出生人数	13.88	24.70	37.09	41.30		116.97
广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1.43	14.07	40.23	18.23		73.96

少出生人数	7.41	25.84	36.87	40.20		110.32
甘肃						
非正常死亡人数	14.45	9.91	40.10	2.21		66.67
少出生人数	5.90	21.69	26.2	26.21	80.00	
江苏						
非正常死亡人数	17.52	33.97	12.30			63.79
少出生人数	43.43	60.69	70.78	9.23	7.93	192.06
辽宁						
非正常死亡人数	2.42	9.89	9.36	24.63	1.77	48.07
少出生人数	21.64	12.53	49.65	6.72		90.54
广东						
非正常死亡人数	1.80	11.49	24.38	7.72	2.63	48.02
少出生人数	15.51	35.94	57.98	48.00		157
云南						
非正常死亡人数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数	28.53	33.96	27.6	36.5		126.59
湖北						
非正常死亡人数	13.11	34.28				47.39
少出生人数	6.30	19.28	50.92	16.41		92.91
河北						
非正常死亡人数	1.78	6.96	20.44	12.08		41.26
少出生人数	24.87	30.40	40.39	60.75	9.75	166.16
福建						
非正常死亡人数	11.56	6.26	0.58			18.40
少出生人数	8.84	11.48	15.59	28.06		63.97
江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3.32	9.49	0.48			13.29
少出生人数	10.37	13.9	17.96	29.67		71.9
吉林						
非正常死亡人数	0.09	5.67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数	6.12	13.11	7.64	16.45		43.32
浙江						
非正常死亡人数	2.61	6.73	1.43			10.77
少出生人数	3.37	23.62	31.06	47.12		105.17
青海						
非正常死亡人数	0.61	1.56	7.77	0.35		10.29
少出生人数	2.18	3.65	6.36	6.13	0.49	18.81
黑龙江						
非正常死亡人数	5.71	2.13	3.29			11.13
少出生人数	7.46	12.17	9.42	19.16	4.44	52.65
山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0.24	2.06	4.46	1.11		7.87
少出生人数	6.85	8.99	9.55	23.67		49.06
陕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2.78	2.10				4.88
少出生人数	11.85	12.29	10.58	23.95		58.67
宁夏						
非正常死亡人数	0.91	1.15	0.79	0.12		2.98
少出生人数	0.47	3.63	5.33	5.99		15.42
新疆						
非正常死亡人数	3.45	1.62				5.07
少出生人数	3.67	5.17	7.48			16.32
内蒙						
非正常死亡人数	1.20					1.2
少出生人数	6.38	8.6	17.57			32.55
北京						
非正常死亡人数	0.98	1.55				2.53
少出生人数	5.39					5.39
天津						
非正常死亡人数	0.97	1.27	1.02			3.26
少出生人数	1.11	1.78	5.87			8.76
上海						
非正常死亡人数	0.49	1.44	1.02			2.95
少出生人数	2.5	8.01	3.91			14.42
全国						
非正常死亡人数	172	475	1109	300	42	2098
少出生人数	365	735	989	1044	87	3220
人口总减少数	537	1210	2098	1344	129	5318

由表 23-3 计算结果可知,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了 5318 万人(其中非正常死亡 2098 万人,少出生 3220 万人)。各省的死亡率数据基本上是以官方统计为基础的。到了 20 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少省份对数进行了一些修正。应当比原有的统计数更接近实际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饿死人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有些省份用这些数据计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数,比调查者的数字偏小。例如,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非正常死亡是 300 万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 500 万人(见本书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计算的结果只有 226 万人。薄一波对赵健民说山东饿死 300 万人,这里计算的结果只有 184.43 万人。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 1200 万人,上表中只有 787 万人。《福建党史月刊》2001 年第 1 期载文认为,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万人数为 22 万人,少出生 65 万人,该文是用省公安厅的数字计算的。而表 23-3 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 18 万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当年在省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八十年代还在该省或在中央担任要职,他有可能干预这些省份的死亡数据,以减轻其历史责任。我在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用各省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更接近实际一些,但还是一个比实际情况缩小了的数据。

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按年度分布情况,见图 23-2。

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 1958 年，全国就有 172 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475 万，至 1960 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 1109 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 年为 300 万人，至 1962 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 42 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700万。杰勒德·卡特认为，1958-1963年有2700万人死亡，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1960年，死亡人口为4090万。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23-4。

表 23-4 人口统计数字中不应有的差别（万人）

年份	总人口增加数 (1)	自然增长人数 (2)	(2) - (1) 理论上应为 0
1953	1314	1337	+23
1954	1470	1466	+4
1955	1199	1233	+34
1956	1363	1270	-93
1957	1825	1479	-346
1958	1341	1124	-217
1959	1213	677	-536
1960	-1000	-304	+696
1961	-348	249	+579
1962	1436	1794	+358
1963	1877	2270	+393
1964	1327	1927	+600
1965	2039	2026	-13

资料来源：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的情况》，

1881年3月7日。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1958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性别、民族等基本特征。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六项。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著名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重估历年出生率。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出如表23-5。

表 23-5 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

	出生率 (‰)			死亡率 (‰)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1954	43.44	44.4	41.91	24.20	29.1	19.96
1955	43.04	41.3	41.37	22.33	22.4	22.31
1956	39.89	40.02	38.28	20.11	20.8	16.85
1957	43.25	41.1	41.45	18.12	19.0	13.24
1958	37.76	37.7	36.22	20.65	20.4	15.98
1959	28.53	28.3	27.24	22.06	23.3	19.20
1960	26.76	25.2	25.65	44.60	38.8	40.76
1961	22.43	22.3	21.70	23.01	20.5	27.03
1962	41.02	40.9	39.79	14.02	13.7	18.28
1963	49.79	47.3	48.69	13.81	13.0	21.22
1964	40.29	40.7	39.82	12.45	13.5	20.82
1965	38.98	39.7	38.77	11.61	11.1	10.26
1966	39.83	38.3	39.52	11.12	10.4	12.27

资料来源：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Ansley J .Coale :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 1952-1982 》，
NATIONALACADEMYPRESS Washington, D.C 1984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 1955-1957 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 1964-1966 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 1959-1961 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 (22.33 + 20.11 + 18.12) / 3 + (12.45 + 11.61 + 11.12) / 3 \} \% / 2 = 15.96\%$$

正常出生率为：{ (43.04 + 39.89 + 43.25) / 3 + (40.29 + 38.98 + 39.83) / 3 } % / 2 = 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 年为 300.1 万人，1959 年为 386.8 万人，1960 年为 1833.5 万人，1961 年为 456.7 万人。1958-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2887.1 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 年 199.7 万，1959 年为 803.4 万，1960 年为 921.33 万，1961 年为 1195.1 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 3119.5 万人。

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 (2987.1 + 3119.5) 万人，

即 6106.6 万人。

表 23-6 班久蒂对中国总人口和增长率的修正

年份	修正后的平均人口 (百万)	修正后的总人口 (百万)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
1955	606.5		20.7
1956	619.1		19.8
1957	633.2		25.1
1958	638.85	646.7	17.1
1959	650.5	654.3	6.5
1960	652.5	650.7	-17.8
1961	647.75	644.8	-0.6
1962	653.3		27
1963	674.2		35.9
1964	696.1		27.8
1965	715.5		27.4

资料来源：彭尼·凯恩：《1959-1961 中国大饥荒》，郑文鑫、毕建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04 页。

用同样的办法，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 16.2‰，正常出生率为 40.2‰。即：

$$\text{正常死亡率} : \{ (22.4 + 20.8 + 19.0) / 3 + (13.5 + 11.1 + 10.4) / 3 \} \text{‰} / 2 = 16.2 \text{‰}$$

$$\text{正常出生率} : \{ (41.3 + 40.2 + 41.1) / 3 + (40.7 + 39.7 + 38.3) / 3 \} \text{‰} / 2 = 40.2 \text{‰}$$

用科尔修订后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人口数（以 1954 年底总人口 60266 万为基数）。

表 23-7 科尔修订的人口数

年份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	修正后的总人口 (万)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 (万)
1955	18.90	61405	
1956	19.22	62585	
1957	22.10	63868	
1958	17.30	65075	64522
1959	5.00	65400	65238
1960	-13.60	64510	64855
1961	1.80	64626	64568
1962	27.20	66384	65505
1963	34.30	68661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

亡人口和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1958 年: $64522 \times (20.4 - 16.2) = 271$ 万人; 同样可以算出 1959 年为 463 万人; 1960 年为 1468 万人, 1961 年为 278 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481 万人。

少出生人口: 1958 年: $64522 \times (40.2 - 37.7) = 161.3$ 万人, 同样可以算出 1959 年为 776.3 万人, 1960 年为 974.9 万人, 1961 年为 1155.8 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 3068.3 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 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 即 5549.3 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生率和死亡率, 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 (出生率减去死亡率), 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人口数 (以 1954 年底总人口 60266 万为基数)。

表 23-8 卡洛修订的人口数

年份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	修正后的总人口 (万)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 (万)
1955	19.06	61415	
1956	21.43	62731	
1957	28.21	64500	
1958	20.04	65806	65153
1959	8.04	66335	66070
1960	-15.11	653430	65838
1961	-5.33	64994	65167
1962	21.51	66392	65693
1963	24.77	68037	

依据表 23-8 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用 1954 年总人口为基数, 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 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 计算的结果是, 正常死亡率为 15.96‰, 正常出生率为 39.87‰。1958-1962 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2850.9 万 (1958 年为 130.3 万, 1959 年 214.0 万, 1960 年 1632.8 万, 1961 年 721.4 万, 1962 年为 152.4 万)。四年少出生人口 3197.85 万 (1958 年为 237.8 万, 1959 年 834.5 万, 1960 年 936.2 万, 1961 年 1184.1 万, 1962 年为 5.25 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 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 即 6048.8 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表 23-9 根据三位外国学者的数据计算出的三年人口变动 (万人)

年代	班久蒂	科尔	卡洛
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1958	300.1	271.0	130.3
1959	396.8	463.2	214.0
1960	1833.5	1468.9	1632.8
1961	456.7	277.6.9	721.4
1962	152.4		
总计	2987.1	2481	2850.9
少出生人口			
1958	199.7	161.3	237.8
1959	803.4	776.3	834.5
1960	921.3	974.9	936.2
1961	1195.1	1155.8	1184.1
1962		5.25	
总计	3119.5	3068.3	3197.9
人口总减少	6106.6	5549.3	6048.8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1、蒋正华的研究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三年大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700 万人。由于蒋正华的这个结论已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所以，我作一详细介绍。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是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 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 1982 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1985 年 6 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所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 年 10 月生，1958 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 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 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 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700 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

由于此时的蒋正华已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算是国家领导人，找他采访很困难。于是，我找到了蒋正华就这个问题发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后来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复印件，也是这组数据。）二是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以《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为题的文章中的数据。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617 页上的数据，李成瑞对我说，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列出三组数字列表如下：

表 23-10 蒋正华提出的三组不同的中国人口数据 (‰)

年代	《中国人口·总论》数		《中国人口年鉴, 1987》数		《西安交通大学报》数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5	36.54	17.23	37.32	22.54	37.98	12.68
1956	35.20	16.77	35.92	21.52	36.39	12.80
1957	36.45	16.55	36.84	20.53	37.19	13.01
1958	31.62	17.25	31.77	20.06	32.29	13.36
1959	28.46	18.96	27.86	26.91	27.77	17.29
1960	23.84	31.25	24.24	31.58	24.67	32.40
1961	20.78	24.57	25.03	24.38	24.50	16.52
1962	44.73	18.08	39.65	17.84	38.37	13.60
1963	45.57	16.72	46.23	16.35	45.37	13.27
1964	40.48	13.03	43.63	14.93	41.23	12.64
1965	38.46	11.28	39.51	13.04	39.43	10.86
1966	35.76	9.64	36.54	1.62	36.66	9.60

表 23-11 蒋正华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修正 (万人)

年份	估计年末人口	估计年中人口
1954	60310	59468
1955	61484	60785
1956	62636	61873
1957	63893	63057
1958	64829	64354
1959	65476	64999
1960	65239	65504
1961	64926	64932
1962	66760	65489
1963	68749	67603
1964	70400	69461
1965	72358	71263
1966	74325	73356

资料来源: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6 年, 第 618 页。

蒋正华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 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 其中, 1958 年到 1963 年总共死亡人数为 8299 万人; 同时按这 6 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 估算正常死亡为 6602 万人。二者相减, 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697 万人, 约 1700 万人。

读者可能看到, 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国外学者低, 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 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 1958 年到 1963 年总共死亡人数为 8299 万人 (这和科尔的估计的 8626 万人仅少 327 万人), 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 6602 万人 (这个数比科尔的 5840 万人高出 662 万人)。

我不知道 6602 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 1958 年到 1963 年总共死亡人数为 8299 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 1955, 1956, 1957 三年平均数，终点取 1964, 1965, 1966 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

$$\text{正常死亡率} = [(12.68+12.80+13.01) / 3 + (12.64+10.86+9.60) / 3] / 2 = 11.93 (\%)$$

按 11.93‰ 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 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 4685 万人。蒋正华算出的 6 年死亡总数 8626 万人减去 4685 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 3941 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 14.10‰，由此计算出的 6 年正常死亡人数为 5538.5 万人；则 6 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 2760 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 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 17.36‰，6 年正常死亡人口为 6818.8 万人。6 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 1478 万人。

蒋正华在 1987 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 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 1700 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text{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 (\text{当年死亡率} - \text{正常死亡率}) \times \text{当年年中人口}$$

$$\text{某年少出生人口} = (\text{正常出生率} - \text{当年出生率}) \times \text{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三次，其结果如下：

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 \text{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 (13.36 - 11.93) \times 64354 = 92.03 \text{ (万人)}$$

$$1959 \text{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 (17.29 - 11.93) \times 64999 = 348.39 \text{ (万人)}$$

$$1960 \text{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 (32.40 - 11.93) \times 65504 = 1340.86 \text{ (万人)}$$

$$1961 \text{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 (16.52 - 11.93) \times 64932 = 298.03 \text{ (万人)}$$

$$1962 \text{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 (13.60 - 11.93) \times 65489 = 109.36 \text{ (万人)}$$

在 1958 年到 1961 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为 2188.67 万人。

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 2821 万人（1958 年为 377.1 万人，1959 年为 674.7 万人，1960 年为 883 万人，1961 年为 886.3 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 5009.9 万人。

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 2337 万人（1958 年为 204 万，1959 年为 317.2 万，1960 年为 1124.7 万，1961 年为 681.1 万），少出生人口为 2868.5 万人（1958 年为 359.1 万，1959 年为 568.1 万，1960 年为 875.1 万，1961 年为 1066.2 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 5205.5 万人。

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 2209.9 万人（1958 年 173.1 万，1959 年 620.1 万，1960 年 830.8 万，1961 年 455.2 万，1962 年 30.8 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 2748.9 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 4958.8 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 1700 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 1700 万的结论？2002 年 6 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 年 6 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10 月 19 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以 1957 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 1964 年前后死亡率或 1964 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 1957 年到 1964 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 1982 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

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 1982 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 1957 年到 1965 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通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 200 万左右，1700 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 / 10, 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 200 万人，我在上面用三组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 200 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 1700 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2、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 = (某年死亡率 - 正常死亡率) × 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 = 该年年底人口 - [1 + (出生率 - 正常死亡率)] × 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 1957 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 (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 1957 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1962 年的出生率可信 (37.01‰)。由于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

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 1958 年到 1962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 3500 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 4400 万。（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形成过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3、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 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 1953-1966 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 1960 年和 1961 年，中国人口净减少 1348 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 1960 年和 1961 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 2568 万，根据 1956 和 1957 以及 1962-1963 年平均死亡率作为 1959-1961 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 1395 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 $2568-1395+1348=2521$ ，即 1960-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 2521 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 1959 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 2791 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 680 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 3471 万。

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4、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 (Jasper Becker) 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 4300 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 5000 万

到 6000 万。这份资料的准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5、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 1959-1961 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 1953 年、1964 年和 1982 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 1953 年和 1964 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 1958 年和 1961 年的人口。用 1958 年人口减去 1961 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 3245.8 万。我阅读了曹树基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我觉得他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比较可取，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他的方法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 年到 1959 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 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 世纪六十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 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他对中国人口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十分熟悉。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 1700 万非正常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 3300 万-3500 万人。

王维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

表 23-12 1959-1961 年总人口和自然增长情况 (万人)

年份	总人口	总人口增加数	自然增长人数
1958	65994	-	-
1959	67207	1213	+ 677
1960	66207	-1000	-304
1961	65859	-348	+ 2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83 页。

中国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数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计，按总人口增加数计算，减少 135 万人，按自然变动算，却增加 622 万人，两者差额为 757 万人。究竟哪个对呢？王维志认为，这两笔数都有问题。他分析，1959 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 677 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 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 1213 万，只比上一年少增 128 万，增长率仍然保持 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对 1960 年来说，总人口减少 1000 万，自然变动减少 304 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 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 249 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根据 1964 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 年人口应当是 64508 万人，比原统计数减少 1486 万人。这就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数重新估计。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 年按自然变动计算，人口增加 677 万人。1960 年和 1961 年共减少 2163 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 1348 万人多减少 815 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 815 万人调整到 1960 年和 1961 年两年里。即将 1960 年的原统计总人口减少 1000 万调为 1500 万，1961 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 348 万调整为 663 万。见表 23-13。

表 23-13 王维志调整后的三年总人口数和自然增减数 (万人)

年份	人口数		人口增减数	
	数量	以 1958 年为 100	数量	增减比例 (%)
1959	66671	101.03	+ 677	+ 1.03
1960	65171	97.75	-1500	-2.25
1961	64508	98.98	-663	-1.02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 年 1647.4 万人，1960 年 1389.3 万人，1961 年 1188.6 万人。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begin{aligned} 1959 \text{ 年死亡人口} &= 1647.4 - 667 = 980.4 \text{ 万人} \\ 1960 \text{ 年死亡人口} &= 1389.3 - (-1500) = 2889.3 \text{ 万人} \\ 1961 \text{ 年死亡人口} &= 1188.6 - (-663) = 1851.6 \text{ 万人} \end{aligned}$$

三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三项相加，即 5721.3 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 年死亡人口为 781 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68 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 781 万人作为 1959-1961 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则 1959-1961 年三年正常死亡为 2343 万人，总死亡人数 5721.3 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 2343 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5721.3-2343 = 3367.9 万人。即三年饿死 3378.3 万人。

其实，1958 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 781 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 1956-1958 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 $(706.2 + 687.5 + 781.1) / 3 = 724.9$ ，则 1959-1961 年正常死亡人数为 $724.9 \times 3 = 2174.7$ 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 5721.3 万人扣除 2174.7 万人，则三年饿死人口为 3546.6 万人。

按王维志的修订数，1960 年的死亡率应为 44.33‰，而不是统计年鉴上的 25.43‰。44.33‰这个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计的 44.60‰、卡洛的 40.76‰接近，高于科尔的 38.8‰，更高于蒋正华的 31.25‰（《中国人口·总论》数）、31.58‰（李成瑞书中数）和 32.40‰（《西安交大学报》数）。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会调整统计数字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 3250 万到 3500 万之间，他们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 1958 年和 1962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为 1958 年冬和 1962 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 1958 年和 1962 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 1958 和 1962 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 年为 181 万，1962 年为 42 万，共计 223 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 3500

万到 3700 万之间。取其中数 3600 万。

据我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我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 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例如，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数在 1200 万人（本书前面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 797 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革期间下放安徽时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 500 万人（本书前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 226 万）。在大饥荒期间曾负责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他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远多于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人口减少中，本书计算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少一些。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 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 600 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省内流动不会影响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我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 3600 万计。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 3600 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 4000 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 7600 万。

附录：

蒋正华先生台鉴：

请恕我称您为先生而不称副委员长，这是因为我看重作为学者的蒋正华更胜于作为官员的蒋正华。古人云：“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何况您的文章不会是“草草”之作，应是精心研究的学术著作，其影响更为深远。

是李成瑞推荐我找您的。据李老讲，您原来住 19 层，他住 8 层，经常交谈。对大跃进期间中国的人口变动，国外学者研究很多，有科尔，有班久蒂，有卡洛，等等，而李老独推崇于您。他认为您是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大跃进人口变动第一人。李老已发表了专门推荐您的文章。我是新华社退休记者。退休后想研究一下大跃进期间人口变动问题。李老建议我必须找您谈。

经李老推荐，我拜读了您的论文。现有几个问题想求教于您：

第一个问题：您提供的三组数据为什么不同？是同一方法算出来的吗？这三组数据哪一组代表您最后的看法？为什么要对前一组时进行修正？

现在我看到了您提供了三组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

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也是这组数据)。二是《中国人口年鉴，1987》，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第94-106页。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据李成瑞讲，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仅列出死亡率一项三种出处的差别。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中国人口总论	16.55	17.25	18.96	31.25	24.57	18.08	16.72	13.03	11.28
中国人口年鉴	20.53	20.06	26.91	31.58	24.38	17.83	16.35	14.93	13.04
西安交大学报	13.01	13.36	17.29	32.40	16.52	13.60	13.27	12.64	10.86

第二个问题：您推算出来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数为1700万，是用哪一组数据为基础？是用什么办法算出来的？

一般说来，知道各年死亡率（如您提供的）各年平均人口数（按统计年鉴两个年底数之和除2），就可以算出各年死亡人数。

各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

怎样确定正常死亡数呢？科尔以1957年和1964年的死亡率两点，取其中数。也有人取1955-1957三年的死亡率平均数作为起点，取1963-1965三年死亡率的平均数为另一点，再用科尔办法取其中数。这比科尔数要准确一些。也有人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您是怎样确定正常死亡人数的？

以上问题如能给我以启蒙，将不胜感谢。

找您很难，王维志提供了您夫人办公室的电话，我两个星期四都打电话，没找到人。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了您夫人，也未见回音。给人大常委打电话，把我当成信访的。所以，只好写这封信。

敬祝
大安！

杨继绳 2002年6月
2005年8月再发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 1958 年到 1962 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 年 8 月 16 日到 3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 1958 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 17 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 月 31 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魄了,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 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 369 亿美元,日本只有 297 亿美元。1961 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74亿斤。1996年才突破1万亿斤，以后一直在1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30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1957年10月的两三千万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亿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130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1米厚、66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5303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2.65亿人，即每2.65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35334万亩，比解放后8年增加的灌溉面积还多29.3%。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80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1958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锹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锹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锹，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51.2%，三种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28.8%，中小农具减少了25%，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40%左右。1959-1961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和1961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年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详见表24-1。

表 24-1 农业总产值及其指数

年份	农业总产值 (亿元)	以 1952 年为 100	以上一年为 100
1952	461	100	115.2
1953	510	103.1	103.1
1954	535	106.6	103.4
1955	575	114.8	107.6
1956	610	120.4	105.0
1957	537	124.8	103.6
1958	566	127.8	102.4
1959	497	110.4	86.4
1960	457	96.4	87.4
1961	559	94.0	97.6
1962	584	100	106.2
1963	642	111.6	111.6

资料来源：1980年《中国经济年鉴》第五部分和1983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部分。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1957 年钢产量 535 万吨，1958 年计划 620 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 700 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表 24-2 大跃进以前各年的钢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钢	61	90	135	177	223	285	447	535
钢材	37	67	106	147	172	216	314	4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225 页。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 15 年赶上美国后，于 11 月 18 日，就在 64 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 15 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1958 年 3 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冶金部党组“务了 8 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所提出目标又提前了 5 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1958 年 2 月 3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 624.8 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 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 年 4 月 14 日，又把指标提高到 771 万吨，比上年增长 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 年 5 月 30 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 800 万-850 万吨。比上年增长 49.5%-58.9%。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 48 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 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 800 万吨，华北 600 万吨，西南 310 万吨，东北 1100 万吨，西北 150 万吨，并预计到 1962 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 月 17 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 月 22 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

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 月 19 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 月 19 号才决定搞一千一。1958 年钢产指标为 1100 万吨（对外公布是 1070 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

但是，从 6 月 19 日到 8 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8 月 16 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 8 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会议。8 月 21 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100 个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 20 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 8 月 30 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1100 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 2500 万到 2700 万吨，争取 3000 万吨，其中 2500 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 200 万-250 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 9 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 600 多万吨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年的 1070 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9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9 月 5 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各项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1070 万吨这个数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都为“1070”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9 月 4 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 1100 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 9 月 15 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 9 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 月 24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 9 月 30 日，要达到日产钢 6 万吨，铁 10 万吨。9 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 8 月份的几百

万人增加到 5000 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 60 多万座。10 月，达 6000 多万人，最高达 9000 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 10 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1958 年 9 月 24 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 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 6000 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嵒嵒山公社就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10 月 14 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8 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42 个营，174 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嵒嵒山公社共扒房屋 1653 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

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嵯峨山公社共缴“废铁”71786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

全国各地都像嵯峨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1070”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未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1070”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50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13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168个，炼铁炉2846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9.34吨，铁3078吨，实际多为废渣。这13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著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产计划。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9月15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

10月1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9月29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5千吨钢、一个日产4千吨钢的省。

10月18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多吨。

10月26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2月23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〇七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1073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产钢1108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谭。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90%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1958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37年以后的1995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在1958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对于造成他犯错误的制度是恋恋不舍的,以至于在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公然出面强烈反对。在《忆毛主席》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讲了一些真话,但还处处还流露出对那种制度的留恋,流露出他当年能伴随毛泽东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2%、3%,有的高达6%。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1958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150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250-300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1958年9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许多粮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1800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在 1958 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 5 年到 10 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 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 年到 10 年缩短为 5 年到 7 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 月到 8 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 年 8 月 17 日到 30 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 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 1000 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 1958 年到 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 年 1 月到 3 月，全省建厂 1000 多个；3 月到 5 月，建厂 3500 个；5 月到 6 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 220000 个。其中，省办的 2500 多个，县办的 15000 多个，社办的 185000 多个。全省出现了 10 多个万厂县，20 多个千厂乡，50 多个百厂社。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 1530 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 35 个工厂投入生产。只有 13 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 5 月底就建成了厂矿 307 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 1958 年新建厂矿可达 1267 座。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 1980 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 1959 年时 92% 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 1962 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 508 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 179 处、设计能力 7484 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 44%。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 77%，因此从 1960 年 4、5 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 21%，1960 年提高到 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1960 年比 1957 年下降了 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 1961 年达到 105 亿元。其中工业亏损 46.5 亿元。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 1957 年的 53: 47 下降到 1960 年的 33: 67。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 年 138 亿元，1958 年 267 亿元，1959 年 345 亿元，1960 年 384 亿元。从 1958 年到 1960 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 996 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 81%。平均每年投资 332 亿元，比 1957 年高出 1.4 倍。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 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 1587 个，1959 年 1361 个，1961 年 1815 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 1384 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 年至 1960 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 312 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 246 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 80%，其中 1960 年国民收入减少 2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 39 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 38.8%，木材为 14.8%，水泥为 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 40.7%。在编制 1959 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 50 亿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 421 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 150 亿元。

表 24-3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年份	总计	基本建设投资
1954	102.68	99.07
1955	105.24	100.36
1956	160.84	155.28
1957	151.23	143.32
1958	279.06	269.00
1959	368.42	349.72
1960	416.58	388.69
1961	156.06	127.42
1962	87.28	71.26
1963	116.66	98.16
1964	165.89	144.1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301 页。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 年到 1961 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 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 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

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 35 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 1 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 年和 1960 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 年为 76.3%，1960 年为 73.3%。见表 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 24-4 大饥荒年代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

	出口额 (人民币, 亿元)	进口额 (人民币, 亿元)	出口商品额构成 (以出口总额为 100)			进口商品额构成 (以进口总额为 100)	
			工矿产品	农副产品加工品	农副产品	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
1956	55.7	53.0	26.1	31.3	42.6	91.5	8.5
1957	54.5	50.0	28.4	31.5	40.0	92.0	8.0
1958	67.1	61.7	27.5	37.0	35.5	93.1	6.9
1959	78.1	71.2	23.7	38.7	37.6	95.1	4.3
1960	63.3	65.2	26.7	42.3	31.0	95.4	4.6
1961	47.8	43.0	33.4	45.9	20.7	61.9	38.1
1962	47.7	33.8	34.7	45.9	19.4	55.2	44.8
1963	50.0	35.7	32.9	42.9	24.2	56.0	44.0
1964	55.4	42.1	32.9	39.1	28.0	55.5	44.5
1965	63.1	55.3	30.9	36.0	33.1	66.5	33.5
1966	66.0	61.1	26.6	37.5	35.9	72.2	27.8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 年，VIII-32，经济管理出版社，第 33 页。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 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 1957 年的 3101 万人，增加到 1960 年的 5969 万人，三年增加 2868 万人，增长 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 年，城镇人口总数为 9949 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 年为 10721 万人，1959 年为 12371 万人，1960 年达 13073 万人。三年共增加 3124 万人，增长 31.4%。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 2218 万人。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 1954 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 1959 年 9 月国庆 10 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全面跃进 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 1958 年到 1960 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 年的财政收入竟比 1957 年增长了 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 47%，大大突破了我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 30% 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 1960 年 81.8 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 年财政收入比 1960 年减少 37.8%，1962 年又减少 11.9%。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 180 亿元。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 300 多亿元，180 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 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 1957 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 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1960 年达 74.8 亿元，1961 年仍有 26.9 亿元。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 1957 年的 5.2 元降到 1961 年的 4.1 元。1962 年 2 月 26 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 24-5 大饥荒年间的财政状况（亿元）

年份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收支差额
1957 年	310.2	304.2	+ 6.0
1958 年	387.6	409.4	-21.8
1959 年	487.1	552.9	-65.6
1960 年	572.3	654.1	-81.8
1961 年	356.1	367.0	-10.9
1962 年	313.6	305.0	+ 8.3
1963 年	342.3	339.6	+ 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417 页。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 1958 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严重供不应求。1960 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标准。1961 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 35%，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 70%。这些库存商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占人民生活开支的 60%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 18 类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 15%，为了回笼货币，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1962 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很多。详见表 24-6。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 30%，有的地区上涨了 40%。

表 24-6 四川省简阳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对比表（1962 年 3 月） 单位：元/斤

品名	国家牌价	自由市价
大米	0.093	0.93
菜油	0.67	8—10
红苕	0.015	0.15
胡萝卜	0.05	0.20
棕片	0.21	1.10—1.20
莲花白菜	0.08	0.20—0.30
白布	0.28	3.00—3.20
猪肉	0.67	8.00—8.50
水牛肉	0.46	5.00—5.50
鲫鱼	0.47	4.80—5.00
鸡蛋	0.64	7.50—8.00

资料来源：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大饥荒网站”。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 47.6%，猪肉减少 80.6%，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961 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最高，每人 5 斤，上海 3.6 斤，北京、武汉 2 斤，天津、广州 1.7 斤，西安 1.3 斤，沈阳 0.6 斤。全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广州最高，为 12 斤，上海、北京 3.5 斤，重庆 2.8 斤，天津、武汉、沈阳 1.3-1.8 斤，西安不到 7 两。职工工资也下降。1961 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 537 元，比 1957 年下降 15.7%；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 1957 年下降 28.7%。根据全国大、中、小 13 个城市、526 户职工家庭收支情况调查，1961 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 17.07 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 15.53 元，比 1957 年减少了 1.87 元。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 10%。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1961 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 1962 年 3 月底，在 27 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有 21 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 3 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有 3 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1962 年 4 月 16 日，国务院财贸办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调整 一步三折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 1960 年 7 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议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决议，酝酿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步设想。8 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 1961 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补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1960 年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指出：“1961 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 1960 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 1960 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 8 月和 12 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 1860 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 1961 年 1 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的。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压缩党政机关和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等等。

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还抱着“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看法，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 1961 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 1900 万吨，比上年增长 1.6%；原煤产量 43100 万吨，比上年增长 2.6%；粮食产量要求达到 4,100 亿斤，比上年增长 10.8%。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1961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1961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工业状况。会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9 月 15 日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

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降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 40 种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这次会议提出“退够了再前进”的思想是符合实际的，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因此，“退”的决心还不大，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 30.9%，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 29.7%，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经济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但是，在对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措施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经济的严重局面，主张采取坚决有效的调整措施，扭转危局。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把困难主要归之于农业遭到的自然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跃进”，不仅不肯下马收摊子，还认为政策的后退是右倾，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

真正实现“退够”还是“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 14 天，1962 年 2 月 21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上，陈云分析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措施。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5 月 7 日到 10 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统称“五月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切实加强农业这两件事上下定了决心。进一步调低了 1962 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案。在这次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 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城镇人口在 1961 年已经减少 1000 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 873 万人）的基础上，1962 年又减少 1000 万人（其中职工 850 万人）。1961 年、1962 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 2000 万人以上。精简工作 1963 年还继续进行。从 1961 年 1 月，到 1963 年，三年共减少职工 1940 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 1744 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 1300 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 1963 年 6 月，共减少城镇人口 2600 万人左右。

(2) 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 年基建投资完成 384 亿元，1961 年减到 123 亿元，1962 年计划减到 46 亿元，后来实际完成 56 亿元加上自筹完成 67 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 1960 年的 39.6% 降到 1961 年的 19.2%，1962 年进一步降到 10.4%。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 1960 年的 1815 个减到 1961 年的 1409 个，1962 年进一步减至 1003 个，许多工程下马。

(3) 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1960 年钢产量 1866 万吨，1961 年压到 870 万吨，1962 年最初的计划是 750 万吨，后来调整为 600 万吨，实际完成 667 万吨。煤炭，1960 年实际产量 39700 万吨，1961 年完成 27800 万吨，1962 年计划 25100 万吨，后来调整为 23900 万吨，实际完成 22000 万吨。关、停、

并、转，1961年已经开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年已经比1960年减少25000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1962年继续减少了18000，两年合计减少了43700个，相当于1960年96000个的44.8%。

(4) 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农村劳动力1960年只有17017万人，1961至1962年两年，增加到21278万人。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1961年和1962年两年，净进口粮食160多亿斤。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需要。到1962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1961年粮食价格提高25%，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20亿元。

(5) 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1960年520万吨，1962年575万吨，化纤1960年10600吨，1962年13600吨，1965年达到50100吨。

(6) 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 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年9、10月，建筑工程部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报告称，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1035项，建筑面积334.4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95.4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132.9万平米，占38.6%；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万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31.4万平米，占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3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3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 10285 吨，木材 10900 立方米，水泥 12650 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 138 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 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 10 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 10 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篑。沈阳地区 1960 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 13 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 1965 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 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 8、9 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 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 1958-1962 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 年发生的 116 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 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1、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民族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剽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 1990 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 年 4 月 18 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 200 余名匪徒，胁迫群众 4000 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 1958 年 4 月到 1962 年 3 月，为期 5 年共进行大小战斗 3639 次（其中部队作战 2811 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 828 次），毙敌 1.6 万人，伤敌 4876 人，俘获 4.68 万人次，招降 5.88 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 4 门、高射机枪 4 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 年 3 月 18 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乱，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 年 7 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 年 8 月 15 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 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 月中旬

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年12月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年4月16日，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起。1960年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1961年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党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

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 18 条，子弹 1200 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 4 人，绑架干部 16 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 年 7 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 5 支，子弹 50 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 年 12 月 20 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 年 10 月 28 日，湖南公安厅、株洲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 40 多人。

1960 年 12 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 年 12 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 月 13 日阎普真带领 95 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 年 4 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 年 8 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礐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 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 5 名。

1961 年 7 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部长。

1962 年 11 月 10 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 月 22 日平息。

1963 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四川省阿坝地区从 1956 年到 1961 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 年云南镇沅县发生 30 余人的暴乱。

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翻阅。

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 1957 年 12 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 800 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 人遭冤狱，到 1979 年才平反。

2、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得知，大规模的边民外逃有三处。

一是西南边界。云南省沿边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 8 万人，从现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员超过了此数。仅德宏州外逃人员就有近 6 万人。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广东深圳，从 1958 年以来就出现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 1960 年，而是发生在 1961 年和 1962 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有 11 万多人，其中 6 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当遣返 4 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 2 万人。（详见本书《岭南风云》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1962 年春夏，6 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3、哄抢粮食

饥民哄抢粮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档案馆有资料记录。哄抢粮食多发生在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饥民哄抢运粮列车。哄抢粮库的情况也有发生。

张掖地委 1961 年 1 月 7 日晚向省委的报告说，武威车站自运粮一开始，群众就成群结队地到车站偷粮，1 月 5 日，白天约有五六百人，晚上约有 200 多名青年人，到车站偷粮、偷煤，共偷去青稞 90 多包，约 18000 多斤。驻车站炮兵团警卫战士阻拦不住，有的向战士掷石头，逼迫战士后退。有的喊话说：“你们不敢开枪打我们。”有的一个人纠缠战士，其他人去偷。据了解，当时警卫战士已架起了机枪，以阻拦群众。下午，到车站的群众已增加到 1000 人左右，县委常委黄进忠，从炮兵团又调两个排。同时，抽了部、局长 10 多人，到车站附近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教育群众，安排社员生活。张掖地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撤回新调去的两个排战士，不准打骂群众，不准拘留，绝对不准开枪，对远道而来吃不上饭的给他们做饭吃，说服他们回去。这天下午 6 时张掖地委乔生瑞向省委电话报告说，警卫人员架了一挺机枪，又从炮兵团抽了两个排的战士。

中共酒泉市委 1961 年 1 月 11 日、14 日连续向省委的报告说，从 1 月 5 日到 8 日，先后三天有 400 多名群众成群结队地抬上梯子，拿着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铁铤等到面粉厂抢粮。有的是搭上梯子越过墙去硬要，硬拿，有的在墙上挖洞进去偷，还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拦劫拉粮的皮车，用刀子将装粮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抢到粮就走。5 日曾鸣枪驱散，但后两天有人继续抢粮。对鸣枪行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检查。

省委天水工作组和中共天水地委 1961 年 1 月 23 日联向省委的报告说，最近以来，铁路沿线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列车被抢被偷事件不断发生，继续蔓延，日益严重，损失非常惊人。北道车站检查组去年 12 月份检查了进站列车 338 次，发现有 142 组列车被盗。另据统计，1960 年 10 月到 1961 年 1 月 22 日，共发生列车被盗事件 420 次。其中，1961 年 1 月的 20 天中就发生 184 次。被盗地区由小到大，由站到线，逐步蔓延发展，偷盗人数由单个发展到三五成群、结伙作案，由小量地偷窃粮食到大宗地见什么偷什么，由黑夜秘密偷盗到白天公开抢夺。

一些地方志记载了一些群众哄抢粮食的事件：

1960 年 12 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 180 起，据查清的 96 起统计，抢走粮食 3.6 万斤，1961 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 65 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 1962 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 13 个县 22 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 5495 人。

甘肃省在 1961 年 1 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

1961 年在张掖市发生 3000 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

1961 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事件。

贵州省雷山县在 1960 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

贵州黎平县 1960 年 12 月-1961 年 1 月期间发生 4000 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

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

4、刑事案件增多

个案调查报告显示，四川省泸县治安情况混乱，个别严重的生产队、管理区，连夜里开会都开不起来。如杨九公社自 1961 年 1 月 6 日到 10 日 5 天当中，连续发生抢劫偷盗案件 17 起。该村二郎管区三队社员杨云章在 10 日晚就被持棍棒进家抢走 6 只鹅、12 个鸡蛋、3 只羊。又如曹市公社从 1960 年 12 月底以来，发生抢劫偷盗案件 104 起。据政法部门统计，1961 年春一周内，全县 69 个公社中，有 36 个公社发生了抢劫偷盗案件。

过去中国是不公布犯罪统计资料的，1987 年才在有关部门中逐年公布，并且将以往的犯罪统计补充公布。从公布的刑事案件数据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数 21 万起左右，在饥饿最为严重的 1960 年和 1961 年，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但也与司法部门的指导思想不当有关。甘肃省《民勤县志》记载：“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们大量外逃和死亡，为了生存，一些社员宰杀牲畜、偷盗粮食。期间，法院审判工作由于受左的影响，将这些行为当作破坏活动进行打击。1959年受理各种案件种类刑事案件492件，占总案数的55.8%。”这本县志的说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况。

中国公安大学研究社会治安的教授张庆五当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对本书作者说，当年所发生的所谓刑事案件，大多是饥民为了生存偷窃或抢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盗窃案最多，杀人案很少。从吉林省的一份统计资料证实，在最困难的时候，凶杀、纵火、诈骗等案件与常年差不多，强奸案大幅下降，而盗窃案和残害牲畜案（杀了吃了）大幅上升。这和张庆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 25-1 1957-1963 年吉林省刑事案件发案数（起）的变化状况

年份	凶杀	强奸	盗窃	残害牲畜	诈骗	纵火	合计
1957	140	603	4537	79	366	74	10753
1958	165	671	7867	73	203	64	6148
1959	107	493	4395	24	125	26	5278
1960	106	542	4295	60	163	32	6557
1961	114	263	5478	397	297	38	12945
1962	146	388	11284	159	260	28	10593
1963	136	967	9443	27	366	48	9540

资料来源：《吉林省志》卷12《公安司法志·公安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震动，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这些社会控制的手段都是来自极权制度。

1、大规模的镇反肃反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这些政令发出以后，各地大规模地开展了镇压和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中，共捕了260万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人），杀了71.2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了120万人。

以后这种惩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续不断：

1951年6月22日，公安部公布《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

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1957年8月9日，国务院第56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龄和工资问题的规定；

1957年9月20日到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在北京展出，开展了关于肃反的大宣传；

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对“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肃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会在全省、地、县掀起一次肃清反革命的高潮。从广东省镇反可见一斑。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表以后，1950年10月，广州市军管会就颁布了《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广州市的镇反由此拉开序幕。叶曙明先生写了一篇题为《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长文，现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直到1951年3月为止，在省、市机关及铁路自首登记的的特务共有1013人；另有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市机关有10669人；铁路系统职工总人数9000人，其中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有5054人……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名

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内，其中广州市 1263 人），杀了 1465 人（其中广州市 67 人）。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尽快完成两广的剿匪和镇反。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951 年 1 月 22 日，广东决心急起直追。至 1951 年 1 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 1340 人（不完全统计，其中广州市 300 人），杀了 1308 人，在押 15322 人（剿匪中的俘虏未计，其中广州市 3322 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东坐镇督战。1 月下旬以后，广东再加快捕杀的进度。为了提高效率，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据广东省公安厅 2 月份的公布，从 11 月会议之后，至翌年 2 月，“根据初步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 2831 名（其中军区 1406，地方 1425），破案 180 件。另外仅潮汕、珠江、西江三个区和汕头湛江二市的统计，已抓 7270 名，现在全省统计共押犯人 40486 名，其中公安系统 28575 名，法院 11911 名。”但距离完成“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的任务尚远。

2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一封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中，对两广在剿匪和镇反中的“宽大无边”政策，再次提出严厉批评……随着 2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批准和公布，广东各地，再次掀起镇反高潮，成批镇压反革命分子。并定下指标，在大城市须按 0.5% 比例杀，在农村须按 1% 比例杀。

按 3 月份一个月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 8039 名，超过了解放后至 1951 年 2 月的 14 个月内所处决的总和（5218 名）。现在（截至 3 月份）全省共已处决 13257 名，关押 49281 名。

通过游街、举行宣判大会、街头布告、动员、上门宣讲，以及诗歌、小说、电影等等形式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形成全民镇反的高潮。4 月 25 日，广州市举行了有 3 万人参加的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判处 198 名反革命分子死刑。会后三天之内，政府收到群众投寄的拥护信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达 3 万多封。

3 月以后，雷霆万钧，高潮叠涌，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公审大会、控诉大会。在报纸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检举了我的爷爷”，“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要控诉他”，“我的丈夫是特务，现在人民政府枪决了他，我很欢喜”。

广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为了纠正一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处理“过宽”的倾向，根据政务院和最高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东北地区迅速大规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处决近千人。广西接到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后，扣押了各类反革命分子 8 万多人，其中一批人被处决。

建国初的彻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五十年代中期又进行了多次肃反。在 1955-1957 年，全国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在热火

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 141 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由于肃反任务过于繁重，就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从而“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 40 多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 年 3 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 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 25000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 1958 年 11 月，又在大跃进期间新建、扩建单位共 77 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 1959 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

大跃进期间，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 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基层的领导，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运动，使社会反抗力量大为削弱，没有人敢当反抗的带头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一份报告分析说：“由于几年来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级政治机关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抓紧了打击现行、挖掘残余、大搞改造、加强预防等工作，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促使全省敌我斗争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比过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2、利用专政工具连续严厉打击

大跃进以来，专政机关也对专政工作实行了大跃进，任何反政府的言论和行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1958 年 6 月 24 日到 8 月 16 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肃反斗争进行了总结，还作出了《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决议》，加强了肃反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清理力度。根据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的决议，各省纷纷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8 年冬到 1959 年 6 月，吉林省共挖出残余反革命分子 9058 名，反动会道门骨干 943 名；捉住流窜犯 677 名。还揭发出隐瞒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 4959 名。此外，还清查出嫌疑分子 11145 名。战役中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 26839 件，其中有价值的 16538 件。在群众压力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有 2232 名反革命、流窜犯投案自首。1960 年 7 月，吉林省将“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到县委和省、地委工作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打击力度。据本书作者党握的资料，吉林的情况具有普遍性。1958-1960 年，安徽天长县法院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判决书下乡，遇到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随时判决，宣布管制。公安、检察机关和公社干部亦可随时填写空白判决书，甚至出现少数口头判决现象。1958-1961 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 5813 人，在 1958 年共打击各种坏分子 10549 名，其中

死刑 37 人，逮捕 3238 人，劳动教养 702 人，被打击的坏分子大约占总人口 0.7%。这些被打击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冤假错案。

除了常规打击以外，各地还集中组织力量，进行突击性的打击。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1961 年 12 月 13 日到 19 日，吉林省在城市、铁路沿线的集镇，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围剿。这次行动，全省组织了 2 万多名干部参加，检查了 12487 个重点场所和部位。全省共发现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 9905 名，其中集中审查 8733 名，拘留审查 1172 名。清查处理了 7713 名。其中逮捕了 39 名，劳动教养 79 名，强制劳动 143 名，行政拘留 315 名。其它属一般问题，转交有关部门或经过批评教育后放回。由于广泛发群众，群众检举各种犯罪线索 1 万多件，扭送违法犯罪分子 52 名。在强大的声势下，7 天中坦白自首的盗窃、投机倒把、走私分子 2000 多名，坦白出来的集团有 21 个。1961 年四川崇庆县开展了 7 天的突击“治安运动”，对 909 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斗争，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杀事件 12 起。

为了防止乱捕乱杀，有的省对捕人、杀人有控制数字。但是，1960 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杀人的指标不够。如，1960 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数为 5000 人，杀人控制数字为 80 人。到 6 月底，全省已捕 2575 人（其中，反革命分子 714 人，其它犯罪分子 1861 人）占控制数字的 51.5%；杀 53 人，占控制数字的 66.25%。吉林省政法委党组给省委的报告说：“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深入，特别是改造落后地区、三反运动和城市调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开，必然会有许多敌人被揭发暴露出来，捕人、杀人也就会相应地增多……为了争取主动，领导心中有数，必须将捕人、杀人的控制数加以调整。我们的意见是，捕人控制数由 5000 人增加到 6500-7000 人；杀人控制数由 80 人增加到 160 人。”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的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强打击以外，大跃进一开始，各地基层政权对“敌对势力”加强了控制。《垫江县志》记载：“从 1959 年起，采取由党员、团员、民兵、治保员组成‘包夹小组’，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监管起来；实行一月一训话、季度一考评、年终总评的制度。根据表现好坏，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予以宣布。”四川省垫江县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3、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 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 1500 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党的意志，并带动和监督他周围的群众执行党的意志。党组织的控制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车间、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商店，每一个连队。共产党还领导着共青团、工会、妇联、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共产党所控制的组织里面工作、学习和生活。每一个人都只能从组织里得到生活资料，只能从组织那里得到信息。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受到组织的控制。

很少有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言论，反政府是极其个别的极端行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会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注意减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户口的控制，公安部门对每一个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由于把农民紧紧捆在土地上，社会上基本没有流民。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负责人徐守身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的电话会议上讲话说：最近中央公安部、内务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顿城市的治安秩序问题。因此，吉林省8个市在11月都要行动起来，到年底要求见效，到春节要求见大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制止流动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农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铁路要卡紧，火车上要严格执行凭票上车、凭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铁路沿线的流动人口，一律收容起来，有一个收一个。有家可归、自己愿意回去的，就遣送回乡；实在不愿意走或有困难的，也可以安置到农村。对遣送不归或假籍贯的人，要集中劳动，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边处理。

二是认真解决城市闲散人口。经过整顿以后，户口工作要加强起来。城市户籍警一般只管500户，力量不足的要补充。户籍警按干部待遇，并且不得轻易调动。对旅店、饭店、澡堂等复杂场所控制要严，防止坏人混入。立即停止对外售票的舞厅。

三是加强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要整顿内部秩序，加强纪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还说，要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个大城市都要选择典型案件杀几个，中等城市、农村也要杀一点。杀人要开万人大会，会上要有市长讲话，当场宣判，立即执行，张贴布告，做到家喻户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4、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

那时，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新生政权得到人民的信赖，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产主义，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做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做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

所有报刊，所有会议，所有的课堂和讲坛，都千篇一律地宣传政府的声音，发布对政府有利的信息。党支部、共青团、民兵、妇联、工会、学校，都向群众灌输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灭一切与中央声音不一致的“杂音”。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至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谁要否定“九个指头”，谁就是否定“三面红旗”。用空洞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淡化人们实实在在的饥饿，压制人们对饥饿的不满。

5、饥民的反抗在萌芽状态即被消灭，不可能发展壮大

在古代，饥民没有办法生存时就啸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泽东早年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政权对抗。在现代社会，这些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间力量很难借助武力来推翻它。这是因为：第一，没有领袖。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起骨干作用的还是地方豪强和中小地主。由于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农村的强人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既然豪强不存，农民起义也就没有领导精英。第二，没有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前，可以通过剥夺民间富豪为造反提供经济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财富全由国家控制，民间再没有可剥夺的地主富豪。第三，没有可以与政府抗衡的武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而民间不能拥有任何武器。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第四，没有组织。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毛泽东的井冈山。现代极权制度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靠领导集团内部瓦解，靠宫廷政变来更换领导集团。民间的反抗和骚乱只能是上层权力更迭的外因。

在 1958 年-1962 年间，政府拥有 400 万人以上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它既应对外患，更是为了应对内乱。民间反对者不可能聚集与政府军相抗衡的力量。

为了维持这支军队，为了提高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军费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见表 25-2。

表 25-2 中国的国防战备费金额（亿元）及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年份	国家财政总支出	国防战备费	国防战备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1950	68.1	28.0	41.1
1951	122.5	52.6	43.0
1952	176.0	57.8	32.8
1953	220.1	75.4	34.2
1954	246.3	58.1	23.6
1955	269.3	65.0	24.1
1956	305.7	61.2	20.0
1957	304.2	55.1	18.1
1958	409.4	50.0	12.2
1959	552.9	58.0	10.5
1960	654.1	58.0	8.9
1961	367.0	50.0	13.6
1962	305.3	56.9	18.7
1963	339.6	66.4	19.6
1964	399.0	72.9	18.3
1965	466.3	86.8	18.6
1966	541.6	101.0	18.7
1967	441.9	83.0	18.8
1968	359.8	94.1	26.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 420-421 页。

1950 年-1952 年是朝鲜战争期间，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特别大，最高达 41.1%。以后比例下降了。但是，国家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以后，这个表中列出的费用不是国防战备费用的全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从表 25-2 中可以看出，大饥荒年代军费开支是最低的。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在 8.9%-13.6%之间。

6、惩罚农村基层干部，消减农民的不满情绪

饿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干部作风最为恶劣的地方，也是“五风”刮得最严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过全国性的纠正“五风”运动，处理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处理这些基层干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说这些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本来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为受害的

农民出了一口气，缓和了矛盾，让农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干部不好”。而这些坏干部又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就把共产党的过错推到已经下台的国民党身上了。这些情况在本书上册介绍各省情况时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为什么像粮食“高产卫星”那么离奇的谎言没人揭穿？

为什么数千万的饥民濒临死亡得不到救助？

为什么造成饿死人的路线、政策一直持续三年？

为什么农村基层干部能如此残忍地摧残农民？

为什么饿死的大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为什么饿死几千万人绝世惨案能够密而不宣、一直隐瞒半个世纪？

这些问题只能从制度中找答案。

产生大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国这场大饥荒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以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加上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极权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首，这首诗是批评郭沫若《十批》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他这里说《封建论》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领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央政权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况。秦始皇废封建建设郡县。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认为秦始皇最先实行的郡邑制优于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评判优劣的。郡邑制把全国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手中，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的去留完全由皇帝决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创建的行政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

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使这个认识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王权主义。实际上，和毛泽东对应的不仅仅是王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译成全权主义。它是20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政治术语，是墨索里尼最早发明的，墨索里尼强调“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极权主义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按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们认为这个目标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价，倾全力以达到目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极权制度下是被允许的，有时是必要的，它因无限忠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变得合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奉行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们描绘出了人类最美好制度的图景。为什么他们所建成的制度和原来的理想大相径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

之路》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复他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怀疑开创者的真诚。他们中很多人也许是想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开始用这个理想建造这个制度的时候，不会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通过制度把单个人的活动连接成整体。但是，连接整体以后所导致的结果，任何个人凭着有限的知识和观察，是不能预知的。这像数学中的“有限”和“无限”的概念一样，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放在“无限”中有时是不正确的。这是一。

制度是千百万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愿，它要因袭原有制度的遗产（现代语言称为“路径依赖”），它还要受到种种外力的影响。一种“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后，建造者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是二。

第三，从理论上说，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们都要受到这个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逻辑力，制度的惯性力）又迫使制度的执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与制度建造者的最初愿望有时是相悖的。

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中国人经历的情况正是如此。

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扬的民主抛到九霄云外，俨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一天，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都是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1972年向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介绍毛泽东：“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乱必治”的历史契机，把历经半个世纪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皇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这些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十分稳定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牢固地掌握了这个权力结构之柄。这个“柄”就是军队和党的控制权。有了这个权柄，他就比任何人强大，他就成了全国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思想权威。民众的个体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微不足道，他们只能为全国唯一的目标——共产主义献出一切。

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历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样说“朕即国家”，毛泽东的权限远远超过了他们，他可以说“朕即社会”。在毛泽东以下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都是毛泽东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领导范围内像毛泽东一样行使权威。他们也是一个个土皇帝。

二、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哈耶克说：“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性质不同。但他们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

怎样“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共产主义的“这个单一目标”呢？这就得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正是这样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主领域。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

在城市，工商业都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公私合营工业占26.3%，私人工业占0.1%，城镇个体工业占0.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62.1%，集体所有制商业占16.4%，公私合营商业占16%，个体商业只占2.7%，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为2.8%。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只有国家计划，没有市场。个人不可能在“国家分配”以外的渠道买到任何物资。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全都由国家下达计划。工厂建一个厕所也得层层报批，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动工。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职工统招统配，工资全国统一制定级别、统一时间调整。

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份量最重。例如，中国的很多经济指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一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中国当时的制度不仅剥夺了老百姓获取食物的权利，也剥夺了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食物的权力。

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得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内奉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和秦始皇建立的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就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城市按部门或单位建立组织，在农村按属地建立组织。这些组织与各级政府相平行（实际是凌驾在各同级国家行政机构之上），都设立了党委会，基层组织为党支部。名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党的主席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各级党代会只不过议事机构和表决机器。中央委员会内又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内又设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实权的领导机构，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领导之下。党中央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第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地方党委会内也设常委，执掌日常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一是它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处于独立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1957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着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其它党派，但这些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

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有的民主党派内还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该党派的领导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命。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党服务的社会团体。

在帝王社会，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皇帝，又用一个新皇帝来代替它。在政党社会，推翻了一个一党专政，又一个新的一党专政来代替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军队是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支柱。高度集权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46 年 6 月到 1950 年 6 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 807 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即 1948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 400 万人。到 1950 年 7 月，又增加到 500 万人。1951 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 611 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 400 万人以上。一直到 1985 年 6 月，邓小平决定裁军 100 万，人数降低到 330 万人。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100 多所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

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即动员民用工厂的力量、用民用工厂的资源生产武器，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枪，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此外，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经验，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

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移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己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当然，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军队自己不能就地筹饷。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分别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过去毛泽东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毛泽东用枪杆子来保卫自己的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市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分立等。”他把人类创造的现代政治制度——“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坏、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在农村连富裕中农也受打击。实际上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变成专政对象。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它的“政体”。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最高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权外，拥有产生并监督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权力。国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经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决定国家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如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批准省、市自治区区划，决定战争与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有国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结合起来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职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元首实际是国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组成的集体。第一届人大届满以后，毛泽东再不愿意当国家主席，1958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就不设国家主席了。以后，由于毛泽东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又不让别人当国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就规定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上的条款也得遵命毛泽东的个人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纸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这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刘少奇反对法治，赞成人治。最后他还是被人治所害：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置之死地。这是后话。

西方现代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会议政治”是专制政治。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地角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也只能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一纸空文。《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和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宁、斯大林制度，就被称为“革命政权”，反对这个政权的当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严厉惩处。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做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一切舆论工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知道一种理论，使他们思想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强大力量，在政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共产主义理想是以“大我”消灭“小我”、以强权剥夺个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动员工具。为什么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共产风”刮了一阵又一阵，这是多年共产主义灌输的结果。

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标题、排版几乎完全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级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追根问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的注释、论证，对官方错误的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当时也有一些学术刊物，

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些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动员人们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 and 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 1956 年到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 60 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同一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人们视毛泽东的思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造就了众多的真诚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人为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而农民却认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确的，只是下面干部没搞好。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交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色。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络，构成金字塔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络的不同层级一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但从根本上说，重民，爱民不是目的，它是维护君权的一种手段，君主才是目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在迫害临近的时候，人们以欺骗求自保，以出卖朋友而换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级权力阶梯上的人都具有两面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人。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这是错误的政策产生并顺利推行的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错误会得到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放大”。这里只有正反馈，没有纠错机制。权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诱惑，使干部们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骗子，变成了用鞭子驱赶着奴隶的恶棍。

无形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专制制度首先压制的是地方豪强、社会能人。这样，使豪强不能欺压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财富。在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可以任意消费和处置国家财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虽然可以按行政级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许官员以外的豪强存在，不允许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这样，可以实现高官以外的社会公正。高官的特权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与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舆论还不断地宣传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老百姓虽然受专制的高压，但心里不平的情绪很少。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数群众虽然处于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状态，但可以维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简单的医疗。如果年景好，经济情况好一些，群众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于信息单一，老百姓不知道国外的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自己生活水平极度低下，但情绪上还满足，没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没有更大的压迫，就不会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过高估计了专制制度下群众的反抗情绪。在2003年的美伊战争中，美国人以为他们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欢迎解放者。实际情况与美国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大批的叛变者，也没有外逃的难民，而叛变者恰恰是接近萨达姆的上层人物。

极权制度使多数人利益受损，但很难有人出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挑战当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证了这个思想：如果个人行动使整个集团增加利益，则可以假设个人付出成本与集体收益等价。但付出此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集体收益中的极少份额。集团利益属于所有的人，集团越大，成员越趋向于搭便车而坐享其成。以至于“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由于迫害，所谓“理性人”都不敢对暴政有任何微词。于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出现了。每个人都服从于权力的意志，无疑，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政权强大。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是因为政权以外的民间力量难以推翻它，这一点，在本书“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一章中已有阐述。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难免犯错误。

首先是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好。一个人的脑袋代替了千百万人的脑袋，难免出现决策错误。他做错事以后不仅没有人敢批评，还要阿谀奉承，小错会铸成大错，局部错误会演成全局错误。

更为重要的是，专制制度下的高层领导者常常受骗。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决策，哪有不犯错误的？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垄断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舆论。他主观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观上也就封锁了自己的耳目。在这个制度下，信息只能纵向传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由于利害的诱导，下级总是反映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级爱听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假信息做出决策的。1958年粮食“放卫星”的假信息，使毛泽东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从1958年冬到1960年初，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出现。由于得到不全面、确切的信息，在毛泽东认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的、暂时的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饥荒进一步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的还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中共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在全国推广了贵州省办公共食堂的经验。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了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大量喜讯，还说“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3月5日，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培养了鸡……”3月5日，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向毛泽东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市的汇报整理的报告说：“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曾对我说：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毛泽东有时相信一些谎言，有时对有些谎言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据毛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开始，毛泽东对“放卫星”的报道是相信的，对于粮食“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一些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后来，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很多地方，尽管事先地方干部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毛泽东对一些放卫星、说假话是有所察觉的。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公社领导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着一位市领导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他们让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泽东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泽东对听不到真话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

据叶子龙回忆：“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为了摆脱假话的困扰，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亲自搞调查研究。毛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分三个组搞调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陈去浙江。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来去河北，陈云去青浦，朱去四川。没有这些调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人不仅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纠错机制。而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纠正错误；或者通过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才能改弦更张。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1958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铺天盖地，共产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一时，中国的多数人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振奋。正是在这美好理想的旗帜下，铸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但是，这共产主义的狂潮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少数人一时的疯狂。它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极端化。为了探索这一理想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它的源流说起。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人是万物之灵，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动物，他自私、贪婪、残忍、淫荡，而且无休无尽，在这些恶劣的方面远远超过其它高级动物。但人有同情心，有关爱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这是其它高等动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说人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人是群居的，有社会性。作为“魔鬼”的人经常和其社会性相冲突，而作为“天使”的人使他们和谐相处。为了维护其社会性，使其不至于相互残杀而自灭，人类的精英们一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现了种种宗教，种种学说。然而，在这种种宗教、种种学说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人类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间，这种执行者的魔鬼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尽管人类的创造是在社会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和相互合作中发展的，但作为创造性的本源还是每一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的危机。计划经济制度和与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成了千古难题。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和上一个难题相关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上众多的意志服从共同的意志。然而，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为“依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语）。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毛泽东组织社会的方式就是运用秦始皇遗留下来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威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恶魔，大饥荒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也是人们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

人类社会对上述千古难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长达数千年时间内，人类依靠超乎众人之上的最高权威力量来压制人性恶劣的一面。这个最高权威有的在人类之上，如上帝以及种种神；有的在人类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结合。但控制最高权威、防止他不变为魔鬼的难题直到现代才在部分国家中得到解决。

与服从权威相适应的理念是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人主义。崇尚集体、压抑个体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图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的规范之中。汉字中有一个“公”字，这个字是由“八”和“厶”组成的。“厶”即古“私”字，《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中国的“公”是和个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说法，其本来意义是“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第九》从“天下为公”出发，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人类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相隔万里的异域也会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远隔万里的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图主张“共有财产”。在同一书中，他写道：

妻子们、孩子们及其所有的奴隶们都有他们的一份共有财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行为。只要这点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一样。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让他们甚至在相同的时间内，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欢喜或悲伤。所有这些法律因把国家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更加完善。

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

在中国，几千年来，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王权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统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个人都是国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权思想就是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由秦始皇构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实体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所谓“格式化”，就是消灭了个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

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等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

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可以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用利他主义来抑制人类的魔鬼性。而利他主义也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圣经》上说，“爱你的邻人”，不要“爱你的部落”），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就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后成长和发展为西方文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

个人主义的美德是：尊重和宽容别人和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刚直不阿）；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这些美德减少了社会交往中的磨擦。

个人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任何人没有权力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无私的美名。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自己决定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他人做出牺牲，自己对这个决定的后果负完全责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

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于商业的发展，欧洲那种有严格组织的压抑个性的等级制度，在剧烈的社会震荡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一种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个人从束缚他的种种习惯和成规中解放出来，个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商业规范逐渐代替了等级规范，自由竞争逐渐代替了行政垄断，契约整合逐渐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类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大进步，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如是说。

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府的

存在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保护个人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是国家的目的。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不承认有“内圣外王”的超人，却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两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会的全权交给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交给一个不受外力制衡的独立的组织。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

如上所述，人类是群居的，是有社会性的。除了协调人性以外，还有一个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在组织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极而言之分为两类：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专制独裁制度。在二者之间，因民主和专制的程度不同，有着种种不同的情况。专制独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众利益的面目出现的。专制独裁制度的统治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从人的生理本源上看，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的动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会性动物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们的领袖取得权力靠的是强力征服，维护权力靠的是强力镇压。其征服和镇压是极其残酷、极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蚁群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的进化，人性的成份逐渐增多，动物性成份逐渐减少。政权更迭方式和执政手段逐渐人性化。专制制度逐渐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产主义探源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概括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一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这些危机造成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对于这些弊端，自从资本主义出现那天起，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论武器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然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大都来自古已有之的集体主义思想。

因此，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社会实践依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它的现代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做出了重要贡献。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3）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后人们简称为《乌托邦》的传世之作。这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使托马斯·莫尔名垂千古。莫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于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签调换一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么黄金干什么用呢？“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隶。《乌托邦》的问世形成了一个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发表了《太阳城》。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写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阳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组织生产和分配。在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私有财产，一切产品都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分配，人人都能从公社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由祭司掌握政权。居民在集体食堂里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劳动是全民的义务，人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太阳城”比乌托邦前进了一步，在那里没有仆人，没有奴隶。

18世纪末，法国人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提出了国民公社。国民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制。原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耕地和未开垦的土地等等，一律归国民公社所有。参加国民公社以自愿为原则，依靠公社的优越性，使私有者放弃财产加入公社。人人无条件地参加劳动。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为防止盲目生产和产品过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19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1771-1858），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法国人夏尔·傅立叶（1772-1837）使社会主义理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工业资产和其它资本实行公有制，并且建立计划化社会。

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定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都主张消灭私有制，有的主张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直接分配。马克思继承了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发展。人们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由此看来，马克思把空想变成科学，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怎样实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

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

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理论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远流长，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新中国建立以来，动用了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恶。成千上万的人把消灭私有制当作自己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这么美好的理想当然早一点实现比晚一点实现好。从这里可以找到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实践证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国有财富的执掌者必然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有人经济不仅低效率，而且是和专制制度相匹配的。消灭了私有制，必然为专制制度奠定基础。

这个理想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百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

后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下，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

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消费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分配问题。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资分配。因此，把拿利息当作剥削。中国在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后来也被当成剥削的根据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视。

按劳分配，谁来分配？实践的结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隶。分配者可以随时剥夺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资源。干部在公共食堂里随意对农民“扣饭”，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将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平等的互助关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然而，这个美好的理想一经实践，就出现了和他们初衷相反的结果。

这个理想的第四项内容，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怎么办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根本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马克思主义者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他们没有说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很长很长。共产党执政时期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对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领袖专政。专政对象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不愿意效忠领袖的人。

由于从古代的集体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针对人的魔鬼性的，都针对社会不平等种种社会弊端的。因此，自古以来，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处于下层的百姓是它的忠实信众，一些同情下层群众的知识分子，也极力宣扬它。从康有为到李大钊，都主张“大同”和“共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美好的理想，以各种通俗的或深奥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各种不同文化水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灌输。虽然在实践中，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还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作为考察党员、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这样，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 1500 万共产党员的集体信仰，还通过政权的强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都信奉这个集体信仰。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它的党员：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信仰通常是坚定的，而科学是要不断地发展和扬弃。信仰是心灵的，而科学需要实验去验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学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共产党的舆论控制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一大批人成了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单纯幼稚的

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

从古今中外的教派斗争中我们得知，凡是怀有极端宗教偏执的人们，通常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异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必然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残酷迫害。

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最早将社会主义一词译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杂志》，1877年黎昌庶随郭嵩焘出使英法，接着又转任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馆参赞。《西洋杂志》是他对欧洲的了解。这本书中两次提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将 Socialist 一词译成“平会”，“会”是“会党”的意思，即当时中国民间结社。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平”字，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有关。稍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对马克思的一些片断介绍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贫”、“均富”、“富民”的安民学说。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中国人蔡尔康节译的英国哲学家基德（梁启超译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将译著命名为《大同学》，用中国的“大同”思想来理解、介绍社会主义。1902年10月，梁启超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提到马克思的“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不过，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抑强济弱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与此并列，还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都曾著文介绍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认识各异，也不打算在中国实践。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等人本来是想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宪政国家，但当时相当多的人把那场革命当作一场种族革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上，“驱除鞑虏”放在第一位。“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反对“异族”统治是宋、明以来的主流传统。

当年在武汉三镇经历过这场革命的老人回忆，当时不叫“辛亥革命”，而称“兴汉灭旗”，即振兴汉人，消灭旗人。当时杀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乡距武汉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时（当时距辛亥革命仅30多年）多次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为了区别汉人和旗人，有些革命军抓住俘虏就让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陆伯陆司陆”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后一个“溜”字还没出口，就已人头落地。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有人在明陵举案祭奠，以政权归汉来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灵。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这样狭隘的革命成功以后，就很难有制度创新了。大清帝国的旗号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旗号，清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它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以及清帝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混乱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二十世纪之初，达尔文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种种学说纷纷在中国登场，各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

本来，英美等国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那时已经介绍到中国。当时，由华盛顿、杰弗逊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正如陈独秀在晚年（1940年）所说的，这套制度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鸦片同时进入中国的，是靠洋枪和大炮打开国门的，是与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圆明园的废墟相联系的。这些，势必在中国人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近几年来，余英时等学者提出了与毛泽东这个看法不同的见解，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发生。在西方野蛮性的市场扩张和两种文明冲突中，强者一方采取了令人遗憾的血腥、残暴、掠夺手段，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外强入侵面前，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

其次，中国专制制度统治的时间过长，在中国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以后的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英国，16世纪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专制制度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民间经济没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晚了一两百年。1872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现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业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这些企业都窒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把商人视为“四民之末”，市场经济是重商经济；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在广大底层群众中，形成了“非参与意识”。人们畏惧王权，又崇拜王权，只能伏在君主脚下当顺民。在王权的束缚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政治是极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甘心作王权统治下的良民。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这种政治文化土壤，这种土壤又培育着专制政治。

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土壤，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而来自苏联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多的亲合力。

第四，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贫富悬殊。当时，苏联和美国比较，显出了更多的优越性。1929年经济危机时，不少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苏联的制度。这种情形，对正在选择制度的中国显然会发生影响。

对于长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它那广阔视野、深邃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使他们看到了远比儒家学说所描绘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确、更加可信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贫济困的正义

之光，还给除统治者以下的各个阶层以巨大的利益诱惑。仅这些就会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终生。

按照列宁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可以集中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当时对苏联建设成就的宣传资料已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的佐证。这种前景，对于处于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可行的证据。毛泽东把农民起义当作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太平天国这个近似邪教的组织当作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流派称为“第二国际”（现代为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主张非暴力革命，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逐渐演生出社会主义。列宁称他们为“修正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党，主张用暴力剥夺有产者，取得政权以后，用行政强制推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用暴力镇压反对者。因此，从苏联引进来的“主义”，更是带有专制的血腥。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又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思想体系。这种中国乡土气息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承袭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用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王权思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躯壳在中国还魂。“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人权，结果事与愿违，引进的却是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苏联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王权思想的叠加。

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与中国社会擦肩而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的“国教”，毛泽东的极权制度在中国确立。三年大饥荒以及其它种种“人祸”接踵而来。

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在 20 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1962 年初，面对几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高层的不同意见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彭德怀，那么，现在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则是刘少奇。毛、刘之间的斗争从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刘少奇在 1958 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认识的？我曾就此问题请教于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姚回答说，可能是 1961 年回家乡调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 1959 年秋后就看到了生产力的大破坏，那时他对形势应当是清醒的，也许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也许是为了“党的团结”，也许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还是和毛泽东唱一样的调子。

然而，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一样的调子。

1961 年 1 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1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事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 年 11 月 22 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 1959 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

（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 1959 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后逐渐清晰起来。

1962 年 1 月 8 日和 9 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9 日 23 时，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一天。毛 9 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 日上午 10 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 3 天作报告。在这三天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和别的问题。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三级（中央、中央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 7118 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 1 月 11 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即上述报告）。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把反分散主义作为重点。但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也有多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恢复到 1957

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

代表们对刘少奇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可以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是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周恩来从维护毛泽东的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最不爱听的。

第一，认为“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造成了一个大马鞍形。讲话还对当前经济困难作了较严重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以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第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灾，七分人祸”。一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用“三七开”代替了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过去我们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插话，这种地方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翻箱倒柜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

第四，认为对这几年的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

第五，认为“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能进一步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讲话中，毛泽东有不少插话。当刘少奇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插话：“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毛泽东只承认“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显然是不满意的。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有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毛泽东当时看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从刘少奇的报告中看到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原计划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们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有一肚子气。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会议接着开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他十分坚决地、充分地、并且以空前的高调肯定了“三面红旗”，还说大饥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说“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不仅把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中的责任洗刷得一干二净，还对毛泽东极力神化。他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讲话时正是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听了这些话，一定会有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他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3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讲话稿以后，立即批给田家英和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讲话没有正面讲大饥荒问题，却大讲民主集中制。这是毛泽东阐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讲话，似乎这几年出了问题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结果。毛泽东把“民主”和“集中”两个对立的的东西结合起来，强调“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坏呢？因为集中是有制度保证的，而民主却没有制度保证，它只是领导人的恩赐。民主是对当权者的约束。约束总是不舒服的。作为个人，总是对上要求民主，对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集中，它本来就是专制制度的一张遮羞布。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也讲民主，但更强调集中。他说：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从林彪和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可知，毛泽东讲集中，还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说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现在要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对刘少奇没有正面回击，但还是用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作了论证。这表明他对刘少奇说的“‘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的话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会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会上也对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始终守住两道防线：一是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二是对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会决议向各省传达以后，基层干部不满意，在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甘肃省在讨论中，省委党校的干部说：“硬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人搞饭吃，还没有粮食，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现在才知道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说：“几年来不仅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搞坏了，不仅物质上搞坏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坏了。”省财贸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区域广，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的指导思想没有问题。”《甘肃日报》印刷厂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像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边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少，从下面找问题多。”有人在发言中直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不妥当，对下面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人民公社，说这与一大二公无关；大办钢铁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省粮食厅解仙清同志说：“毛主席说过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轻工办公室主任杜西林说：“我听到老百姓骂毛主席，说主席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还说：毛主席钻到哪个洞里去了，下面发生这么多问题，他知道不知道？”党群系统的干部说：“甘肃饿死人，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这样的简报各省都有。毛泽东看了这些简报会有什么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惧的力量，如果不强力反击，他的地位就很危险。

七千人大会显现出中共高层的严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还是持怀疑态度。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第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人祸。毛泽东有时也说过人祸，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区，即“三分之一”地区。第二，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对几年以来形势的估计。刘少奇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重于毛，对形势的估计没有毛那么乐观。第三，对大饥荒责任的想法，刘少奇、彭真等，比较看重毛泽东的责任；而林彪、周恩来等，为毛泽东开脱和洗刷。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谁支持他，谁反对他，他是会深深地记在心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一次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倒谁”心里初步有了底。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不少文献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一散会，毛泽东就去武汉了。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西楼会议”是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陈云2月26日的讲话中把严峻形势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幅度的减产；其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不相适应；其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其四，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以及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

鉴于前三年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怕把困难估计过重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毛泽东曾要求他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刘却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计困难。是不是刘有意和毛作对呢？不是。

在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重要物资统收统配。“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为了从中央财政和中央统配物资中多分一块蛋糕，各地经济业务部门总是向中央业务部门叫困难。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说形势大好，但向中央业务部门要东西，也是寸步不让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面前说粮食够吃，但为了减少四川省的征购任务，曾和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多次讨价还价（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所以，主管实际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总觉得困难很大。毛泽东不管这些具体事，听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见，感受到困难的压力比刘少奇、周恩来要小一些。“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其二，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经减少了1000万，1962年再减少1000万；其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其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其五，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五月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邓子恢主张适当地扩大自留地。对各地的包产到户，实际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1959年春天，采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庐山会议后全都否定了，这一次“退够”的措施，毛泽东会同意吗？对一贯主张“冒进是马列主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积极平衡，不要消极平衡”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容忍刘少奇等人的调整吗？刘少奇心里没底，还是要请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凉爽的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好，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下来向毛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

2003年9月25日，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书作者谈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到了上海。让陈国栋、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务，陈云说：你们到一些省去看看，农村真实情况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干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发表意见，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粮食产区，看到的情况是，集体的大田几乎荒芜，而自留地里粮食作物长势非常好。农民是靠自留地吃饭的。他们到上海向陈云谈了所看到的情形。陈云说：“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陈云告诫他们几人回北京以后什么也

不要说。还是陈云亲自向毛谈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七月陈云向毛汇报的那些事。

并没有像刘少奇预计的那样雷霆已过。一旦度过了难关，毛泽东就重新发难。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毛泽东之所以对1962年的调整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视为阶级斗争，视为要推翻他。这种看法终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 1958 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 1958 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1959 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 1961 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1962 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 20%，安徽达 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 70%。

1961 年到 1962 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 4 月 11 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1962 年 6 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半。邓子恢认为安徽省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试试看。”7 月 7 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代表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也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陈云 7 月向毛汇报时，也讲过重新让农民分田的事。如本书前面所说的，正是这些“倒退”才是走出饥荒、减少死亡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这和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中，还有一股“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1 月 27 日的口头讲话中，特别讲到彭德怀问题。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删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大约 1100 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信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庐山会议其所以要开展反

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阴谋篡党。等等。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的这些诬陷之词以后，倍感委曲，不得不奋起为自己申辩。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上了一个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之为“八万言书”）。这个“八万言书”不仅否定了刘少奇上述诬陷，还把庐山会议以及其后对他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怀翻案，这是毛泽东很不愉快的事。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其它方面也一改过去紧张的状况，开始出现松动和宽松。如对冤假错案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让步，对民主党派有所尊重，等。在这些松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头”情况，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讲了一些尊重知识分子的话，陈毅还提出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周、陈的“脱帽加冕”引起了上层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强烈反对“脱帽加冕”的说法。直到1979年，陆定一才在这个问题上认错，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是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送上去的。这封信有五点内容：1) 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2) 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3) 我们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 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5) 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为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平，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平，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平，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却密切注视北京。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

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的这番话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对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酝酿着反击复辟。

从统购统销到农业集体化；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斗争；这一系政策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高压下，这股反对力量只是一股潜流。身居权力最高层的毛泽东，是会感受到这股潜流的压力的。1958年以后，几千万人饿死，这是一桩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红旗”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党内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力量成了对毛泽东的离心力，而且离心力有日益强大之势。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8月6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以及前后与其相似的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有些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8月15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来看，他根本没有接受大跃进以来的教训。1958年冬以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工作，但对这几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

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漱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哪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1960年12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

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普遍意义”。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3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做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

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1960年到1961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1958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1958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书记座谈，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90%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10%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众。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

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28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少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自己的党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也用这个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国人。但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这个理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现实的冲击。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是坚持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还是根据现实作某些修正？是快一点建成社会主义，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实际是理想对现实的让步。毛泽东在八大三次会议上不经中央讨论推翻了“八大”的决议，接着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快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速度，从而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的根源在于用极权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快速推行共产主义理想。

大饥荒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面向实际，从共产主义理想退回现实，做现实需要做的事，可以称为“务实派”；另一派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用不停的政治斗争来推动这一理想的实现，可以称为“理想派”。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阵线也不十分清晰。务实派在务实过程中由于理想的情结，使他们在做违背理想的事时，总有一种理亏感，因而不事张扬；理想派由于理想总是遭到现实的无情碰撞，在维护理想时，总有一种阶级斗争的危机感和敌对情结。在中国这个政治条件和话语条件下，务实派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是，在理想派把经济搞乱了以后，总得由务实派来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过程中，务实派更加偏离理想，使得理想派认为他们更加危险。在毛泽东手中，对付务实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义。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是当时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遗嘱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斯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斯坦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他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和议会民主发展新情况，从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发表6篇文章，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自诩为“修正主义分子”，说明当时“修正主义”并没有贬义。持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批评俄国的十月革命，批评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国际”就受到列宁的批判，从列宁开始，“修正主义”就成了贬义词。

批判“修正主义”除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外，与毛泽东企图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也不无关系。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初步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

命 40 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是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全面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推倒了压在他头上的这尊神，提高了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会危及他毛泽东，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最后定的调子是斯大林“功大于过”。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实际上，丢掉了“两把刀子”就会危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丢掉两把刀子”是修正主义最为根本的罪状。

当毛泽东在做国际共运领袖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 15 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不甘落后，在 11 月 18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 年 8 月，毛泽东又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有学者分析，毛泽东搞大跃进，除了国内的原因外，还有国际共运的原因。他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当时他说“以苏联为首”只是一种策略。

然而，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持批评态度。自苏共 20 大以来尽管两党有分歧，但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对苏共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上。1960 年 4 月，为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 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

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激烈批评，不可能不引起回应。1960 年 6 月 24 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 6 月 21 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批评中国党的方针政策。从此，中共中央的反修斗争态度更加坚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苏共领导人也说成是修正主义者。“苏修”就成了中国人口头上一个常用语。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曾说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把这项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1963 年可以说是“反修年”。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由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这个小

组的任务就是写反修文章。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从 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 3 月，共写了 9 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简称“九评”）。“九评”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激昂的战斗音调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国广播，在中国深入人心。“九评”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推到了极左。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 1958 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践，大跃进失败，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疯狂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国也大行其道。这就是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

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组织成立于 1960 年，但长期不公布名称，国外称之为“红色高棉”，1977 年 9 月他访问北京时公布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宣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完全一样。波尔布特多次秘密访问北京，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

波尔布特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受到称赞。毛泽东对他这位得意门生的作法非常满意，他称赞波尔布特：你们干得好，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你们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产党执政几年，全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泽东称赞波尔布特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恶果。

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裂痕越来越深，斗争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到 20 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为了挽救危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把中国推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多数中国人、甚至中国共产党内相当多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当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时，执政者不敢对这个理想提出质疑。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共产党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唯一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把强加于全体人民的理想搁置起来，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而是面向实际，做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者。这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执政集团，它的管理权限应当是民众授予的有限权力，对它管理效果的评价应当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是某种先验的标准。因此，管理权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评价，只能通过民众的选票来表达。显然，这样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共产主义理想被搁置以后，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成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政权把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不能服众，就没有希望。

从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但是，我们不能太乐观。勒庞说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

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们执政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的亏太多了，教训十分深刻。激进的作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所以，反对专制制度过激、过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催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形式。刘少奇认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评了刘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支持高岗在东北搞农业集体经济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就解决粮食困难问题采纳了陈云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建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目前食油的产销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做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从12月初开始，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4年12月27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40多万个。部分农民抵触情绪严重。

1955年3月，邓子恢到浙江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讥讽怕农业社发展快了是“小脚女人”。他严厉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收缩农业社，他强调，“在发展问题上，目前不是冒进的问题。”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正式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工商业用粮实行按户定量供应，牲畜饲料用粮实行分类定量供应。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2月出版。他为

这本书写了序言和 104 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 1967 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 年 12 月 5 日下午，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路线。客观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 1967 年粮食总产量 1 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1956 年 1 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

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 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国务院各部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到 1967 年）指标。1956 年 1 月 4 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956 年 2 月 6 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进”的标志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 年，农业集体化在几个月内快速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 18 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7 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 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 33 个镇中有 29 个乡

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 116 个，部分垮台的有 55 个。

1957 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 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57 年 10 月 9 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进派》的高调讲话。他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会”，并且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他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工会第 8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 年反右派斗争，60 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宁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 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会后，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

1958 年 3 月 9 日到 3 月 26 日，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周恩来再一次就反冒进作检查，还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这个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5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1958年4月20日，嵯峨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为嵯峨山人民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提到消灭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说：“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要“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他还谈到消灭家庭的问题。

1958年3月-9月陆良事件。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从2月到9月，全县发生肿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年钢产指标为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1958年六、七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造成了960人非正常死亡。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四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把工、农、商、学、

兵（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8月6日，陈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这里来搞“共产主义试点”。《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32万人到徐水参观。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到徐水参观过。从此全国刮起了共产主义风。11月6日，毛泽东在《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更加强劲。

1958年8月29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99.1%。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在安徽视察时，他听说该省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说，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认为应该提倡。

1958年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少奇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

1958年夏秋以来，《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账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6月16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全国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他在批语中说：“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大受群众欢迎。”12月7日，另有一则批示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年11月25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4个区、20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8年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1958年12月6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2月22日、28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年2月27-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第四条中提出要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应降为1300万吨,获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问题。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第一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怀发起反击。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报告谎称粮食紧张的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市场好转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

1959年10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1960年1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农民超过一百万人。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年，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0.2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1960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这个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饿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做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如：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今年全国80%的人在食堂里吃饭；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钢铁要依靠“小洋群”，还要搞“小土铁路”、“小洋铁路”；农业发展纲要提前完成的问题等。天津会议还是坚持“三面红旗”，但反对刮共产风。

1960年3月25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

1960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6月10日-1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14

日的讲话中提出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在讨论中苏关系问题的同时，研究了国内经济问题，会议通过《关于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这些合同与农业无关。

1960年7月30日，《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11月9日发文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8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一，八字方针此时还无法贯彻。

196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

1960年10月23-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的汇报。主要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会上讨论了问题暴露得较早的河南和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信阳事件的材料，10月26日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的原因是农村基层政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这个文件主要是纠左，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十二条”还坚持办公共食堂。

196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

信中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做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196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年，中国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326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6.63万吨。1960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年进口粮食580.97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135.5万吨。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一致，真正的调整是在1961年下半年开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20日，毛派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三个组分别去浙江、广东、湖南去做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法。

1961年4月19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

报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堂在中国消失。

1961年8月23-9月16日，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认为：经济形势1961年到了谷底，从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无非60亿，搞得好的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呜呼哀哉。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

1961年12月9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年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以及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年7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3年-1965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两派分歧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文化大革命失败，从反面导致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一、来源十分可靠的原始文件

1、河南省

路宪文向毛泽东汇报，见《毛主席在信阳的谈话》，1958年11月13日晚。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报告》，1959年10月30日，2407。

《宋致和同志关于信阳地区几个县当前几项主要工作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4日。

省委检查组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60年6月3日。

省地委联合检查组伞陂寺公社小组：《关于潢川县伞陂寺公社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3日，2403。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死人问题的再次检查》，1960年6月3日。

中共淮滨县委：《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再次检查》，1960年6月7日。

中央办公厅、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 1960-3017。

中共中央组织部赴河南调查组：《关于息县和防胡反瞒产私分的情况》，1960年10月9日。

杨蔚屏：《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10月15日。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党籍、判除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死刑

和对信阳地委死人事件处理几个政策问题的请示》，1960年11月1日，1960-2409。

信阳事件专案审查组：《关于马龙山的问题》，1960年11月20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1960，期限：永久，卷号：2403。

李立：向吴芝圃的报告，1960年11月28日，2405。

《路宪文对自己错误的检查（初稿）》，2412。

马龙山1960年10月21日于信阳报告，《谨呈刘科长转省里来的两位主任》。

《王秉林揭发杨蔚屏的材料》，1960年11月。

《张富同志向中央反映经情况受到压制的过》，1960年，12月。

《中共河南省委对信阳事件的检查》，1960年11月1日。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1960年11月1日。

中央专案组：《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1960年11月20日。

王从吾、徐子荣：《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1日。

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2月6日。

中央工作队魏震1960年12月21日报告：《关于鹿邑县揭发出的几个突出问题》。

2、甘肃省

张仲良：《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1958年2月9日。

中共定西地委组织部：《关于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复查情况报告》，1959年10月19日。

《清水县委关于生活安排、人口外流情况的电话汇报》，1960年2月17日。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1960年3月30日。

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1960年8月19日。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4、6、13期，1960年11月9日。

中共兰州市委：《关于干部职工中发生的浮肿病的情况报告》1960年12月3日，[60]846号。

省工交部：《工交系统发生浮肿病的情况》，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1960年12月9日。

中共玉门市委：《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11日。

中共白银市委：《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0年12月18日。

中共天水地委：《关于请拨免费医疗款的报告》，1960年12月24日，甘收[60]1725。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职工浮肿病情况报告》，1960年12月30日。

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1961年1月5日。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甘收[61]2060。

《武威地委关于永昌县发生疾病、断炊、人口外流情况的电话汇报》，1961年1月15日，甘收[62]20049号。

《省委卫生厅检查组给省卫生厅党组并定西地委的报告》，1961年1月8日。

《定西工作组李步胜、李生华、田园给省委的报告》，载《定西地委扩大会议简报之三》，1961年1月12日，甘收[61]2164。

省委天水工作组、天水地委：《省委天水工作组、天水地委关于保卫铁路运输安全工作的报告》，1961年1月23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甘收[61]2381。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举办集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1961年2月27日。

中共榆中县委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中共甘南州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和增拨农村粮食指标的报告》，1962年4月8日，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2]20638号。

临夏州委：《临夏县大河家保安族公社生活情况简报》，1962年5月11日，《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2]20864号，共印23份。

中共榆中县委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中共酒泉市委：《关于面粉厂对偷粮群众鸣枪错误的检查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甘收[61]2231，甘收[61]2189。

《甘肃省的省级单位十九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学习讨论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对中央、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1962年年2月28日，省委办公厅汇集。

临夏州委：《临夏县大河家保安族公社生活情况简报》，1962年5月11日，甘收[62]20864号。

3、四川省

《井泉同志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决议的报告(记录)》，1958年8月30日上午，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1514。

省委检查团绵竹工作组：《关于绵竹红旗公社缺粮情况和解决办法的报告》，1959年3月9日。

《李井泉同志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1日。

省委简阳工作组：《杨部长并转廖书记：解放公社解放耕区有关当前生产的几个问题的简单报告》，1959年4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第2448号。

四川省委生产整社检查团西昌分团孙传学：《致地委、省委》，1959年6月29日。

《关于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调查》，1959年7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

省委检查团宜宾分团江安工作队：《关于长宁县桃坪公社的落后情况报告(摘要)》1959年7月9日。

阎红彦：《关于在仁寿了解到农村工作中几个问题致省委并大章同志》，1959年7月23日，省委收文第4873号。

郭炳林给夏部长的信，1959年7月29日，省委办公厅收文第5107号。

省委检查团泸州分团叙永检查组：《关于叙永天堂公社部分生产队推行红若“包产到户以

产记工”办法的报告》，1959 年 8 月 4 日。

杨万选：《关于长宁县旱灾和水肿病情况的报告。》1959 年 8 月 9 日，省委收文第 5268 号。

省委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关于泸州专区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 年 9 月 1 日。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1959 年 9 月 2 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指示）总号[59]418 号。

李大章：《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地点：金牛坝，时间：1959 年 9 月 7 日。

《井泉同志 1959 年 11 月 7 日上午在市、地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于重庆潘家坪》。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省、地、县三级机关反右倾斗争情况向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汇报》，1959 年 11 月 21 日。

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汇报》，1959 年 12 月 7 日。

《井泉同志对“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汇报”的批示》，1959 年 12 月 8 日。

《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和公社党委书记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 年 12 月 25 日。

《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 年 12 月 25 日。

《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 年 12 月 25 日。

《厂矿企业非党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 年 12 月 25 日。

《大专院校、中等学校非党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 年 12 月 25 日。

《中共绵阳地委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改造落后社会、队的情况报告》，1960 年 1 月 8 日，第一次地委书记文件之 25。

《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1960 年 2 月 9 日。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纪要》，1960 年

2月14日晚，四川省档案馆。

李井泉：《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6日。

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的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1960年3月26日。

刘仲伍、王政、肖林：《关于金堂县三星公社五爱管理区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4日。

乔钟灵、翟容致省委并内江地委，1960年4月16日。

温江地委办公室接大邑县委办公室电话记录，1960年4月25日。

《省委农业检查团江津组向四川省委的报告》第56-59页，附件三：《关于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1960年5月3日。

《关于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1960年5月3日。

甘棠、王善庆、李茂云：《关于泸州地区生产、生活的检查情况综合汇报》、《关于泸州地区一些违法乱纪情况报告》，1960年6月3日。

李井泉1960年8月5日给李先念副总理的信。

梁岐山给省委、万县地委的信，1960年9月26日。

《王子清同志关于于荣县一些问题向农村工作部的汇报》，1960年10月3日。

中共壁山县委：《关于抢救肿病的十二条紧急措施》1960年10月22日。

省委万县专区粮食工作检查团薛志强致省委、万县地委，1960年10月28日，收文号1960年7011。

张守愚、刘景周：《就荣县问题给省委的报告》，1960年11月30日。

《内江猪只减少的情况》，1960年11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印《农村工作简报（第83号）》。

《樊执中同志关于合川县南坪公社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一些反映》，1960年11月13日，收文第7266号。

郫县县委第一书记高义禄：《关于共产风给生产带来的损失的初步检查》，1960年12月1日。

李怀培：《关于一平二调的问题》，1960年12月1日上午。

《省委农业检查团江津组向四川省委的报告》，1960年。

国务院财办调查组：《关于四川省纠正“一平二调”清理退赔情况的调查估算（初稿）》，1960年12月。

温江地委工作组：《潘廷光违法乱纪案件》，1960年12月1日。

四川省公安厅、中共邛崃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对被控人原道佐公社党委第二书记杨树楼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事实初步查证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6日。

四川省农村工作部调查组：《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一平二调造成农具严重缺乏的情况》，1961年1月5日。

《刘文珍同志在壁山县检查农村食堂所发现的严重问题的电话汇报》，1961年1月6日，秘书处收文[61]第126号。

张广钦：《关于农村治安情况混乱的汇报》，1961年1月12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61）收文第214号。

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绵阳工作组：《绵阳石马公社改变落后面貌的情况材料》，1961年1月12日。

省委工作团乐山县棉竹公社工作组：《乐山棉竹公社二管区干部瞎指挥给生产带来严重损失》，1961年1月16日。

省委整风整社温江工作团：《金堂县五级干部会议揭发出有关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16日，[61]收文第447号。

省委整社工作团绵阳工作队：《绵阳县松桷公社落后情况的调查材料》，1961年1月17日。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组对目前防治肿病的情况反映》1961年1月18日，收文号343。

刘文珍：《关于江津、合川、江北、永川、荣昌等五个县、区、公社三级党委整风整社指导思想的检查报告》1961年1月22日。

李林给省委并廖书记：《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的情况报告》，1961年1月31日。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防治肿病工作情况》，1961年3月7日。

省委检查团垫江工作组：《关于界枫公社整风整社第三阶段贪盗赃款追退工作情况报告》，

1961 年 4 月 8 日。

李井泉：《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主席的信》，1961 年 5 月 11 日于内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1961 年 5 月 12 日抄发各市、地、州委、省委常委、省级各大口。

《眉山县退赔的主要情况》1961 年 6 月 2 日，主送李大章同志，抄送廖起高同志、许梦侠同志。

宜宾地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关于全区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1961 年 7 月 5 日，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 61]3402 号。

李寅：《宜宾安边公社空田空土情况》，1961 年 7 月 26 日，收文[61]3597 号。

地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关于涪陵、武隆部分公社当前疾病调查情况简报》，1961 年 8 月 12 日。

中共屏山县委工作组《屏山县清凉公社五一大队纠正包产到户的经验》，1961 年 8 月 25 日。

魏萍、谭万才：《涪陵县明家公社当前防治肿病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 年 8 月 26 日。

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关于渠县部分地区因生活安排不落实群众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1961 年 8 月 31 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关于长田公社幸福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调查》，中央工作组长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 17 期，1961 年 9 月 3 日。

四川省退赔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当前退赔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1961 年 9 月 19 日。

《关于甄别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意见（草稿）》，1961 年 9 月 19 日。

《李大章同志在省委地委书记会上关于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录整理），1961 年 9 月 20 日。

省委检查团涪陵组：《马鞍公社结合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开展防治病工作的调查报告》，1961 年 9 月 20 日。

《乔志敏同志关于合川南屏公社整顿情况的报告》，1961 年 11 月 29 日。

中共壁山县委：《关于 1961 年防治疾病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1962 年 1 月 2 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208 号。

《万县地委办公室关于当前农村肿病情况的汇报》1962 年 1 月 15 日，四川省委办公

厅[62]收文 295 号。

省委检查组：《关于荣县几个严重问题的汇报》，1962 年，1 月 16 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62]313 号。

中共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汇报》，1962 年 1 月 21 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4171 号。

马吉良：《关于长寿县一些情况和问题的电话汇报》，1962 年 1 月 25 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519 号。

王道一：《柳荫区石坝公社抢治疾病情况的报告》，1962 年 1 月 28 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643 号。

林翻天、吴国宪：《关于四川情况的报告》，1962 年 3 月 2 日。

省委工作组：《关于新繁县河屯公社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意见》，1962 年 3 月。

《陈国栋同志给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其中谈到四川问题），1962 年 3 月 17 日。

《周颐同志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汇报》，1962 年 5 月 27 日[62]收文 2290 号。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疾病情况》1962 年 7 月 24 日，收文号：147 号。

四川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对我省历年粮食产量的分析（资料）》，1962 年 7 月 25 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 1962 年 7 月 26 日印。

中央统战部工作组：《四川省大足县土桥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问题的调查》，1962 年 8 月 24 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四川省江北县兴隆区包产到户的情况》，中央工作组长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 12 期，1962 年 8 月 28 日。

李定邦：《雅安地区当前生产、生活情况》，1962 年 9 月 4 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 24 期），1962 年 10 月 13 日：《四川省合川县三年来公社一级党委书记受批判、处分面达 60% 》。

《内江猪只减少的情况》，见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印《农村工作简报（第 83 号）》。

中共郫县县委：《郫县五级干部会议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讨论》。

4、安徽省

中共凤阳县委工交部：《关于 1958 年度工交部的总结报告》，1958 年 12 月。

中共凤阳县委：《赵从华的反党罪恶材料》，1959 年 10 月 30 日。

中共凤阳县委：《凤阳县整风开展情况》1959 年 12 月 8 日。

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全市普遍推广先进做饭方法的报告》，1960 年 1 月 26 日。

《陡沟公社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情况总结报告》，1960 年 7 月 18 日无为县委转发。

曾庆梅：《关于萧县马井公社部分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报告》，1960 年 8 月 4 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试点情况报告》，1960 年 11 月 24 日。

中共无为县委：《贯彻中央 12 条紧急指示信的情况》，1960 年 11 月 27 日。

程光华：《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1960 年 11 月 29 日。

《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第一次检查材料）》，1961 年，1 月 7 日。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第四期（1961 年 1 月 8 日）、第五期（1 月 9 日）、第六期（1 月 10 日）。

《凤阳县赵玉书同志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补充检查》，1961 年 1 月 15 日。

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 年 2 月 1 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小溪河公社坏人当道情况所调查报告》，1961 年 2 月 10 日。

凤阳县委调研组：《关于政府城公社四凤大队三包四定工作简报》（第一期）、（第二期）。

凤阳县委：《整风整社工作简报》（16 期），1961 年 3 月 14 日。

《程光华同志代表蚌埠市委所作的检查报告》（记录稿），1961 年 3 月 18 日。

蚌埠市 1961 年三级干部会议简报，《对省委的意见和要求》。

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3月26日。

《武店公社党委关于整风整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1年4月18日。

凤阳县《科局长整风会议纪录》，1961年8月9日。

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会议上的讲话：《凤阳县两年来的经验教训》，1961年8月24日。

（蚌埠）市委压缩城镇人口领导小组：《关于进上步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的工作意见》，1961年11月17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五风情况》，1961年11月7日。

蚌埠市除害消灭病领导小组：《关于防治疾病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1961年11月17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和改正包产到组的工作情况汇报》，1963年3月10日。

5、吉林省

吉林省检察院党组：《关于打击违犯粮食政策、破坏粮食征购的犯罪情况报告》，1958年2月13日。

吉林省检察院党组：《关于当前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报告》，1958年4月30日。

吉林省检察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监察厅：《及时惩处违反和破坏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保障粮食征购工作顺利进行的初步意见》，1959年1月9日。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六级干部会议简报》第一期，1959年3月11日。

吴德：《吉林省六级干部会议总结》，1959年3月21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9日。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5日。

吉林省政法联合办公室：《关于战役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草稿）》，1959年8月10日。

1959年8月26日到9月10日，省委扩大会议文件（传达贯彻庐山会议）。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1960年2月20日。

中共吉林省委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岳林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3月。

吉林省副省长王免如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安排人民生活问题》，1960年3月21日，会议秘书处3月22日印。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批捕人犯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4日。

中共四平地委：《关于双辽县发生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情况的报告》，1960年6月15日。

中共吉林省政法委党组：《关于调整1960年捕人、杀人控制数字的报告》，1960年7月18日。

中共吉林省委：《批发栗又文同志在省三级干部会上关于粮食工作的总结发言》，1960年10月31日。

吴德在吉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0年11月1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粮食工作报告》1960年11月14日。

吴德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粮食征购和生活安排问题》，1960年12月17日。

省、市、县委工作组：《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共辽宁省委1960年12月25日报送东北局。

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大搞代食品的情况》，1961年1月7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大搞代食品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18日。

东北局财委：《关于三省财贸部长座谈会抓好代食品安排人民生活的意见报告》，1961年1月2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防止旅客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1961年2月1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粮食情况和生活安排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1日。

东北局农委工作组、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1961年2月15日。

(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来电记录:汇报当地饥饿情况,1961年3月4日晚。

吉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洮安县两个管理区发生浮肿病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3月11日。

中共吉林省委:《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1961年4月17日。

《吴德同志写给主席的第一封信》,1961年5月9日。

《吴德同志写给主席的第二封信》,1961年5月10日。

宋振庭:《关于怀德县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进一步整党整社的报告》,1961年5月10日。

中共长春市委办公厅:《关于制止某些群众扒树皮、损坏公共设施的报告》,1961年5月11日。

中共长春市委办公厅:《关于制止某些群众扒树皮、损坏公共设施的报告》,1961年5月11日。

吉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防治当前几种主要疾病的报告》,1961年6月2日。

阮泊生:《怀德县当前生产及生活安排方面的情况汇报》,1961年7月27日。

吉林省公安厅党组、吉林省民政厅党组:《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意见报告》,1961年10月30日。

《徐守身同志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1月2日,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61年11月6日印发。

《关于粮食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1961年11月29日。

张士英:《抚松县发展人参生产问题的报告》1961年12月7日。

《崔次丰同志在全省统一行动打击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的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62年1月1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厂矿企业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情况的报告》,1962年1月20日。

中共吉林省委财贸部:《关于召开农村生活安排会议的报告》,1962年3月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职工家属参加自给性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1962 年 11 月 9 日。

6、辽宁省

中共辽宁省委工作组：《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1960 年，12 月 15 日。

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以粮食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情况报告》，1961 年 1 月 19 日。

7、江苏省

江渭清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1958 年 5 月。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1958 年 5 月 8 日。

江苏省委整社检查团扬州分团：《在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问题向省委汇报》，1959 年 2 月 12 日。

《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 年 3 月 24 日。

颜景詹 1959 年 4 月 15 日上午电话汇报：《关于人民生活问题》，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编印。

粮食部工作组：《关于宝应、宜兴两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 年 6 月 25 日。

《殷炳山同志在县、市委第一书记会上的讲话》，1960 年 7 月 22 日。

孙海光给省委的信，省委韩批给书记阅。1960 年 7 月 25 日。

《向干部提八条意见》，整风整社《大会简报》第二期，1960 年 7 月 28 日。

《西冯大队近几什么没有大跃进》，1960 年 8 月 4 日。

上海局办公室：《江苏省工作组来信》，1960 年 8 月 24 日。

卢敬给省委的信：《吴县东桥公社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为什么这么严重》，1960年9月5日。

《省委驻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崙大队工作组第一次报告》，1960年9月18日。

江苏省委派赴丹阳县工作组（即重工业厅丘陵山区工作组）给省委的报告，1960年9月20日。

宋超、郭铁松、李震给省委、扬州地委、江都县委的信，1960年9月25日。

省委工作组：《关于常熟县白茆公社浮夸产量的调查报告》，1960年10月18日。

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省地委工作组关于溧水县委常委整风的情况报告》，1960年10月19日。

《上海局杨主任关于丰、沛、东海县情况向地委的汇报》，1960年10月30日。

中共苏州地委：《莫城公社贯彻“十二条”第一步的情况简报》，1960年11月。

中共江苏省委驻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工作组：《关于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的调查材料》，1960年11月15日。

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关于淮阴市五里公社第八大队“四风”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11月16日。

江苏省委东台县工作组刘子见：《关于卢南大队纠正“共产风”的工作报告》，1960年11月19日。

江苏省委、县委驻曲唐公社工作组：《关于曲唐公社胡庄大队纠正一平二调的情况报告》，1960年11月23日。

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徐慎行：《关于泗阳县粮食问题的报告》1960年12月2日。

孙海光：《给辛、孙部长并报省委》，1960年12月27日。

冯光才：《淮阴市王兴公社克扣社员口粮》，1960年12月28日。

地委调查组：《高要县四甲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年3月12日。

瓜埠公社整社工作研究小组：《关于六合县瓜埠公社干部作风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1961年4月，海军政治部政治理论教研室印。

宝应县委工作组：《宝应县天平公社情况报告》，1961年6月10日。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苏北里下河地区当前情况的报告》，1962 年 5 月 30 日。

《中共常州市委关于大明纺织厂在精简工作中发生群众性起哄闹事的通报》，1962 年 6 月 10 日。

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1962 年 7 月 15 日。

8、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广东目前镇反运动综合报告》，1951 年 4 月 11 日。

吴南生：《关于合浦县发生大量水肿死亡情况的报告》，1960 年 5 月 4 日。

张进齐：《关于罗定县出现严重水肿、死亡事件向省委的报告》，1960 年 9 月 20 日。

郑群、成家英、张乐民：《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乱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1960 年 7 月 31 日。

《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1961 年 1 月 5 日。

《增城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1961 年 1 月 4 日。

《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61 年 1 月 3 日。

中共文昌县委：《关于四级干部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1961 年 1 月 11 日。

《高要县四个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 年 2 月。

《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1961 年 1 月 21 日。

《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61 年 1 月 3 日。

地委调查组：《高要县四甲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 年 3 月 12 日。

9、山东省

《谭启龙给舒同的信》1958 年 1 月 18 日于济宁。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赵健民同志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事实》, 1958年10月21日。

《山东省委、省人委关于馆陶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 1959年1月16日。

《谭启龙给记舒同的信》, 1959年3月23日于钜野。

《谭启龙给舒同的信》, 1959年4月11日于济宁。

王瑛:《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 1959年4月29日。

《中央监委转发山东监委关于济宁地区在开展‘拔白旗, 插红旗’的竞赛运动中发生错误的报告》, 1959年4月30日。

夏征农:《夏征农同志关于检查寿张工作情况向省委报告》, 1959年6月18日。

《山东粮食厅党组关于调整全年粮食统销指标情况向省委的报告》, 1960年2月25日。

山东省委办公厅:《通讯与资料》第31号, 1960年7月。

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会议文件, 1960年8月14日简报。

中共山东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的报告》, 1960年9月20日。

曾希圣在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 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 1960年10月29日。

穆林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60年12月13日。

舒同:《我的检讨》, 1960年12月13日。

赵健民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60年12月15日。

1960年12月13日-15日山东省委扩大会议简报。

《山东省粮食厅关于印发樊培华同志在全省粮食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纪要的通知》, 1961年1月14日。

山东省粮食厅:《山东粮食问题(汇报材料)》, 1961年5月12日。

《昌潍专署粮食局关于请示收购一部分霉变瓜干向省粮食厅的报告》, 1961年10月29日。

山东省粮食厅：《关于 1960-1961 年度农村和国家对粮食需要市、地委匡算的情况》。

10、浙江省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从典型调查来看浙江农村市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1954 年 3 月 15 日。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 年 3 月 18 日。

《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省合作化问题的检讨》，1955 年 9 月 13 日。

江华：《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57 年 12 月 9 日。

特急电报：《就主动增加从浙江上调粮食事》《江华致先念同志并报主席、中央、上海局》，1959 年 4 月 21 日 20 时。

《省委转发省委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两个材料》，1959 年 5 月 25 日。

《省委批转省粮食厅党组关于 1959 年全省第一次粮食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 年 7 月 1 日。

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1959 年 8 月 18 日。

《全省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1959 年 5 月至 8 月。

《为争取 1960 年全省粮油工作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1960 年 2 月 12 日。

江华：《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向全省公社党委书记的报告》，1960 年 3 月 3 日下午。

《江华同志在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 年 3 月 21 日。

浙江省卫生厅：《关于青紫病的调查报告》，1960 年 4 月 6 日。

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当前整顿食堂和安排人民生活情况资料》（供领导同志参考），1960 年 5 月 9 日。

林乎加：《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的讲话》，1960 年 5 月 10 日，于黄岩。

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1960 年 5 月 20 日。

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1960年6月4日。

《部分地方发生食堂停伙》，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编《情况资料》3期，1961年1月13日。

《大里生产队大搞代食品》载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3期，1961年1月13日。

《黎明生产队基层组织整顿情况》，载浙江省委农工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10期，1961年2月9日。

曾绍文厅长在全国粮食局长会上的报告：《关于粮食工作问题》，1961年7月16日。

浙江省委办公厅：《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1961年。

省委办公厅：《全省一平二调情况和兑现情况》，1961年3月，J007-13-20。

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利丰大队群众生活状况调查资料（草稿）》1961年4月23日。

衢县工作组，《炉头生产大队基本情况资料》，1961年5月4日。

中共浙江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两个生产大队的对比》，1961年5月18日。

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黄岩县路桥镇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初稿）》，1961年5月28日。

省委农工部分配处：《当前农村生活安排情况》，1961年12月15日，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35期，1961年12月18日。

《粮食会议文件》，全省粮食会议秘书处印，1962年5月14日。

11、云南省

《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1954年4月14日。

云南省纪委：《关于墨江县坝溜、龙潭二区1952年春荒饿死人及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及有关干部处理意见的报告》，1955年5月3日。

《思茅地委关于领导群众克服粮荒的紧急指示》，1956年8月4日。

《思茅地委关于解决当前边疆粮荒问题的第二次紧急指示》1956年8月20日。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1956年9月25日。

中共文山地委：《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1956年10月7日。

《关于归化寺问题的报告》，1956年12月。

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1956年死人情况的报告》，1957年7月22日。

《云南省委关于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斗争的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7年9月12日。

《省委批转农村工作部关于晋宁县认真处理拆房以后社员安置的报告》，1958年3月27日。

《丽江地委和军分区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1958年4月16日22时。

《于一川同志的总结性发言-在4月20日省委扩大会上（记录稿）》，1958年4月22日。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曲靖等部分地区发生肿病情况的报告》，1958年7月27日。

省委农村工作部：《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1958年8月22日。

刘卓甫：《关于曲靖专区肿病情况报告》，1958年9月3日。

《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富源县、曲靖县、马龙县饥饿情况），1958年9月。

省委检查组：《关于罗平县肿病情况的调查报告》，1958年9月2日。

马力、贾兴福给省监委的信，1958年9月16日。

孙雨亭：《从和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斗争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党的战斗力——在云南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9月25日。

丽江地委：《关于开展土法制造滚珠轴承的报告》，1958年10月。

大理地委：《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1958年10月3日。

《陆良县肿病死人情况-陆良县委书记孔祥柱同志汇报纪要》，1958年11月14日。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1月18日。

中共云南省委检查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简报》，1958年11月20日。

《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汇报》1958年11月17日，11月21日。

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讲话，1958年12月2日。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1958年12月2日。

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2月6日。

省委检查团昆明分团曲靖组报告：《关于曲靖专区、富源师宗等县钢铁铜焦放卫星的情况报告》，1958年12月14日。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报告》，1958年12月29日。

泸西检查组：《检查前泸西县违法乱纪问题的总结报告》，1959年2月28日。

省委办公厅：《全省各地肿病情况综合》，1959年7月30日。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届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坚决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以实际行动保卫党的总路线，力争提前和超额完成1959年生产任务的决议》，1959年9月24日。

《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1960年4月26日。

中共省委工作组：《关于砚山县忽视群众生活实行乱斗斗争的报告》，1960年6月8日。

楚雄地委：《关于肿病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7月29日。

思茅地委：《关于澜沧县肿病死人问题的检讨报告》1960年9月3日。

《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11月30日。

《谢富治同志向总理、富春汇报云南宣威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及粮食情况》，1960年12月2日。

中共楚雄地委：《关于楚雄县苍岭公社桃园管理区问题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12月9日。

《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1961年6月26日。

12、河北省

解学恭：《关于浮肿病调查报告》，1959年1月22日，河北省委1月24日批转。

河北省委、省人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1959年3月14日。

河北省委：《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1959年4月16日。

省委监委会1960年1月26日致省委的信。

中共张家口市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1960年1月16日。

中共唐山市委：《关于前段农村整风整社情况和今后意见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1月21日。

河北省委：《关于防治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2月18日。

省防毒工作检查组：《关于涿县、宁晋、唐县中毒事件检查情况的报告》，1960年5月15日。

中共邯郸市委：《关于32个农村三反试点基本总结和下段安排意见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6月2日，中共邯郸市委文件，[60]141号。

中办安国工作组：《关于安国县伍仁桥公社党委和伍仁村支部控制群众退出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7月18日。

河北省公安厅党组：《关于当前中毒事故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0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1960年9月21日转发。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某些农村继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10月13日。

中共河北省监察委员会报告，总号[60]48号。《河北省委关于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的紧急通知》，1960年11月8日。

河北省委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年。

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的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1960年12月28日。

《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蔚县情况》，1961 年 1 月。

河北省农业厅党组：《关于瞎指挥风的初步检查（讨论稿）》，1961 年 1 月 17 日。

封云亭致裴书记，1961 年 1 月 7 日。

胡开明致刘子厚的信，1961 年 1 月 21 日。

河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立即开展治病防病运动的报告》，1961 年 8 月 12 日，[61]258 号。

省委办公厅：《各地委对省委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的情况和意见》，1961 年 9 月 17 日。

刘子厚：《关于务必抓紧征购工作的紧急电话》，1961 年 10 月 6 日。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 年。

省委书记处会议 301 次会议材料，1961 年。

河北省委办公厅：《各地区粮食工作情况第四次简报》，1961 年 10 月 14 日。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

省常委第一届 132 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 年。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 年。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 年。

省农业厅委工作组：《沧州地区十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1962 年 7 月 1 日。

《中共河北省委整风整社办公室、监察委员会关于 1960 年冬到 1961 年春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组织处理工作总结》，1962 年 4 月 28 日。

中共河北省委整风整社办公室、监察委员会：《关于 1960 年冬到 1961 年春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组织处理工作总结》，1962 年 4 月 28 日。

13、中央有关部委

粮食部《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1954年6月15日。

粮食部、财委粮食组：《全国粮食库存逐月减少情况》，1954年7月。

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25日。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0-1953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1954年。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3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1954年。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粮食部拟提供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1955年。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6年。

粮食部：《关于饲料用粮的供应报规定》，1957年5月17日。

《全国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7月。

《1957年第二次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粮食购销问题的报告》，1957年8月。

《湘西自治州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益阳县通过大辩论超额完成了早稻征购任务》，1957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市镇供应简报》，1957年11月。

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年。

粮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的报告》，1958年3月7日。

《粮食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58）粮发20号，1958年5月20日。

《粮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1958年8月15日。粮食部党组：《当前粮食购、销、调运情况汇报》，1958年10月4日。

沙千里：《反右倾，鼓干劲，掀起红旗运动新高潮》，1959年11月2日。

粮食部党组：《关于当前粮食情况和今后粮食工作意见》，1959年11月27日。

1959 年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资料。

《中央批转粮食部“关于今后三年内把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到一千亿斤的报告”，1960 年 1 月 26 日。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数字，1960 年 7 月 5 日统计。

李井泉就四川省粮食征购数问题给李先念副总理的信，1960 年 8 月 5 日。

牛佩琮、陈国栋：《关于粮食情况的紧急报告》，1960 年 7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粮食问题汇报提纲》，1961 年 5 月 7 日。

《陈国栋同志给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1962 年 3 月 17 日。

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 28 期，1962 年 8 月 20 日。

《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 年 8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简报》[第十期]，1959 年 1 月 22 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1961 年 8 月 24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 12 期，1962 年 8 月 28 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 24 期，1962 年 10 月 13 日。

商业部党组：《关于 1959 年供应出口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1960 年 1 月 8 日，（60）上海会议文件 97。

14、公安部

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 年 1 月 14 日。

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决议》，1958 年 8 月 16 日。

《广西省镇压反革命情况及目前存在的思想麻痹问题》，1951 年 5 月 15 日，见广西公安厅编：《情况与资料》1950-1951 年第 6 期。

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二、官方文件

《中共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边疆六个县区第一批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初步总结》，1955年12月10日。

《中央转发中央办公厅综合的“关于十六省区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和各地党委提出的解决措施的简报”》，1958年4月25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公报》，1959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1958年8月31日。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公报》，1958年12月17日。

《中共中央批转“山东省委、省人委关于馆陶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1月22日。

《党内通信》（即毛泽东给6级干部的信），1959年4月29日。

《中共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1959年7月31日，1959年我国财贸书记会议参考文件之一。

《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1959年8月7日。

《中央转发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1959年9月8日。

《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1959年10月13日。

《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10月13日。

《中央同意青海省委关于以张国声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1959年10月14日。

《中央转批浙江省委“关于温州、金华地区少数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违犯政

策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21日。

《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1959年11月27日。

《中央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整理的“老干部为什么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材料》。

《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中犯错误同志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原则》，1960年1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转李先念关于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和成立调运指挥部的报告》，1960年2月21日。

中央办公厅整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6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所规定》，1960年3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1960年3月9日。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1960年4月18日。

《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

《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1960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1960年8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1960年9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1960年11月3日。

《中央关于转发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迴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报告的指示》，1960年11月9日。

中共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1960年11月26日。

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1960年6月8日。

《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1960年12月8日。

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1961年1月20日。

《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总结报告》，1961年1月31日。

《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问题的三个文件的批示》，1961年2月4日。

中共中央转发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9日。

胡乔木等：《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10日，《中央转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

《中央转发谷牧同志“关于迅速克服工人私自离厂现象和巩固工人队伍的意见”和贾步彬同志的信》，1961年4月30日。

《中央办公厅转发安徽省委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1961年5月3日。

《毛主席批转胡乔木同志5月8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9日。

《阎红彦同志于弥渡县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9日。

《毛主席批转邓小平、彭真同志5月10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13日。

《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1961年6月16日经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1961年6月16日。

《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961年12月17日。

《批转建筑工程部党组关于停缓建工程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报告》，1962年1月6日。

《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1962年2月14日。

《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

《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统战部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的报告》，1962年5月9日。

《毛泽东同志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座谈会记录的批示》，1962年7月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年9月27日。

中央批转《安徽省改正“责任田”情况》，1962年12月11日。

《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即桃园经验），1964年9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批转关于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严肃处理违反和破坏粮食政策的行为》，1960年12月19日。

《东北局关于进一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1961年5月16日。

三、有关省的官方文件

1、河北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召开 1959 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1959 年 3 月 14 日。

《河北省委批转霸县县委关于煎茶铺公社发生浮肿病救治经过的报告》，1960 年 2 月 2 日。

《河北省委批转内丘县县委善于隆尧公社重贤管理区人民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摘要)》，1960 年 2 月 10 日。

《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关于我省中毒事故的情况简报》，1960 年 4 月 29 日。

《河北省委批转省委财贸部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整饬粮食纪律加强粮食管理意见的报告》，1960 年 9 月 27 日。

《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1960 年 10 月 18 日。

《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1960 年 10 月 18 日。

《河北省委批发石旭东同志反映邯郸市特需供应问题的意见》，1960 年 11 月 1 日。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1960 年 12 月 17 日。

《河北省委转发省卫生厅党组关于立即开展治病防病运动的报告》，1961 年 8 月 17 日。

2、甘肃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1962 年 12 月 3 日省委第三届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1965 年 7 月 5 日。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1年5月9日，于临夏。

3、吉林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人民生活的若干问题的规定》，1959年1月7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召开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部署的报告》1959年5月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解决社员自留地问题的通知》1959年6月2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讨论主席指示中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思想动态的报告》1959年6月11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工资制与供给制的比例和整顿公共食堂的指示》1959年6月3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整社算账工作的总结》1959年11月9日。

《省委批转通榆县委关于高速发展大和扭转大牲畜大量瘦弱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19日。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通榆县委关于立即制止牲畜大量瘦弱、死亡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27日。

《关于在农村中必须坚决贯彻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文件。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批捕人犯情况报告》，1960年4月4日。

《省委同意省政法组关于在解决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将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至县委的意见》，1960年7月18日。

《省委批转粮食厅党组“关于延吉县八道公社发生少数社员逃跑问题的情况简报”，1960年6月1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试点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28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精简职工、调整安排劳动力和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生产战线的

意见》，1960年12月29日。

中共吉林省委转发吉林市委《关于当前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有些地方违反中央指示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通报》1961年1月14日。

《关于粮食情况和生活安排问题给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1961年2月11日。

《省委转发吉林市委关于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耕地的紧急通报》，1961年3月26日。

《揭开假先进的盖子，拔掉真落后的根子-省委批转九站人民公社整风整社情况的报告》，1961年5月18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迅速抢救重型浮肿病人的紧急的通知》，1961年6月26日。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四平地委批转梨树县委“关于河山公社在贯彻政策中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通报”》1961年7月15日。

《省委批转公安厅党组、民政厅党组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的意见的报告》，1961年11月13日。

《省委批转公安厅工作组关于四平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1961年12月25日。

《省委批转省委财贸部关于召开农村生活安排会议情况的报告》，1962年3月18日。

4、江苏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3月30日。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大队的调查材料》，1960年10月9日。

5、云南

《省委关于富民县反击反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报》，1957年8

月 12 日。

《省委关于农村整风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7 年 8 月 17 日。

《云南省委关于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7 年 9 月 12 日。

《省委关于在省级机关中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9 年 10 月 28 日。

《省委关于粮食安排的三个调查材料的批示》，1961 年 1 月 11 日。

6、浙江

《中共浙江省委批转黄岩县委“关于当前农村中各阶层思想情况的调查报告”，1956 年 3 月 12 日。

《省委转发“建德县大洋人民公社卫星生产队实行吃饭不要钱和计划用粮的情况”和富阳县场口公社建立粮食计划管理制度的情况》，1958 年 12 月 29 日。

《省委转发省委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两个材料》，1959 年 5 月 25 日。

《省委批转省粮食厅党组关于 1959 年全省第一次粮食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 年 7 月 1 日。

7、四川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荒的指示》，1959 年 9 月 2 日。

《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燕汉民同志转报万县市龙宝公社反右倾、鼓干劲，增产粮食，节约渡荒运动的情况报告》，1959 年 9 月 23 日。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告：《关于工矿企业职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情况简报》1959 年 11 月 28 日。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简报》，1959 年 12 月 18 日。

《中共四川省委批转南充地委转发地委濠溪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关于濠溪公社整风整社试点中进行 1961 年“三包一奖”的情况报告》，1961 年 3 月 16 日。

8、上海

《上海市委对奉贤县问题的情况报告》，1959 年 2 月 28 日。

《上海市委关于市委扩大会议情况给中央的电话汇报》，1959 年 9 月 2 日，

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及批示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2日。

《毛泽东成都会议上的六次讲话》，1958年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讲话（四川省委办公厅记录整理），1958年4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多次讲话》，1958年5月8日，17日，18日，20日，23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次讲话》，1958年8月17日，19日，21日上午，21日下午，30日。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6日，7日，9日，10日上午，10日下午。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多次讲话》，1958年11月21日，22日。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28日，3月1日，5日。

主席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9年2月1日下午。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廖志高致李大章：《23日晚主席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插话》，196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24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2日。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

（陕西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传达主席、总理在中央会议上的指示。档案年代字迹不清，从行文来年，大约是1960年底或1961年初。此件甘肃省档案馆。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年，855-6-2005。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 1958 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 年，855-4-1271。

《毛主席在信阳的谈话》，1958 年 11 月 13 日晚，河南省档案馆，11441-2。

《毛主席对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委书记座谈会的谈话纪录》，1959 年 2 月 27 日上午。河南省档案馆，1441-2。

1960 年 3 月 1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 年 1 月 31 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 年 8 月 9 日。

毛泽东：《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 年 2 月 3 日。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1 日。

刘少奇同志对全国妇联党组同志的谈话记录，1958 年 6 月 14 日。

刘少奇同志在省市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9 年 2 月 1 日下午。

刘少奇同志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 年 9 月 27 日于南京。

《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30 日。

李富春：《关于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9 年 4 月 21 日。

李富春：《关于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60 年 3 月 31 日。

《彭真同志在中央元月三日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9 年 1 月 3 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 1959 年 1 月 4 日印。

谭震林在河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7 月 15 日。

谭震林、廖鲁言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1958 年 11 月 16 日。

谭震林同志 1959 年 1 月 3 日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四川省委办公厅记录稿）。

谭震林同志在十省市小麦座谈会上的总结，1959 年 2 月 21 日，（记录稿）。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 1959 年 2 月 26 日印发。

《谭震林在大会上的讲话》，1960 年 2 月 12 日，载《1960 年 2 月全国财贸书记会议

参考文件之 17》。

谭震林在甘肃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60 年 5 月 25 日下午。

谭震林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60 年 11 月 2 日。

谭震林：《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1960 年 11 月 10 日在全国代食品会议上的报告。

《中央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的讲话》，1959 年 4 月 19 日，吉林省、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档案馆都存有此件。

《中央书记处 1959 年 10 月 15 日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讲话纪要》，AB1-02-510。

全国财贸会议秘书处：《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要点整理》，1959 年 9 月 10 日，《全国财贸书记会议简报第 1 号》，AB1-02-511。

《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要点整理》，1959 年 9 月 10 日，《全国财贸书记会议简报第 1 号》第 7 页。

《李先念同志 9 月 10 日晚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 年 9 月 10 日。

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 8 月 26 日，180-9-79。

陶铸：《虎门公社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59 年 2 月 25 日。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 年 1 月 14 日。

徐子荣同志在河南省委常委发会上的讲话（谈信阳事件），1960 年 12 月 6 日。

（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同志在河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谈信阳事件），1960 年 12 月 6 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在河南省统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统计工作》，1958 年第 12 期。

薛暮桥：《统计工作如何大跃进》，《统计工作》1958 年第 5 期。

《贾启允局长在全国省市统计局长会议的讲话纪要》，江苏省档案馆：3133-2125。

五、专著

[美]彭尼·凯恩 (Kane Penny):《1959-1961 中国的大饥荒》, 郑文鑫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美]安斯利·科尔 (Ansley Coale):《从 1952 年到 1982 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 1952-1982》)

丁抒:《人祸》, 香港, 九十年代杂志社, 1996 年。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团结出版社, 1993 年。

曹树基:《大饥荒: 1959-1961 年的中国人口》,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

[英]杰斯帕·贝克 (Jasper Becker):《饿鬼: 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姜和平译, 明镜出版社, 2005 年。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告别饥饿》,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王耕今、杨勋、王子平编:《乡村三十年-凤阳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 (1949-1983)》,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9 年。

康健:《辉煌的幻灭: 人民公社警示录》,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年。

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网络电子版。

张大发:《金桥路漫》, 定西作家协会出版, 2005 年。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东方出版社, 1998 年。

丛进:《曲折发展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张湛彬、刘杰挥、张国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1 年。

米鸿才、李显刚主编:《中国农村合作制史》,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7 年。

莫日达:《我国农业合作化发展》, 统计出版社, 1957 年。

-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 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柳随年等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
-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 郭书田：《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一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和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83年。
-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 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 1961》，珠海出版社，1998年。
-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 陈清泉、陆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 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
- 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7年。
- 黎昌庶：《西洋杂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 [美]曼瑟尔·奥尔森 (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卡尔·波普尔 (Popper, K.R):《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9 年。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 (F.A.Hayek) 著：《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法]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

托马斯·莫尔：《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宁津度译，见《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

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88 年。

邢贲思等：《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政治、社会卷，新华出版社，1997 年。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 年 12 月，第 28 页下。

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册，北京，中国书店，精装影印本，1985 年，第 121 页。

刘泽华：《中国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香港 Roundtab Enterise Limited 出版，2006 年。

孙广忠等：《中国自然灾害——献给“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活动》，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 年，第 5-6 页。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 年。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 年，北京。

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海洋出版社，1998 年。

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年。

张晓、王宏昌、邵震：《中国水旱灾害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年。

魏光兴、孙昭民主编：《山东自然灾害史》，北京，地震出版社，2000 年。

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美]麦克法夸尔 (MacFarquhar)、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兴起, 1949-196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利文出版社, 2005 年。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联共(布)党史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河南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风雨春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57-1969》第二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

[法]亨利·米歇尔 (Henri Michel):《第二次世界大战》, 卢佩文、刘幼兰译,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

崔济哲:《清唱》, 新华出版社, 2003 年。

张万舒:《故乡人民的笑声》, 新华出版社, 1986 年。

朱正主编:《1957 新湖南报人》, 湘新出准字 (2001) 第 161 号, 2002 年。

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编《大跃进中的河南水利》, 1998 年。

河南省水利厅:《河南水利 40 年掠影》。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 144 页。

大连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编:《病理生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2 年。

武汉医学院主编:《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1 年, 第 20-21 页。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食物成份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6 年 12 月。

六、论文、研究报告及文章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百年潮》，1998年第12期。

冯有林、魏鹤立：《湖北当阳跑马公社的“共产主义”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卞悟：《公社之谜-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高华：《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第60期。

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对一篇当代史回忆文本的解读》（修订全本），《领导者》，2006年1月号（总第12期）。

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的情况》，1981年3月7日。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陆平：《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开放》，2003年第10期。（此稿作者应为梁志远）。

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

辛平：《梦幻的天堂——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

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

杨闻宇：《荒唐的引洮工程》，《炎黄春秋》1993年第3期。

高化民：《对五十年代富裕中农问题的研究》，《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

《北明访余英时：中国近代史讲诸问题》2007年7月27日，新世纪 www.ncn.org。

- 冯同庆：《实际有惊，但求无险》，《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年第1期。
- 顾钧：《中国人初尝西餐》，《中华读书报》，2000年5月。
- 郭志珍、武代玲：《1959年：寿阳事件》，《沧桑》，1999年6月。
- 何立波：《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大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党史纵览》，2006年第2期。
- 何祖明、徐敬尧：《上虞县大旗会闹事的始末》，《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1期。
- 黄东文：《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4-5合期。
- 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
- 李若建：《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二十一世纪》第60期。
-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 李维民：《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 李真真：《大跃进时的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
- 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
- 彭建新：《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7页。
-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 刘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次辞职》，《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
-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中共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 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书屋》2000年第4期。

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年代：1954；180-2-54。

龙宇闻：《公共食堂积弊千日，解散一时——丰城县小港公社公共食堂追记》，《中国农业合作社史料》，1988年第4期。

罗平汉：《“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

马钟嶽：《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潘祝平：《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彭建新：《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权延赤：《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炎黄春秋》，1993年第4期。

沈志华：《“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同盟的破裂》，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

沈志华：《关于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沈志华：《援助与控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苏林达口述，赵光整理：《我给毛主席当厨师》，网上信息。

舒侗、方辰：《定县办地方工业前后两个方针两种结果》，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18日。

田家英：《韶山大队概况》，《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1990年第2期。

王静林：《历艰辛之程踏富裕之路——泡子沿农业合作化发展史》，《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8年第2期。

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札记二则》，载《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王民三：《走在钢丝般的日子》，《中国粮食经济》，2001年第7期。

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1964年7月5日。

吴冷西：《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
- 辛平：《梦幻的天堂——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
- 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
- 阎明复：《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 陆定一：《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6日《光明日报》。
-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 杨第甫：《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
- [印度]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
- 《鱼米之乡的大逃亡——广东三年大饥荒情况》，[新观察 xgc2000.com]。
- 俞乃蕴：《张凯帆铁骨诗魂》，《炎黄春秋》，1997年第4期。
- 张开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 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 赵胜忠：《跃进型统计体制的形成和后果》，《二十一世纪》，第60期，1989年8月。
- 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
- 郑义：《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香港《争鸣》，1993年1月号。
- 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
- 周承恩：《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 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
-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李真真：《大跃进时的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页。

穆青：《挥泪送冷西》，人民日报，2002年8月13日。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

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载《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1959年9月25日。

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晓凌、柳铮：《胡开明并非“胡”开明》，《炎黄春秋》杂志1991年第2期、

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1962年，7月30日。

薛暮桥：《苦战三月，改变全国统计工作面貌，实现全国统计工作大跃进！》，《统计工作》，1958年第14期。

杨明伟：《“大跃进”席卷神州周恩来险些辞职》，《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冯有林、魏鹤立：《湖北当阳跑马公社的“共产主义”考》，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92-94页。

吴冷西：《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七、回忆录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
-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 李锐：《大跃进析历记》（上、下），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
-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
-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 耿飫：《耿飫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 王力：《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未刊本，2004年。
-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 李磊：《悠悠岁月》，1999年10月自费印刷本，第149页。

和凤鸣：《经历——我的 1957 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年。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事件”》，打印稿二稿。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

[阿尔巴尼亚]雷兹·马利列 (R.Malile)：《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王洪起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

余德鸿：《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2001 年 9 月 17 日，打印稿。

陆平：《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开放》，2003 年第 10 期。
(此文作者应为梁志远)

梁志远：《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炎黄春秋》2003 年第 1 期。

梁志远：《亳县统购统销反右的后果严重》《炎黄春秋》2003 年第 7 期。

梁志远：《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炎黄春秋》2006 年第 3 期。

梁志远：《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春秋文存》（炎黄春秋内部版）。

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2002 年第 7 期。

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观察网：大饥荒档案。

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载《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 年 12 月。

黄东文：《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炎黄春秋》2002 年第 9 期。

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人民日报》，1987 年 11 月 12 日。

张开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载《炎黄春秋》2004 年第 6 期。

苏林达口述，赵光整理：《我给毛主席当厨师》。

范睦：《身在天府写文章》。

新华社离退休干部局编：《老年生活》，2006 年第 4 期。

八、资料汇编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当代云南编写组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丁伟志、甘棠寿主编：《中国国情丛书·静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

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省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

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省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云南省统计局编：《云南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1960年全国大中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全国总工会党组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办公室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1961年6月3日印。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科学出版社，1992年。

《河北党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5辑，1994年11月。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9年。

张雄龙、李子和主编：《中国国情丛书·镇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专辑，1991年第1期（总81期）。

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1926.11——1995.1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江地区历史大事记》，成都出版社，1995年。

云南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重要文件汇编》（1952-1962），云南新闻出版局许可证130号（内部发行）。

云南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云南省农业合作制史料：历史资料选编》（内部发行）云南新闻出版局许可证130号。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河北省报刊登证第1169号，自1986年到1998年各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情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84页。

邱石编：《共和国轶事》第二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毛泽东生活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黄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二十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新华社国内资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

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

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谭崇台主编：《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王明远主编：《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

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吴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

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

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

李慕真、仇为之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

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郑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

曹明国主编：《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杜闻贞、顾纪瑞主编：《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年。

全国各省（除西藏、台湾、新疆、香港、澳门以外）的 1956-1964 年间每一年的总人口数、出生率、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各省分册，此处不再详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 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0）》，经济管理杂志社，1980 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 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2）》（海外版），经济管理杂志社，1982 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3）》，经济管理杂志社，1983 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8）》，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 年。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61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的新闻公报》，196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龙云、于学忠、蔡廷楷、章伯钧、王家桢、周一志等民主人士在大饥荒年代的批评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印作为庐山会议的反面材料。

九、地方志

《阿坝州志》，民族出版社，1994 年。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安西县志》，知识出版社，1992 年。

《百色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保康县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1 年。

《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

《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潮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崇庆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垫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东安志》，1981 年。

《丰都县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1 年。

《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 年。

《福建省志》，方志出版社，1998 年。

《甘南州志》，民族出版社，1999 年。

《甘肃省志（第二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广东省志·公安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

《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

《海西州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河北省志》第71卷《公安志》，中华书局，1993年。

《河南省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鹤庆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湖南省志》第六卷《政法志·公安》，湖南出版社，1997年。

《吉林省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嘉峪关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

《剑河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

《溧水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岷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雷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黎平县志》，巴蜀书社，1989年。

《连南瑶族自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连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民勤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

《牟定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南华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郫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齐齐哈尔市志稿》，内部印行，1994年。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公安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青海省志·公安志》，黄山书社，1994 年。

《青海省志·军事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荣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

《邵武市志》，群众出版社，1993 年。

《石柱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年。

四川省公安厅编：《四川省公安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7 月。

《思茅地区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年。

《天长县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通海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年。

《翁源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

《浠水县志》，中国文史出版，1992 年。

《无为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

《岳西县志》，黄山书社，1996 年。

《云南省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云南省志·粮油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张掖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年。

齐齐哈尔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齐齐哈尔市志稿》，内部印行，1994 年，第 124 页。

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它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

联共（布）党史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人民出版社，196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出版信息不详。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出版信息不详。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材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内部发行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选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